

# 希尔达之书

忠守至最后：  
二十世纪中期  
赴中国和韩国的  
美国医疗传教士

希尔达·韦斯-安德鲁斯 著

伊丽莎白·理查德森 编

**© 2008 Hilda Weiss-Andrus and Elizabeth Weiss Richardson**

This work may be reproduced and redistribut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alteration and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provided all copies contain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 2008 Hilda Weiss-Andrus and Elizabeth Weiss Richardson. This work is re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s." Quotations from this work should be credited in the format: "Hilda's Book – American Missionary to China and Korea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 2008 Hilda Weiss-Andrus and Elizabeth Weiss Richardson."

# 目录

前言 .....	4
第一次作为传教士到中国 .....	6
“什么事是决不会做的？” .....	6
在路上——1939 .....	9
我们在中国的第一天 .....	12
在北京华文学校的一年（1939-1940） .....	13
南昌 .....	22
1941 .....	25
1942-1943：忠守至最后 .....	31
闸北集中营 .....	37
格利普霍姆号与遣返 .....	40
美国 .....	42
1944 .....	43
1945 .....	44
1946 .....	44
中国：1947-1951 .....	46
重返中国 .....	46
1947 .....	48
1948 .....	55
重返工作 .....	60
1949 .....	61
1950 .....	67
1951：忠守至最后 .....	73
中国之后 1951-1955 .....	78
履历 .....	80

## 前言

这是希尔达<sup>1</sup>的回忆录，不是她丈夫或孩子的。希尔达汇总她的日记和写给家人、教会的信件写成此书。她写下她当时感兴趣的和觉得重要的，并不一定让今天的我们感兴趣。那些她遗漏的或是她手稿中丢失的我们纵然好奇却无从得知。

希尔达的写作风格很独特，谈不上优雅。我努力尽可能地保持她的风格和语言，为拼写、标点、语法、连贯、清晰和句法做必要的更正或添加。（我自己添加的内容放在方括号【】中。）任何剩余的错误应归咎于我。我利用了她的单倍行距打字稿，加上几份她保存的其他文件，加上一些她告诉我们的故事，加上卫理国际传教理事会的代表1995年采访她的录音<sup>2</sup>中的少量内容，加上我对事件、人物和地点的个人知识。

希尔达日复一日的工作极少在她的回忆录中被详细描写。这些是无需多言的——她和厄内斯特几乎每天长时间在教会医院治疗中国或韩国病人。或者他们应对极为动荡的时代在外国生活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大大小小的危机。其中的大部分并不够戏剧性，没有被写进她的回忆录中。

希尔达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引用任何圣经字句。这就像圣经中的《以斯帖记》。你知道上帝贯穿希尔达和厄内斯特生命的始终，只是没有被一再明确地提及。希尔达不是一名神学家或牧师或圣经教师，只是一名医疗工作者和节俭的家庭主妇。

希尔达一再提及人名。对于大部分读者，多数名字并无意义。将这些名字印出是一种纪念这些人的方式，他们大多数现在已经去世很久了。

希尔达的回忆录中大量地提及雇来的帮佣。那可能会冒犯现代人的一些敏感之处。在希尔达和厄内斯特在中国和韩国工作时，没有那些雇来的帮佣，他们无法发挥作用。那里没有现代化的便利设施。每件事情都比在美国，甚至是十九世纪的美国，要困难和复杂得多。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和韩国，几乎每个人要么是雇帮佣的，要么是做帮佣的。并且，他们的传教工作在南昌和首尔，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希尔达和厄内斯特需要向经过或是来访的西方人提供某种类似旅馆的服务。有非常多的访客。最后，我以本人经历保证，他们待帮佣很亲切，付的薪水好于一般水平。

本书大部分是我几乎逐字逐句地使用我从希尔达的最终手稿中找到的内容。她的最终手稿缺失第三部分韩国章节开始的几页。我也使用了一些另一份草稿里的材料，它们比最终手稿的描写更为丰富，或者它们可以填补一些缺失页中的内容。我极大地编辑了这份草稿，因为许多材料已在最终手稿中，或是包含重复乏味的细节，比如货币日益通胀的信息。我还使用了希尔达1988年写给江西省人民医院管理部门的一封名为《南昌医院，1939-1951》的长信中的一些材料。书中的照片和展示的物品大部分是希尔达这些年来一直保存的。在她1985年访问中国时，她送出了一

---

<sup>1</sup> 希尔达·伊丽莎白·塞特 (Hilda Elizabeth Seiter)，后来名为希尔达·塞特·韦斯 (Hilda Seiter Weiss)，再后来名为希尔达·韦斯·安德鲁斯 (Hilda Weiss-Andrus)，1915年5月10日生于俄亥俄州马里恩附近，父亲哈里·塞特，母亲诺玛·塞特。

<sup>2</sup> Diana J. Allen, "Interview with Hilda Weiss", conducted at San Antonio, TX, April 26-28, 1995, © 1995 World Division, General Board Global Ministries.

个满是南昌时期照片的手提箱。她还在2006至2008年送出或丢弃了许多照片，那些本来可能丰富这个故事。

最后，对1950年和1951年初在中国发生的事的描述可能有点混乱，因为时间顺序可能有问题。我并不是总能辨明希尔达写的是哪一年。等到我誊写她的手稿时，已经太迟，无法向她询问。

伊丽莎白（贝蒂）·韦斯·理查德森，2008

# 第一次作为传教士到中国

## “什么事是决不会做的？”

当我是一个小女孩时，我认定有三件事是决不会做的：和牧师结婚、在学校教书和到国外传教。多年以后我学到了两件事：第一、不要用“决不会”这个词；第二、不要和主争辩。

我在俄亥俄州马里恩附近保守的务农社区长大，那里的生活简单、辛苦又美好。以前做孩子时我们打扮猫、和各种动物玩、听胜利牌留声机。我们的消遣是周日去三次教堂和周六晚去市里做每周一次的购物。我几乎每次都能哄爸爸给我买巧克力冰淇淋筒。（那时五分钱的冰淇淋筒比现在一元钱的还要大。）随着我们长大，我们常常和男孩们聊天。周六每个人都到市里，有男孩的时候，谁想和爸爸妈妈逛街？我和妈妈、妹妹常常在马里恩剧院看下午场的戏剧。我们看到了那么精彩的戏剧，比方说《茶花女》。我们会感动得大哭一场，然后在冰淇淋店喝冰淇淋汽水。一周的其他日子我们得上学。放学后我们要帮忙做家务：为厨房的火搬来木柴、帮忙挤牛奶以及做其他家务。我妹妹玛格达琳是所谓的“室内女孩”。那意味着我要做许多户外的家务活。因为我是两个孩子中年龄更大的，个子也更大，我还在田地里帮忙。

在规划将来的生活时，我父母很确定我应该当一名老师。我的一些堂表亲是老师。因为我是一个好学生，看起来教书就是我的未来。我上了一些音乐课程，表现得很不错。但当我看到一名音乐老师得多么努力的工作才可以谋生，我决定放弃以音乐为职业。我转而努力学习科学和数学。

正常地，我恋爱又失恋了六次。但我父母不同意我在十六岁之前约会。我从未打破这规矩。

高中最后一年是我人生许多变化的开始。那时大萧条开始。我的外祖父母梅耶斯一家破产。我们家的生活自然也有点被打乱。

就在那年，我们教堂有了新的学生牧师。他来自德克萨斯——你知道——美国的一个州。他让年轻人对青年组会有了兴趣。（那过去被称作艾普沃斯会。）在那些会上我们进行了许多严肃的思考，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快乐。我们中的一群人甚至去了俄亥俄州湖畔镇的肖托夸集会<sup>3</sup>，为的是能和许多其他年轻人在一起。我们一群人上了一艘划艇。我们中没人知道如何划船，并且只有一个人会游泳。上帝照顾着我们。事实上，当我们遇上一艘摩托艇，一定是他将我们的船扶稳。

那年我在毕业年级的戏剧表演中任女主角。如你可能猜想的，我爱上了男主角。但我还没到十六岁。

还是那年，春天的时候，我们的学生牧师厄内斯特·W·韦斯<sup>4</sup>将一群小伙从鲍德温-华莱士学院带到我们的乡村小教堂。他们全部加入传道工作。他们举办传道集会。

---

<sup>3</sup> 肖托夸集会像某种文化或半宗教的研修会，通常在乡村地区举办，那个时代在中产阶层中很流行。

<sup>4</sup> 厄内斯特·W·韦斯 (Ernest W. Weiss)，一个贫穷德克萨斯农家的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生于1908年10月25日，父亲弗里茨·韦斯，母亲艾丽丝·韦斯。他是弗里德里希·博姆法克牧师的外孙。

无论上学还是不上，我们每天晚上都参加。一个晚上，大卫·罗伯茨唱了一首歌之后，强烈的愿望推动我走向圣坛，改变我的人生，把它献给基督。回忆那时，我的生活并没有大的改变，但我有一段情感体验。我心底里明白那是主在和我讲话。我只收到一条信息，那就是摘下耳环。在那之前，我一直非常喜欢首饰。但直到今天，每当我戴上耳环时，我就会想起那个晚上。在我走向圣坛时，不是我的父母，而是我的一个婶婶陪着我。她想让她的女儿去，却没成功。我的父母对此很高兴，但几乎没有在言语上表现出来。

然后就是极为令人激动的毕业典礼。我表演了一个钢琴选段，G·D·威尔逊的作品号60《哈德逊河上的月光》。毕业后的那天却把兴奋一扫而光。我得了腮腺炎，不只一边，两边都是。这使我好几天都不能出去闹腾。春天晚些时候，六月，我参加了鲍德温-华莱士学院的一场考试，获得了一项奖学金。钱的紧张已经很明显。我的祖父塞特说，如果我和我的堂姐妹斯黛拉去上大学，他会出我们的费用。但斯黛拉决定不去上，我爸爸只得独自挑起这担子。

夏天的几个月，我母亲坐骨神经痛。她几乎不能走路。她被严重控制食物，很可怜。这发生在最忙碌的准备干草饲料和摘樱桃的时候。于是家里决定让我站到干草车上，将巨大的干草爪的两个尖钩插进干草，把干草运到谷仓的干草棚<sup>5</sup>里。我是个健壮的女孩，但用尽全力才能用牵引绳将干草爪拉到谷仓中央。当爪子抓住干草后，母亲把马赶向谷仓旁空场的另一边，干草就被运到干草棚里。然后我放松绳子，让干草爪落下。最后，爸爸把干草打捆，在干草棚里摆好。所有这些干草让我们的牛和马在冬月中有的吃。我们还要在我祖父塞特家做这种干草工作。在来来回回运干草的途中，有一次爸爸驾着空车前往田地，他遇到了一只臭鼬母亲带着她的四只小臭鼬。如果你从未见过这景象，那真是绝了。臭鼬母亲走在前面，她的小东西排成一条直线跟着，它们的尾巴高高翘在空中。黑白两色的花纹在小臭鼬身上还要更好看。我爸爸开玩笑极为厉害，又非常会讲故事。他能用他的故事让满满一屋子人快乐地度过一个晚上。当我们家庭聚会时，听父亲和祖父比拼谁的故事更精彩可太有意思了。有时候，他们的品味并不高。我无法想象，当女性离开时，他们会讲些什么。说回那天，我爸爸看到这臭鼬一家子，喊我们来看小臭鼬，鼓动我抓一只。母亲从车上探出身子，向我大喊，叫我不抓。年轻又愚蠢、刚从中学带着荣誉毕业的我在那些可爱的臭鼬中抓了一只。我认为我已让施放气味的一端远离我。但不知怎么的，那臭鼬特殊腺体的产物全冲向我，我从头到脚全被喷了特别气味。我扔下那美丽的动物，但伤害已经发生。尽管母亲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我还是被罚在干草车上干活。

---

博姆法克牧师是来到德克萨斯的德国移民，成为卫理会牧师。博姆法克牧师的儿孙等后人中有几位也成为牧师。

根据希尔达1985年写给江西省人民医院的信，厄内斯特从高中辍学。他不得不在德克萨斯州因达斯特里附近的自家农场里干活养家。在棉花田里干活时，他一次又一次听到上帝的呼唤，要他成为一名前往印度的传教士。这呼唤是如此强烈，他只得告诉他父母。他们很同情，说要想让内心平静，他必须回应这呼唤。这意味着回去上学，高中、大学和医学院。那一切都是在萧条时期。他的信念从未动摇。靠喝大量浓咖啡和母亲祈祷的帮助，他完成全部学业。尽管他在学习之外还要做到三份工作，他努力让自己的成绩名列前茅。

<sup>5</sup>干草棚是美国北部大型谷仓的上层部分。那里储存干草用以在冬天喂养牛马。今天干草由机械打捆，留在地里。所以已不再需要大型谷仓。

我正把爪子从干草棚的远端拉向车子时，牵引绳断了。我掉下车子，下落时翻了一整圈，我的背落在硬梆梆的木地板上。感谢上帝，地面不像有些谷仓是水泥的。痛得可怕，我几乎无法呼吸，更别说身上还有那“愉快”的气味，我感觉恶心。没人愿意靠近我。我们设法上了一辆道奇轿车，开回家，到厨房，那里有一张长沙发。母亲用热水和肥皂给我洗澡。尽管我很痛，她坚持要在医生来之前给我洗头，不只一次而是两次。X光在那时（1932年）是很贵的。医生（我的叔祖，塞特医生）给我检查，认为我可能有些肌肉严重拉伤。不过我非常痛苦，被允许留在楼下，睡在客厅的达文波特上。【达文波特是一种可以打开变成床的沙发。】

夏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几乎帮不上家里人。但我刚能爬就起来用一把伞当拐杖走路。直到第二年我才发现我的背部有两处骨折。

多年以后，当我完成我的护士培训，我认识到我的生命是被安排去做一些事情的。我可能因为那一摔终生残疾或者死去。不管怎样，初秋时我已准备好，渴望开始在鲍德温-华莱士的的大学生活。我获得特别许可，能在周末回家。那是因为我们的学生牧师从鲍德温-华莱士开车去向两处乡村教众传道：我们被称作锡安卫理教众，还有一处被称为伯利恒卫理教众。我和韦斯牧师很享受在那些路途中彼此相伴，谈天说地。不长时间我们就明白我们不只是朋友。到圣诞节，我们知道，用年轻人的话说，我们“有情况”。我亲昵地叫他“厄内”。在他向我求婚之前，他已经说得很清楚，和他结婚的女人不仅会是一名牧师的妻子，还会是一名医生的妻子，而最后会是一名传教士的妻子。并且如果他不能找到一名愿意和他一同前往的妻子，他也会一个人前往。圣诞节后不久我们宣布订婚。我必须承认，在他去医学院学习的六年间，我希望他能忘掉去传教的想法。我父母也是这么想。问题是我真的没有懂厄内。

在学年结束时，尽管有奖学金，我又做帮人临时照看孩子的工作，我父母还是无法继续供我读大学。厄内成功地从鲍德温-华莱士毕业，但这是很艰难的。他被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录取。我被辛辛那提贝塞斯达医院护士学校录取。至少我能接受教育，今后能谋一份工作。学费和食宿全免。【那时学习护理的学生通过照顾病人赚取食宿。他们无偿为医院辛苦劳动，整日整夜，几乎一周无休。】

厄内处在非常艰难的时期，尽管他在医学院上学之外还做着两三份工作。他抽时间每周来看我一次。周日我们一起上教堂。结婚被放到一边【因为他们都是学生，没有钱。那时学生不结婚，也没有可靠的生育控制手段。】毕业后，我白天继续大学学业，晚上做护士，以求获得辛辛那提大学护理学士学位。1938年5月我们结婚。到那时我已对一名牧师、一名医生以及传教工作说出“我愿意”。但是因为厄内在求学过程中欠下的债务，不知道卫理会传教理事会是否会接纳我们。即便他们同意，我们也还需一年时间才能前去传教。那是因为厄内要完成实习，而我在大学还有一两门课程要完成。

我的曾祖父母在他们家中主持了锡安卫理教众的第一次集会。我的祖父母塞特一家就像教会四柱石之一。他们赞成派遣传教士去世界尽头，但不是派他们的孙女！不过厄内已经或多或少获得他们的喜爱。他们像我父母那样，觉得既然我有他照顾，就不会有问题。他们对于将来之事简直是一无所知啊！感谢上帝没让我们提前知道那些事。我父母也有极强的信仰，定期上教堂，积极参加教堂活动。妈妈奉献她的音乐天赋以及其他才能，而爸爸是主日学校老师。周六晚，爸爸会早点结束工作，坐到他最喜欢的椅子上，准备主日学校课程。



在继续讲述之前，我一定要表示对贝塞斯达医院几位杰出的卫理会女执事<sup>6</sup>的敬意。她们知道厄内和我将要前去传教。在任何可能的方面，她们帮助我们培养灵性。她们以她们的祈祷、信件和资助支持我们。正如我常看到的，那些女性在照顾病人或完成其他困难任务时，总是以热情的态度工作，并且常常以加倍的善意去照顾那些其他护士不愿照顾的病人。周日，这些女性又服务于辛辛那提各处教堂。我总是希望我能有她们一样的勇气和意愿为基督的事业工作。只给出那些女性中的某个特定名字是不妥的，因为她们全都如此出色。

【厄内的梦想是去印度做传教士。在印度没有空缺，在江西南昌却有一个。所以中国成为他们的目的地。在1985年致江西省人民医院的信中，希尔达讲到为了帮助中国和她的人民，他们有必要尽可能地了解中国。幸运的是，在南昌服务的传教士夫妇布莱登伯格医生和夫人1938年来到俄亥俄州特拉华市休假。布莱登伯格医生帮助规划和建设了新南昌医院。他们向厄内和希尔达介绍了那里的西方人：伊芙琳·高、露丝·丹尼尔斯、勒兰德·贺兰德夫妇、卡罗尔·休斯顿、沃尔特·利比夫妇、威廉·舒伯特夫妇、格特鲁德·孔和玛格丽特·西克。

根据1995年的采访录音，希尔达童年时还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她八岁时阑尾穿孔。她在医院住了约一个月。在抗生素出现之前，一百个阑尾穿孔的人有九十九个死去。在她患病和住院期间，她敏锐地观察了她接受的良好护理和外科医生的治疗。】

## 在路上——1939

终于出现了一个我们被录用前往传教的机会。下一步是去位于纽约的传教理事会接受面试。我很兴奋，见到连绵的山脉【在去纽约的路上经过宾夕法尼亚时】和纽约市。我们的面试很顺利。我们觉得传教理事会中国事务秘书弗兰克·卡特莱特博士是一名真正的朋友，更像一名父亲。从那时起，所有事情都围绕着为前往中国做准备。我们是既兴奋又害怕。爸爸妈妈则是难受极了。直到我们1943年从中国回来，我们才知道这对他们的伤害有多大。在我们离开之后，他们种下一棵垂柳纪念我们，以为他们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1939年夏天，我们忙着向贝塞斯达医院的人们和我们的父母告别。然后我们去了明尼阿波利斯，雷纳斯会督那时在亨内平大道卫理会教堂任牧师。那座教堂募集了送我们去中国的资金【横渡太平洋的开销】。我们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和那里的人们在一起，他们为我们安排了一场告别茶会。那是个很棒的周末。我们之前刚去了底特律，见厄内的哥哥埃德温·韦斯牧师和他的家人。厄内的翘鼻在那里严重晒伤。他像煮熟的土豆那样脱皮。一定是我们的衣服看起来不够好，一名亨内平教堂的成员带我去购物，为茶会买了一条蕾丝长裙。它真漂亮。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住处是一名百万富翁的家。但那并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受到极好的礼遇，就像我们也是百万富翁。经过这些年，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在哪里，监狱、土屋或是总统的家，我们总能让自己感到舒适。

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那个周末之后，我们去宾夕法尼亚州凯恩镇【一个煤矿镇】我们的赞助者们【隶属卫理会教堂】那里待了几天。凯恩镇上一个查理·克莱兰德博

---

<sup>6</sup>“女执事”之名被给予代表美国卫理会作为护士、教育者或社会工作者服务的神职独身女性。

士和贝蒂·克莱兰德博士夫妇主持的主日学校班级希望资助一名传教士。两位博士的热情感染了这些班级成员，他们自己后来也都成为主日学校老师，尽管有的人搬去了其他城市。我们每次去凯恩镇就像是回家，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他们的奉献是非常棒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时间、祈祷和爱。我们对他们如此敬重、钦佩，我们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命名为伊丽莎白（贝蒂）。如果我们有儿子，他的名字会是查理。作为那个周末的纪念，我们有一张照片，厄内的鼻子脱皮，我穿着那件漂亮的蕾丝长裙，右颊上有一大片疹子。（译注：本书中有此照片，114页第1张。）

然后是和在北方的父母和朋友们告别，去德克萨斯看望厄内的家人并和他们告别。在那里准备我们前往中国的行程时，我们做了一件事。我们越过马塔莫罗斯的边境去墨西哥做短途旅行。我们原计划在那里吃午餐。但看到当地的肉铺和吃东西的地方后，我们决定控制自己的食欲几个小时。【记住，这是在1939年。】

乘火车去加利福尼亚的行程很长，但各方面我们都享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落基山脉的沙漠和山麓。这就像是蜜月，因为我们并没有度蜜月。我们的船从洛杉矶出发，我们抵达加利福尼亚就办理登船手续。还有时间给我们去旧金山看望厄内的表哥保罗·斯特莱特医生和妻子梅塔（在美国陆军服役）。这些年来，他们好几次帮了我们大忙。我们还见到了斯特莱特“姑妈”（译注：“姑妈”这个词用了德语），那时正和他们住在一起。斯特莱特医生【后来成为将军】带厄内参观陆军医院。梅塔关照着我，帮助我做一些必要的采购。第二天我们返回洛杉矶，在圣佩德罗上船。在码头旁我们惊喜地遇见埃蒂斯·弗兰茨。她是我在贝塞斯达医院产科病房的指导老师之一。我一直很喜欢她。

我们乘坐的是挪威船只索福克勒斯号。【希尔达二十四岁而厄内斯特三十一岁。】挪威人喜欢吃鱼——鱼汤，鱼布丁，鱼，鱼，鱼！让我来说，他们本可以把鱼留在海里。中午一闻到鱼布丁的气味我就去了你知道的那个地方，一连几天吐了好些东西到海里喂鱼。让事情更糟糕的是，我的丈夫，上帝保佑他的灵魂，竟然拿出一台全新的打字机和一本指导书。他说：“亲爱的，你有三个星期空闲时间，你可以学习打字。”这和鱼布丁可不会让我对丈夫增加好感。事实上他盘算着让我成为家里的秘书。他多么正确啊！他自己从未学好打字。在我们第一次在中国期间，我每个星期打大约五十封信【给支持我们的教会和个人、亲戚，还有理事会。那时没有复印机或电子邮件。】在后来的航行中，当大洋和我的胃都平静下来，我们得以和赴菲律宾的传教士弗兰克斯先生和夫人以及施帕尔小姐一起玩桥牌。他们都是可爱的人。

【根据1995年的采访录音，在航行中，他们通过短波电台得知欧洲已经开战。挪威籍的船长马上沉溺于酒中，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两个兄弟。挪威被德国打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被占领。】

然后我们看到了陆地，日本！第二天早上船上涌进一大群小个子的人。在其中一个人旁边，我感觉自己像个巨人。他们有大象的力气。他们搬运一箱箱行李，让我颇有怨言。我们尽快下船，前往帝国饭店【位于东京，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我们去拜访我们的朋友福田先生，他是我们要见的一名报社记者。他带我们游览这座城市，我们到访了一些寺庙。当我们进入寺庙，我们必须脱鞋，因为寺庙是神圣的地方。我们当然希望做事合礼仪，所以我们脱了鞋。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见到蚊帐。我们必须小心地放下床上的蚊帐，赶走所有不愿离开的蚊子，希望它们在外面待足够长时间，直到我们进入蚊帐。如果你睡得太靠近蚊帐，第二天你的皮肤看起

来就像起了疹子。除此之外，天气也很热。第二天我买了一把扇子。直到今日【写回忆录时】，我还在手提包里放一把扇子。如果我能保持我的脸凉快，我就很舒服。

第二天我们到大酒店见田代小姐。她是贝塞斯达医院一名实习医生的妹妹。她带我们购物，用日式晚餐招待我们。接着的一天，她和我们一起去见日本伟大的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多么高兴啊，和那么优秀又谦卑的人会面！当我们告诉他我们正前往中国，他能说的只是：“真抱歉，真抱歉。”我们回到我们的船上，那天晚上我们听到了关于战争的可怕新闻【希特勒在欧洲、日本在中国】。我们的船载我们到日本神户。我们吃惊地发现我们要等一个星期才有船去中国。我们入住东方饭店，在接下来的几天各处游览。我们全靠自己。相信我，我们几次遇到尴尬。我试着买鞋油，可我拿到的并不是鞋油。之后，我试着买科泰斯牌【卫生巾】，拿到的是库泰斯牌【指甲油】。

我们看望我们的传教士朋友，接下来的几天和他们待在一起。我们在那时正逢干旱。每天只有两个小时供水。供水时，我们肯定会去用水，因为天气太热了。那时那里没有空调。

一天我们前往小城奈良去鹿公园游玩。那里到处都是鹿，全都非常讨人喜欢，又不怕人。在公园门口我们买了一串饼干。一眨眼的功夫，它们就围着我咬饼干，又开始咬我漂亮的蓝色小皮包，那可是我亲爱的丈夫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几乎要哭了。我们可靠的车夫对我们说，让我举起手，手掌朝上。像是魔法，鹿走开了。

此处我想谈一下战前日本和人力车。这个乘坐人拉的车想法让我觉得恶心。我常常叫车夫停下，我下车走路。但当一个朋友对我说，我这是在让车夫难堪，我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我们不用他们就是夺去他们的口粮。坐在人力车上，我从未感到舒服。另外，我们那次在日本期间——在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前两年——人们显得过于礼貌，或者说是竭尽可能地礼貌。当然，我们不理解这种东方的不变表情，不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我们接受他们表现出的友好，并试着以我们美国的方式表现得同样礼貌。

雨在我们离开日本之前到来。我们看到男男女女跪在街上，感谢某个人。我断定他们都是基督徒，但后面回头看，他们肯定是在感谢他们自己的神。

在游览中，我们到了东大寺大佛殿。那里面有一尊巨大的佛像。为了给你个概念，大拇指有4英尺9又3/5英寸长。整个佛像由金箔覆盖。因为我们不能带相机上岸，我们只能买印有佛像的明信片。

最后，是时候乘船离开日本了，船名东京丸。在那时，当一艘船驶向另一个国家，会奏响许多音乐。那是非常令我们感兴趣的。但那次乐队演奏了《友谊地久天长》，把我的心情全破坏了。那曲子拨动我思乡的心弦，眼泪流了下来。

我们驶过美丽的中国海。这是一段相当平静的旅途，除了“船长晚宴”。“特色菜”是烤鹌鹑。我们都点了这菜。端到我们面前时，它看起来并无不妥。但切了一刀后，我们便意识到它只拔了毛。我飞速离开餐厅。

9月16日，我们凌晨三点半被叫醒，吃了三明治和咖啡。然后我们被安排乘一艘小船登岸，那是天津，通往北京的港口。

## 我们在中国的第一天

离船上岸后，我们在一个叫塘沽<sup>7</sup>的地方等待。就是在那里我们让行李接受检查并通过海关。然后我们女人（我和林瓦尔德夫人、鲁伯特夫人）去了塘沽俱乐部。“俱乐部”徒有其名，那里没有食品、饮料或洗手间。就是在那里我学到非常宝贵的一课，被“解放”了。一直到那时，厄内斯特带着我们两人的护照、钥匙、钱和证件。【他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来自一个父权制德裔家庭。】我带着的只有我的钱包和女人会放在钱包里的东西。我得了重感冒，还好我带着我的乘船用盖毯。男人们去查看我们去北京的票，并把我们的行李转到火车上。我们女人在“俱乐部”休息。

男人们在火车站买票时，突然门被猛地关上。门被锁住。建筑里还有大约两百名其他人。这是已经占领那部分中国的日本士兵做的。林瓦尔德先生是美国赴中国大使（译注：原文如此，未查到此人。），会说日语，他问清楚是前一天晚上一名霍乱病人到过车站。因此他们必须将那里的所有人隔离两周。短时间内，在车站的一角，一些草杆或类似的东西被搭起来用作洗手间。当然我们女人在俱乐部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一个戴着一顶宽大帽子（中国的雨帽）的男人走向我，问我是不是韦斯家的女人。我说：“是。”他说：“你家主人，他在监狱两星期。”（译注：此处应是日本人的生硬英语。）我在这里——没有钱，没有钥匙，没有行李，没有证件，甚至没有一封来信。林瓦尔德夫人发了火，去向日本领事投诉。在那时，美国人还有些特权。

与此同时，控制港口和车站的日本人改变了主意。他们对行李喷来苏尔或类似的东西，人群则走过一个装着那种溶液的浅池。然后他们释放了所有人。但那时我们已经错过了火车。那是最后一次我不带钱、钥匙、行李和证件旅行。大约下午四点，我们得以登上火车，出发去北京。

在那之前，天津已经发了洪水。我们花了三个小时通过洪泛地区。铁轨由沙包保护着。在铁轨两边，目之所及，全是水。我们抵达北京时已是午夜。那时这座城市完全处于灯火管制，因为中国那一整片地区已经由日本控制。那是个诡异的景象。我们又累又不安。但是感谢林瓦尔德夫妇，我们得以坐上一辆出租车。他们告诉出租车司机要去哪。我们出发。我们抵达目的地之前的时间似乎长得无止境。我们先在宽的街道上，然后是窄的街道，转向这边，转向那边，我们周围是高墙。出租车像是在喘出最后几口气。实话说，这时我吓坏了。我确信我们要被直接投入监狱。厄内斯特，一个保护意识很强的人，从不表露他的感受，并没有太多话要说。最终，哧地一声，出租车停下来，司机坚定地让我们下车。我们停在两扇又大又厚、有窥视孔的红门前。门上有个门环，因为我们看到门上的名字“华文学校”（学习中文的学校），我们就敲门环。长时间的寂静之后，窥视孔打开，一个声音问有什么事。我们试着解释我们是韦斯夫妇，是来学习的。我们最好再告诉他我们是美国总统和夫人。我们写了三封电报告知我们的到来。一封比我们晚到达，一封没有厄内斯特的签名，还有一封还在厄内斯特的口袋里，从未发出。无怪乎那人只是冷漠地盯着我们。我仍然记不起厄内斯特是怎样说服那人，反正他最后让我们进去，带着大包小

---

<sup>7</sup> 本回忆录中中国地名的英文拼写大多采用当时通行的拼写系统（威妥玛-翟理斯式或邮政式）。有些采用后来于1950年代开始推行的汉语拼音。

包行李。我们跟在他后面艰难地走着，感觉走了很长距离。事实上，靠着手电筒走到过夜的房间只是很短的距离。“监狱”终究也没那么糟糕。

## 在北京华文学校的一年（1939-1940）

我们在一个周六到达。第二天是周日，我们认为最好下午去协和礼拜堂【那里说英语】，希望能见到一些我们的卫理会传教士同仁。我们觉得有点奇怪，昨天晚上竟没人到火车站迎接，帮助来到异国的我们。当我们被介绍给我们的卫理会传教士同仁，你可以想象我们的惊讶和尴尬，他们不知道我们要来，也不知道我们到了。这里有个解释。那段时间纽约的传教理事会办公室正在进行许多改变和合并。所以一封介绍一对年轻传教士夫妇的信就不那么重要了。在必要的介绍之后，卫理会的传教士们开始关照我们，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因为我们的船到中国比预想的早了一点，我们是最早抵达的美国语言学生。华文学校那时挤满了英国人，他们被日本人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或商业的】据点赶了出来。你可以想象我们必须马上学习“钦定英语”，真正扭转我们的耳朵。一卷棉指一轴线，司康指一种饼干，夹子指的是吊裤带等等。但只花了极少的时间我们就学会这语言，在这些英国人中结识了一些非常好的朋友。

我们常被笑话不会打网球和骑自行车。我们首先应该投资的一个方面是交通工具。自行车似乎很流行。厄内斯特知道怎么骑自行车，但我？？？我很艰难地才学会双脚站立。所以为了学习，我们在英国人之前起来，去网球场。没花多长时间我就找到平衡，但网球立柱似乎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我本是朝着一根立柱的左边或右边。像是一块磁铁，我被直直地拽向网球立柱，“砰”地一声又撞上了。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但我最后还是毕业了，可以上街去体验一些真正有趣的事。厄内斯特对我很有耐心。一天清晨很早的时候，我们沿我们的巷子去大街（哈德门），跨上我们自行车，在逐渐繁忙的交通中骑行。那可是**交通**——巴士、有轨电车、骆驼、人力车、马车等——全都按着自己的节奏，并不分车道。为了到达目的地，每个人都可以向任意方向移动。我卡在有轨电车的轨道，失去平衡，摔倒了。一辆驴拉的车从我和自行车上过去。车主看起来吓得要死。我只是站起来，扳直我自行车的把手。厄内帮我重新上车，我们继续前进。另一次我就没那么幸运。我试图跟上两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卡在有轨电车的轨道，摔得很重，脚上一块骨头断了。那让我几个星期行动缓慢。

好吧，我们到北京是来学语言的，干正事的时候到了。在华文学校的第一天很累但很有趣。一个英文词也不说。我们的主管老师（“最爱”）是这么善于表演，我们能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我们完全不被允许说话，只被允许听讲五个小时。每半个小时换一名老师。这一年的后面，每半个小时，我们被分成小组。我们每天两次有私人老师。我们所有人都是接受同样进度的教育。一旦我们开始使用这种语言，我们要记许多东西。周六我们要去参观文化景点。课余时间我们被要求每周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并写汉字。一年的时间，我们对这种语言掌握得足够好，可以去任何地方旅行。我们还没征服报纸和中国文学。

“最爱”是我们的主管老师。另一位受到喜爱的老师是“金子”。（他有一颗金牙。）还有一位老师是“老虎”，但他没有哪个方面像老虎。

我们一位名叫格特鲁德·沃特曼同学也提前一点到了华文学校。我们很多时间在一起。事实上是厄内教她怎么骑自行车。她的平衡感比我好。一天早上我们三个一起前往猪市大街。从我们学校我们能听见猪叫。在那里我们发现成百上千的猪，每只猪的四只脚被捆在一起。它们被那样子用车从乡下运来。一路上它们都在叫。

我们在华文学校的一年是很有意义的一年，因为我们和来自不同宗派、不同国家的传教士近距离接触。这让我们感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到今天【希尔达写下手稿时，1970到80年代】我们仍和其中一些人保持联系。我们卫理会的传教士邀我们到他们家吃饭和访问，又带我们参观各个卫理会机构。我们永远不会忘了他们。

11月的一个周末，我们前往一处名叫定州的外围传教站。那里有一所很大的学校供美国传教士和商人的孩子上学。我们在阿尔格兰德一家做客。（译注：此处似乎有缺失或混淆，后面谈到的应是另一家庭的人。）我们不会知道我们以后会在韩国再相遇，而且我会和她一起在首尔的世福兰斯医院工作。她的名字是费斯·惠特克-奥尔森。

还是在11月里，厄内斯特、肯尼斯·科勒和克拉多克医生去看长城。因为在那时这是相当危险的旅行，只有男人前去，没有女人。在火车上他们受到彻底检查。就在登上火车之前，肯寄了一些圣诞包裹去美国，还剩下一些（捆包裹用的）绳子在他口袋里。这整团绳子必须解开，火车才被允许移动。克拉多克医生是英国人。因为他的英国护照，他的东西被检查得格外仔细。【日本和英国当时在整个东亚地区极为敌对。】终于火车出发了。

到了感恩节，我们已感觉很冷。温度比俄亥俄低，我们房间没法保持在70度。所以我们花钱买了长内衣和皮衣。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学到毛要穿在里面，而不是露在外面。这样要暖和得多。后来在南昌，我们在冬天穿蚕丝填充的衣服。

东方音乐和中国的其他声音在我们听来很是新奇。每个在街上卖东西的人都有自己的小调。剃头匠肩挑他的铺子四处走；另一个磨刀剪的人有他自己的调子。几乎每天我们都能见到一支葬礼或婚礼的队伍伴着特别的曲调通过街道。如果那时我们不去看，我们分不出【婚礼和葬礼的】曲调的不同。中国人自己也并不总能区分。还有送水的车和收马桶的车的嘎吱声。有时你可以通过气味区分。

街上的奇景之一是见到男人戴着瓜皮帽，留着长指甲（小拇指），拎着一个鸟笼。从朋友那里我们听说带着鸟工作是这里的习俗。

购物挺有趣。一旦你进入一个市场，你会很容易在众多小巷里迷路。但是东西很便宜，而且你看了足够久，就能找到你想要的。在外面吃饭就更有乐趣。中国食物从过去到现在都很棒。当然我要进厨房【在华文学校或是主人的私宅】是不行的。一餐饭开始时你先吃瓜子、花生。瓜子壳、花生壳就扔在地上。一块没有污迹的桌布是少见的。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只喝滚烫的茶，在吃东西前要把筷子在开水里浸泡一下，只吃做熟或烫过的食物。有很多习惯我们没学到，比如清洗口腔，在饭后用茶水漱口，然后吐掉。我敢肯定那些习惯中有一些现在已不再是习惯。有一种汤非常美味，只要你不过多地去想它是鸡汤。鸡被掏空【肠子去掉】，毛被拨去，然后用水煮。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我们一群人去吃晚饭。其中有两个人是第一次去。他们要我上菜。用一双筷子，我把整只鸡（包括头和脚）从汤里提起。当看到头和

瓜，一个新来的人面色苍白。我们破坏了她对中国食物的兴致。她的丈夫很喜欢这汤。

灰尘，灰尘，灰尘。一个讲究整洁的主妇要被家务逼疯。这里雨非常少。相反我们有沙尘暴。一天我去美容店洗头发和造型。在回家的路上我戴上中国丝巾，盖住头和脸。你能相信——坐了不到一英里的人力车灰尘就已透过丝巾到我脸上！你应该很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全年都会感冒咳嗽。尽管我们吃了很多大蒜和洋葱，鼻后滴流仍是一种常见症状。

1939年10月下旬，我们抽时间离开华文学堂参加卫理会华北年议会。对于我们这是极为令人激动的经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拉尔夫·瓦尔德会督。在我们离开中国之前，还将和他在各种环境下多次见面。

在继续讲述之前，我必须停下对中国艺术做些评述。每个周六或是下午放学后，我们去访问一些文化景点。北京满是这类景点。我们印象最深的访问之一是去天坛。那建筑！那艺术！一年两次，在11月和1月，皇帝会来到圜丘坛。在2月他会来到祈年殿。屋顶由紫色的瓦铺成，还有紫色与绿色的天花板。在建筑的一旁是一个祭坛，一只公牛会被放在那里。皇帝把他的善举写在一张纸上，系在公牛身上，将它献给天神。桥的另一边是圜丘坛。在你到那之前，会经过皇穹宇，它的四周是回音壁。回音的效果纯粹出于偶然；它并不是被有意建成那样。如果你站在墙的一边，对着墙讲话，墙另一边的人可以听清你的话，即使你在150英尺之外。因为中间的庙宇你不敢大声喊。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们到了美丽的圜丘坛。从远处它看着像一个三层婚礼蛋糕。它有将近30英尺高，顶层的直径大约50英尺。中心的石块是圆形的，被认为是宇宙的中心。皇帝在11月来到这里，在圜丘坛旁一处类似的祭坛上献上牺牲。这些庙宇已有大约600年，保存得非常好。

我在学习中文之外的一件乐事是教一个小组的中国年轻人英语会话。一天又一天不间断地学习中文会让一个人几乎垮掉。所以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做些其他事情是有益的。圣诞节期间我们请我们教的班吃晚餐，向他们展示如何吃西餐。后来我们教他们一些美国和英国的游戏。

圣诞节期间，宿舍“房管”张先生结婚。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了，一般认为他会再婚。厄内斯特和肯尼斯·科勒成为张先生的好朋友，受邀参与他的婚礼。我们一大群人被请去参加婚宴。宴会后张先生坐马车到新娘家中，向新娘的父母致敬。他赶回来，后面跟着新娘的队伍。他的新娘坐着大概八个人抬的封闭箱子（轿子）前来。一个中国乐队演奏大量响亮的音乐。然后是结婚仪式。张先生是基督徒，想要基督教仪式，但他的岳母坚持传统仪式。岳母是做主的人。厄内斯特进到里屋观看了整个仪式。依照传统张先生在仪式之前不允许见新娘。他在仪式之前一直问厄内斯特新娘是不是在哭。厄内斯特还没有被告知中国婚礼的详细情况，又想让张先生高兴。厄内斯特告诉他新娘看起来很高兴。这说的是错话。中国新娘在结婚那天应该哭，显得悲伤。在仪式之后，非常害羞的新娘和新郎一起从里屋出来，和其他宾客一起摆姿势留影。

圣诞期间我们有一场真正的享受。我们去听了由燕京大学合唱团表演的亨德尔的《弥赛亚》。他们有两到三百人，由布利斯·韦恩【卫理会传教士】指挥。我们不会知道1951年我们将和他及他的家人同一架飞机，厄内斯特会在字面意义上救他一命【在香港到伦敦的飞机上】。

圣诞假期到了，我们急切地想看看洪泛地区的情况如何。成群的人已无家可归。当洪水退去，救世军参与救援，做出了令人称道的工作。他们设立了两个营地，可以为九千人提供住处。一个营地有五千人，另一个有四千人。天津市内也设立了营地。洪水是一夜之间涨上来。堤坝溃决，人们没时间准备。天津的卫理会传教成员不得不在他们的二楼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城市之外，有些地方水仍未退去。你可以想象洪水曾经多么严重。容纳五千人的营地位于一块五英亩的土地上。小屋都是泥土建的。营地四周都挖了三英尺深六英尺宽的沟。沿着沟堆放着草垫，高出地面大约三英尺半，地面上也铺了草垫和土。每间小屋是六英尺半乘六英尺乘八英尺，由一条长屋隔成。一间小屋住一个家庭。在这些小屋之外还有三座其他建筑（一个框架覆盖着草垫，里面衬着纸，地面铺着垫子）。一座建筑是学校；一座是粥舍；一座是办公室；一座是厕所。（译注：原文如此，这样是四座。）所有人每天吃一餐，有一大碗小米粥。儿童在下午另外有一碗米饭。喂养五千人一天的花费是95中国元或者说9美元。容纳四千人的营地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运行。不远处是一个难民营，搭建的方式同样。但是那些人要自己找食物。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全部有能力离开营地。在这段时间里，居住在营地的一些人有了一些深刻的宗教体验。那天带领我们参观的是一些卫理会传教士（塞克斯小姐）。我们后来和这些卫理会传教士吃了点东西，然后访问了四处卫理会的教堂和医院。

饥饿不仅出现在那里，也出现在北京和北京周边。距北京约五十英里处有约两千人以棉籽和白菜果腹。你应该很能理解我们多余的钱全部捐给了救灾工作。

北京的公共卫生谈不上卫生。沿着我们两边是高墙的窄巷行走，不难见到男人对着墙小便的痕迹，见到儿童蹲在地上方便。小孩子穿着开裆裤到处跑，这样在夏天很凉快。小男孩常常跑来跑去只穿着上衣（没有裤子）。他们只有需要擦屁股时才必须跑去妈妈那里。这在夏天很舒服，但在冬天我感觉这些小孩子很可怜，冰冷的风吹进他们的开裆裤里。他们的小屁股被冻得青紫。

1940年1月1日，我们被头顶飞过的97架飞机吵醒。很快又有一队飞机过来。过了一会我们听到四阵轰炸。出现了各种报道。有两件事我们很确定：它们是日本人的飞机，并且，它们是向西边山区飞，朝着自由中国（译注：原文为“West China”，后面又以“Free China”解释，译为“西部中国”恐引起读者误解，本文中译为“自由中国”）。

此处我想谈一点政治。作为传教士，我们的理事会已或多或少地建议我们，我们前往中国，是作中国人的客人，去服务他们。我们被建议不要收养孩子，也不要借出或借入钱财。我们还应当远离政治。然而，那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我们生为美国人，生来有言论自由。我们觉得大声说出看法是对的。但是北京布满了日本士兵，我们小心不要惹出事端。通过岁月中国已融合了以前每个征服者。为什么他们不能融合这一个？我们试着闭上嘴但打开眼和耳，和中国人站在一起。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建议得到了回报。

1940年1月1日对于美国人很重要。我们要去拜访美国大使和我们的卫理会传教士同仁。后来我们会见识中国新年和它的各项庆祝活动。

在华文学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在主要课程之外有一门选修课。我选的是用中国毛笔画中国画。我学会了技术，但老师和我都清楚我的画看着就像鸡扒的。



读和写中国字的过程都很有意思。但当我们听到有七万个字和五十二种方言，我们泄了气。我头痛，还第一次需要戴眼镜。

1940年1月24日，学校放假让我们去参加一场葬礼。我们被认为应该参加。那是一个寒冷刺骨的冬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去。那是吴佩孚，一位重要的将军的葬礼。那是佛教的葬礼，所以在他去世三十天后举行。葬礼的形式是持续两个小时的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纸和木板做成的各种样貌可怕的魔王，用以吓退恶鬼。跟在后面的是纸做的军队和逝者的画像。然后是在一个大约七十人抬着的巨大木棺中的遗体。有乐队，有大量的人扛条幅、撒纸，等等。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街边挤满了人。据报道这场葬礼花费了二十万中国元。

2月7、8、9日，中国人庆祝对于他们而言真正的新年。我们不用上学。每个有点钱的人都会买新衣服、香和神的画像，带着它们去庙里朝拜。他们在晚上放漂亮的烟花。如果你学过历史你知道烟花起源于中国。商铺里售卖五彩斑斓的商品，包括有着凸出的眼睛和扇形的尾巴的金鱼。我们被说服买了一缸金鱼以求好运。这只是适应中国生活的又一步。一些富裕的中国家庭极力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过新年。

相较于美国人，中国人的个子较小。而我甚至不是美国人中的小个子。于是我发现买衣服很困难。我不得不每样都定做，包括鞋子。鞋的样子很好看，但鞋“型”一直不是很合适。那是因为中国人的脚短且宽，而美国人的脚更为长且窄。

对于美国人重大的年度社交活动之一是乔治·华盛顿舞会。它是在著名的六国饭店举办。所有美国人都会参加，并且必须穿着正装。好吧，因为我认为传教士不应该浮华，我没有正装。所以我必须在法国沙龙买一条长裙。那个夜晚先是可口的美式晚餐，然后是一系列节目。节目的最后环节是轮流报出州名【俄亥俄、德克萨斯等】，并被介绍给大使。接下来是跳舞，但我们此时离开了。

那一年我演奏钢琴的技能派上用场。有时我会在教堂为独唱者伴奏。达尔文·丁克斯先生是一名优秀的歌手，我常常为他伴奏。厄内斯特利用他极少的空闲时间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协和医学院访问参观。

我们每周有一次专题讲座，关于哲学、文化、民俗等。一次我们看了一次二胡演示。二胡有点像小提琴但又很不同。它没有五根弦而是只有两根，音阶上只有五个音符。我对此确定无疑——中国音乐让我耳朵疼。但是作为传教士我们会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几年后我买了一把二胡，上了几次课。

因为宠物鸟是中国文化中如此重要的部分，我们买了一对金丝雀。一天早上我们发现笼子里有一颗蛋，我们大喜过望。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小鸟孵出来。我们的邻居和我们开了个玩笑。尽管我们有医学知识，但我们拥有的是一对雄鸟或是一对雌鸟。在学校我们的确有一名老师是中国鸟类的权威。他启发我去观察鸟类。后来在中国南方，在南昌，我可以准确地辨认出许多美丽的鸟。为北京城添彩的鸟之一是喜鹊。

在春假期间我们作了几次短途旅行。一次是去西山，大约在北京以西十六英里。我们花了两个小时坐骡子上山。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访问了青【缺字】。还有一次旅行是3月30日去玉泉。日本人那天举行庆祝活动，因为他们接管了那一地区的政府（译注：此日汪精卫政府成立）。日本士兵全部出动。他们的飞机在北京城上空展示力量。日本女人全都穿着她们多彩的和服走上街头。玉泉是一处天然泉水，供应全北

京的用水。它离北京十二英里。泉水从一个山脚下涌出，流入一个湖。玉泉旁有洞窟。内壁上有石头雕成的像，保存得非常好。

又是沙尘暴。一个晚上我们坐人力车出去，见到月亮周围有一个巨大的圆环，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我们问车夫，他说那是沙尘暴开始的征兆。这是三月，我们将会到五月或六月才有雨。

不难见到：水稻秧苗正被用手栽到水下；谷子在驴子驱动的两块大磨石中碾磨；女人们在河边洗衣服。首先女人们把衣服浸在水里，然后用肥皂，然后搓揉，用棒子敲打，漂洗，再把它们挂在岸边晾干。

我们的中文正在进步。但是我们仍然会犯一些荒唐的错误。我为厄内订了一些睡衣。但当它们送来时，只有两件上衣，没有裤子。

我们第一次去看了中国戏剧。我们一名老师和我们一起去。听戏剧的同时，我们坐在那聊天，吃花生瓜子。舞台上展现出的内容其实并不多。观众总是需要一本剧情梗概来理解。舞台指导和演员们一起在台上，在这里或那里摆放椅子，布置场景。服装很优雅，表演很出色。

南昌的人们【卫理会传教士】已经写信给我们，请求我们尽快前来。他们已准备好一座房子。爱丽丝·利比夫人【卫理会传教士】寄给我们一份房屋的图纸。【南昌，江西省省会，在中国南部。有数个宗派的传教士驻在那里。它是传教活动的一个主要中心。厄内斯特和希尔达被“召唤”去那里接替利比医生和夫人。利比医生正病重，他和家人已准备返回美国。】

在结束我们在北京的学期之前，我们想去访问一处卫理会外围传教站。我们选择的地方是昌黎。我们得提前很长时间向日本人申请通行证，因为没有通行证没人能出北京城墙。

4月19日，我们提前结束了我们周五下午的课程，出发去昌黎。那是八个小时的火车旅行。果树正在开花，所以我们步行上山时景色很美。我们访问了一所教會的寄宿学校。学生收费三美分一天。他们在那里做的工作很出色。第二天是周日，我们换了个方向，向着另一座山步行，带着我们的午餐、赞美诗和圣经。我们在一个山坡上举行礼拜。从那里我们能看到著名的沙丘。返回北京时我们出发得很早，途中经过盐场。尽我们目力所及，全是一堆堆的盐。我们还经过了天津附近的一处曾被洪水淹过的地区。在一些地方依然有水。其他地方土地依然太湿，不能耕种。

大约这个时间，汇率是20中国元兑1美元。厄内斯特为了我的生日买给我一个樟木箱子，花了5美元。

春天是一年中的可爱时节。周六我们参观游玩。大概是5月11日，我们去访问著名的大钟寺，骑了十英里的自行车。大钟本身厚约一英尺，直径八英尺，高八英尺。它的故事是这样，某个皇帝想要做这口钟，但音调不能令他满意。有人建议铸钟时必须加入人血。最后一次铸造时，钟匠的女儿跳入炽热的液体。她的一只鞋留在外面。传说如果你靠得足够近听，你能听到女孩索要她的鞋。

靠近大钟寺的另一处著名景点是五塔寺（译注：原文为四塔，未查到，故改动）。它是一座单层建筑上面有五座塔。每座塔上都刻有小佛像，以及其他出名的雕刻。

五月带来温暖的天气、可爱的花朵和植物。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竹子生长，我是说**生长**！我们几乎可以看着它生长。我们被告知它有时一天长一英尺以上。第一天，你见到一根小枝条，第二天，一片林子！六月春雨到来，一切都成了**泥**。雨让我们留在室内有一个原因。**考试**的时候到了。到这学期结束我们要学会读一千个单词或汉字。

到了春天剪头发的时候。穷人在街边剪头发。街上的剃头铺很容易找到。剃头匠把他的铺子挑在肩上，唱着他的调子。扁担的一头是一把椅子，另一头是他这行当的工具。这样当一名顾客走近，他所要做的只是放下椅子，便可开始营业。大部分男人只是剃头，所以无需造型。剃头可防止许多头皮疾病。更为有钱的人去类似于我们国家的理发店。

我们得到消息利比医生已在南昌去世，那里立即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虑后的结果是我们最好还是多学习一点语言，同时避开南昌夏日的炎热【靠近热带，非常潮湿】。所以，我们参加了考试，收拾好我们的箱子，把它们经上海运到南昌。我们收拾好行李箱，前往北戴河的海滩。一名老师被指派和我们一起去。一个卫理会家庭亚特·库里一家，提出带我们去度夏，容许我们和他们一起住。他们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他们给了我们许多勇气、好吃的食物、学习的时间和许多灵性上的指导。我们的老师早上6点过来，我们一直学习到11点半，中间休息一下吃早餐。一天剩余的时间由我们自己安排。那些时间有部分用来学习。正是在那里我学会游泳。咸水确实比淡水能更好地托起你。

海滩的潮湿确实是个问题。风暴中水花会飞溅到走廊上。在阳光明媚的日子，海滩看起来像正在做清洁的房间。尽管有新鲜的空气和阳光，科勒家的小女孩病重，得了某种类似支气管炎的病。她的母亲菲丽斯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陪她在北京的医院住院。

7月的第一个星期，厄内和我在卫理会青年会的营地做医生和护士。医疗工作并不繁重，所以我们能在青年人中做些工作。我们被安排了一间有折叠床的房间。我们没法把门关紧，因为潮湿让门变形。一个晚上我正迷迷糊糊地要睡着，突然被惊醒，有某种东西落在我胸口。我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惊醒了整个营地。营地里的一只猫从因潮湿而变形的门挤进来，爬到抽屉柜上，然后跳到我胸口。我以为一只狮子袭击了我。

厄内真是喜欢戏弄人。他会在我们日光浴的时候掐我，或是朝我扔东西。我告诉他某个时候我也会让他尝尝这滋味。一天在海滩，玩笑开得太过分了。我快速转身还击，打中他的一根“浮动”肋骨。他不得不给他的肋骨上绷带。这让他一小段时间无法游泳。我感到很抱歉，但这确实让他停止掐我。

夏天最有意思的周边旅行之一是去沙丘。我们一群人雇了一艘船。我们花了大约一个小时到那里。我们带上了我们的早午餐——木柴、平底锅、鸡蛋、水果、面包和水。我们在四周走了一会，然后回头向船走。与此同时潮水已涨上来，我们不得不蹚水上船。我们发现我们正走在牡蛎床上。我们后来发现这些牡蛎沿着海滩一直迁徙。

在我们和其他传教士以及政府官员等这么多人的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在宽容对待其他宗教方面学到了很多。通过这些人我们听到了一些振奋精神的消息。这帮助我们对将来做好准备。

在夏天结束之前我们见到了传教士通常要做出的巨大牺牲之一：送他们的孩子回美国上大学。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事实上有多么痛苦，直到十九年后我们送贝蒂一个人返回美国。

还有一次周边旅行是去中国长城。我们离它很近，并且很确定错过就不会有下一次机会去看它。我们花了两个半小时乘火车。当我们下了火车，我们几乎被想让我们乘他们的驴子上长城的中国人包围。我们每人雇了一头驴，又骑了一个小时，然后开始步行。这里的地名是山海关。我们走或者说爬到一处瞭望点，它实际是长城的一部分。我们爬进去，想象我们是从窗口向外眺望以保卫皇宫的士兵。从这里我们可以在城墙上行走，翻过山。城墙大约三十英尺高，十到二十英尺宽。城墙在有些地方保存得很好，另一些地方则正逐渐垮塌。他们如何建设沿着中国边境、翻山越岭的长城，这是一大壮举。厄内和我之后从边上一条小路走到山顶，来到一处佛寺。我们坐下，喝了点茶。等到我们下山坐上我们的驴子，又坐上火车，最后回到海滩，我们真的非常累。但是我们很高兴见到了长城。

到夏季课程结束时，我们已学会读一千五百个中国单词，会写五百个。这是我们在华文学堂正规中文学习的结束。这是最后一次我们见到这么多语言学生，也是最后一次我们见到这么多华北传教士。我们很快就了解到传教士的生活似乎就是反复地说一个“你好”，再说一个“再见”。

我们收拾好我们的物品，乘火车去天津。然后我们乘一艘名叫开平的船出发前往上海。【上海是通商口岸和中国南方传教中心。】乘船沿海岸南下有时会很难受。路程并不长，但我只吃了脆饼和苹果，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我的铺位上。三天后我们到了上海，一座湿气腾腾、脏兮兮的城市。可是它也有生活中的各种乐趣，它是应有尽有、无所不有的城市，有来自全世界的人。那里有一个法国租界，也有一个英国租界。【所谓“租界”是中国沿海的一些地方，欧洲国家在鸦片战争和义和拳运动中窃取了那里的贸易特权以及其他权利。】我们原本希望只在上海待四、五天。可是过了近六个星期日本人才发给我们去南昌的通行证。那段时间格伦·富勒先生和夫人好心地让我们住在他们家。我们不知道小格伦和他的家人会在多年以后在韩国和我们的轨迹再次相交。比尔·富勒的影响使我开始爱上集邮。我们不会知道数年后我们会再次住进富勒家中，手臂上戴着红袖章【因为成了日本人的战争囚徒】。富勒家对进出中国的旅行者敞开。作为传教会的司库，富勒先生管理我们的资金和邮件，根据需要寄给我们补给。

上海到处是蚊子。必须在蚊帐里睡觉。上帝保佑不要让哪怕一只蚊子在你上床之前进入蚊帐。小玛格丽特·富勒说或许我们可以在蚊帐上剪个洞，等所有蚊子都在里面，我们可以把洞缝上，就能睡在沙发上了。尽管有盘香，你不能免于被这种生物叮咬。我忍不住想吸一管烟【体内的尼古丁可以驱蚊】。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采购。我们仅是食杂品的订单就是438美元。同样地我们还得买鞋子、厨具和一些衣服。这会是我们离开“文明世界”之前的最后一站。我们买的一件东西是相册，用来存放照相底片。多雨的天气和高温会让底片粘在一起。我们将对南昌的天气以及为防止食物和衣服发霉我们必须采取的措施有多得多的了解。

日本人两次来告诉我们可以出发，又两次取消了许可。终于离开的日子到了。在我们离开前我们让一个学生从上海带话说我们会在写信时用暗号，“杰西”代表“日本”。我们于1940年9月6日离开。富勒先生送我们上船。像通常一样我们晚了一些，差点误了船。我们有四件行李被忘在岸上。富勒先生设法找了一艘小船把它们送到江轮上。艾米·费舍尔生孩子，来到上海。她成为我们的旅伴，这太好了。【艾米·费舍尔是弗里茨·费舍尔医生的妻子。他们来自奥地利。费舍尔医生是一名犹太人，费舍尔夫人是非犹太基督徒。他们在希特勒上台时逃离奥地利。费舍尔医生不是传教士，但是在利比医生生病、后来去世的情况下，他被卫理会雇佣在南昌的教会医院工作。艾米·费舍尔是一名化验室技师。】

我们中、晚餐是日式，早餐则是美式。沿长江而上的旅途很顺畅。江水真是黄，直到我们到了南京。景色很美，一座山，又一座山。我们在芜湖停靠，海拉·沃特斯在那里工作。我们见到了著名的小孤山和被中国人用作防御工事的沉船。然后我们可以见到高耸的庐山，接着又在鄱阳湖停了一下。10日我们抵达九江。所有传教士都出来迎接我们。来的人有帕金斯医生和夫人、比丽·琼斯、皮特曼小姐、梅布尔·伍德拉夫、普洛格姐妹、梅布尔·汤普森、珍妮·林德和露西尔·利比。我们必须带我们的东西通过海关。我们的照相底片确实引起了麻烦，直到我们给检查人员看“正片”。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物品放进转运【缺字】，如此它们可以被运上火车。在去传教站的路上，我们见到了与日本人的战争造成的许多影响。为了前往南昌我们必须申请又一张通行证。

我们惊讶于这么几个人【传教士】在九江所做的工作。他们运营着两所医院、一所孤儿院，还有两、三所学校。利比夫人想在我们去南昌开始我们的工作前带我们上庐山一两天。但是“杰西”说不行。尽管有“杰西”，长江上仍然有美国军舰航行。我们得以通过军舰寄出不受审查的信件。

在等待通行证时，我们去医院看工作中的爱德华·帕金斯医生和普洛格姐妹。我们先去诊所。他们在生命活水医院的工作之外每天接诊50-200名病人。我以为我们已经在北京见到最糟糕的情况，但是这里非常可怕。这里有腿部溃疡露出骨头，还有其他溃疡带着腐臭的脓。有些伤口甚至有蛆。在九江陷落【于日本人之手】时，传教会收容了一万两千名难民，他们因为营养不良而有眼病、皮肤病以及溃疡。就在彼时彼处我向上帝祈祷，如果他希望我做他给的工作，他一定要多多帮助我。好吧，他总是做了他该做的。有时他似乎离开了，但那不是他的错，而是我的。

医院本身的景象也很让人揪心。灯光很弱；他们用吸水纸做纱布敷料；他们已用光乙醚【唯一的麻醉剂】和吗啡【唯一的强效止痛药】。他们获取医疗补给的唯一希望就是那些军舰。我们访问的第二所医院是但福德医院，有一所孤儿院与它相关联。

周四晚上我们正好在九江，那是夜祷会的日子。我们应当参加。这些人的诚心毋庸置疑。他们跪地祈祷——不是几分钟而是大约一个小时。我太累太困，几乎要睡着。这时不知哪来的一只蝙蝠找到它的目标，向我俯冲好几次。或许我是唯一的罪人。

我惊讶于传教士精美的家。但当我们访问过诊所和医院后，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在一天的工作后有一个精美的归处，否则我们会很快心理崩溃。

9月13日我们开始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程。因为火车只有每天一趟去南昌，我们必须准时到火车站。我们“时尚”地乘坐货车厢旅行。我们有三十名旅客加上行李。这不能说舒适，但也还过得去。尽管轨道是新的，我们还是要慢速通过山和湖。我们花了六小时，行驶一百五十英里。我们从九江发了一份电报告知我们的到来。像通常一样，它在我们到那之后才送达，所以没人在那里迎接我们。

## 南昌

南昌曾是一座拥有约百万人口的繁荣城市。现在只剩下约九万人。有钱又身体健康的人躲避日本人去了自由中国。只有贫穷和患病的人被留下来。日本人对南昌的占领不同于北京。部分区别可能是因为南昌距离前线只有五十码到两英里【日本人和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前线，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民众非常贫穷。他们靠着每天1-2美分的收入生活。不难看到中国人跳到运一袋袋大米到前线的日本卡车上。他们会刺破或撕开袋子，把掉到街上的米粒收集起来。

既然我们认为我们已掌握了语言，我们坐上人力车，前往医院。当我们到达，消息传得很快。所有的西方人都停下工作来看我们。这是十年来首次有新的传教士到来。【从大萧条以来。】费舍尔医生见到我们尤为高兴，因为自从利比医生去世，他每天要诊治多达两百名门诊病人。除费舍尔医生和他妻子艾米以外，还有四名传教士：贺兰德先生、丹尼尔斯小姐、高小姐和休斯顿小姐。

那里有一座小房子给我们。它以前是建造这所医院的布莱登伯格医生和夫人居住的。他们已经离开回到美国。房子有自来水但没有电。有一处漂亮的花园可以俯看赣江。院落周围是顶上有碎玻璃的高墙，保护我们以及我们的树木和花园【免于猖獗的盗窃】。我们有棕榈树、橘子树、柠檬树、柚子树、木兰、茉莉和合欢。

我们被要求立即在院外诊所工作，夏日正午的酷热消退后，在医院工作。我们在一个周五抵达。周日我们前往教堂，那里每个人都看着我们。我们试着运用我们的中文，发现我们学的是北方普通话。南昌的人们说南方普通话。这倒不是真正的问题。不过，因为战争【和来自各地的难民】，有五、六种方言在这城市使用。幸运的是，尽管他们不会说，每个人都能听懂普通话。所以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向一个人讲话，他会用方言对另一个人说，这人又向另一人，直到答复回到我们这里。

接下来的周一我们两人得在教堂说几句问候的话。下午早些时候，在医院有一个欢迎我们的仪式。当我们走过分隔我们院落和医院的“月门”，一声大喊让我们吃了一惊，“lai liao”，意思是“他们来了”。四周鞭炮响起。仪式很简单。先是一首基督教歌曲，而后是一段祈祷。院务主任张先生致欢迎辞，我们后来非常喜爱他。致辞之后是厄内的一段简短讲话，然后是中式晚宴。从那时起，我们一面在诊所工作，一面布置我们的家。

在诊所的第一天我们处理了二百三十七个病例。那里有四名护士和两名医生。因为燃料价格很高，我们用含甲醇的米酒“烧”我们的器械【来为它们灭菌】。我们把器械放入金属盘，然后将酒倒在器械上，再用火柴点燃。那是很简陋的灭菌方法，但我们没有什么可用的。在医院，器械用水煮。在手术室，器械用高压锅灭菌。正规的乙醇太贵，无法用于清洁伤口。我们用高锰酸钾代替。

病人拆开伤处的包扎，然后护士给他们重新包扎，并给一段清洁的绷带让他们带回家。病人把脏了的包扎带回家清洗。医生看新的病例和并没有好转又或发展新症状的病例。有许多婴儿头上有疖子和溃疡，还有蚊虫叮咬造成的感染，再加上营养不良。很少见到超重的人。你可以想象此起彼伏的哭声。我们把婴儿带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诊所在城市中心一座教堂，新民堂。

南昌医院建得很好，有中央供暖，自来水和电。它由沃恩、布莱登伯格、利比和吴绍青几位医生建造。因为战争下的条件，我们无法使用中央供暖系统和电。

医院位于日本人的军事区内，但诊所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在诊所看的患者需要住院，我们必须陪他从诊所到医院。诊所和医院之间走路要十五到二十分钟。我们所有人轮流陪病人从诊所走到医院。

因为在南昌和周边地区有许多方言，很有必要先为厄内斯特配一名翻译。李道立成为他的助手。李道立还负责收钱、登记病人和维持秩序。当病人等候时，圣经妇女（菲比·何）和王世清牧师利用这段时间作简短布道。下午我待在家中做事，而厄内斯特在医院。得有人待在家中写信给家人和支持我们的美国教会。我在需要时在手术室工作。一天下午厄内斯特做了一个大手术——他在南昌的第一个大手术。他从一名病人的膀胱取一块大石头。手术成功了。那对他的工作极有意义。如果手术失败，他可能不得不开。

我们到达时医院只有一个楼层开放。到了1940年10月，二楼需要被启用。

10月20日，我们有个乳突手术。那是周日。但因为那是个“成熟”的乳突，手术必须立即进行。手术持续了四个小时。到了下午5点半，天色已很暗，我们没有电。我们有一支手电筒和三、四节电池。贺兰德先生站在凳子上拿着手电筒为手术照明。厄内斯特、弗里茨·费舍尔和我在手术台上。我们直到7点才结束。手术过程中电池用尽，必须让人去街上买。我们不能用炭火盆取暖，因为我们使用乙醚。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能用煤油灯照明。尽管有各种困难，病人活了下来。我们那时没有抗生素。

到10月28日，我们有四十三名住院病人和八名护士。老葛是我们准备手术室的护士，而范先生（护士长的丈夫）是手术室主管。

大约11月7日，厄内斯特做了他的第一个截腿手术。那就像签署一份必死通知，但手术必须做。他们没有办法获得义肢。

11月9日，我们有一个罕见的手术，手部静脉曲张。手如此之大，患者戴不上手套。事实上他已经无法使用他的手。更糟糕的是，那是他的右手。厄内斯特告诉患者，手术可能会让他失去大拇指和食指，还会大量失血。可能会出现致命的大出血。这患者是A型血。他的运气不错，厄内斯特和我都是A型。手术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正如我们害怕的，患者大出血。他接受了一品脱厄内斯特的血和一品脱我的。我守在他旁边一整晚。当他脱离危险，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他现在失去了大拇指和食指，但他能戴手套，能很好地使用他的手。

厄内斯特还遇到一名患者，他患肺结核，可以通过卧床休息治愈。这名患者是家庭唯一的支柱，说他必须回家工作。厄内斯特和我许诺，如果他能留下休养，我们会帮助他（每月6中国元，相当于50美分）。大部分肺结核患者来的时候已太晚，无

法治疗。根据统计，那一地区40%的人有某种程度的肺结核。许多孩子有结核性脊柱炎。他们几个月打着石膏，这是那时的治疗方法。

在南昌操持家务真是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找白铁匠做小炉子，做罐子储存面粉、糖和水。尽管我们的房子建有暖气炉，我们买不到煤【因为战争】。事实上铁皮炉子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热，但是冷却的速度同样快。炉子的烟囱穿过天花板，这样它在经过楼上时外面有一个储水的容器，保存热量为卧室驱走寒意。铁皮罐防止老鼠、白蚁等破坏食物。

因为燃料问题，我们几乎不用厨房的大炉子，除了每周烤一次面包、蛋糕或派，或者当我们来客人时。厨房的大炉子加热进入浴室的水。上帝保佑，不要让任何人妨碍我们周六晚上洗澡。泡浴缸真是奢华的享受。你应该很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吃美式食物【因为制作既不方便又昂贵】。

天气开始变冷。室内温度在五十到六十华氏度之间。这种情况下已没办法让医院的病人洗浴。不过，一楼有一个小房间，我们可以用小铁皮炉加温。我们把病人带到那个房间为他们洗浴。帮助洗浴的护士或护工穿着夏天的衣服，整天待在那个房间。通过那样的方式，每名病人至少每周洗一次澡。

我们传教士觉得非常需要使用我们自己语言的周日礼拜，并且要有一个时间一起祈祷和研习。所以每个周日下午4点左右我们会有一场礼拜，由贺兰德先生或厄内斯特主持。类似地我们每周有一个祈祷会。

一封来自家里的信说塞特奶奶在车祸中离世。这是近亲中第一位离世的，很令人震惊。我们不可能再去奶奶家过圣诞节了。

在和我们的中国职员交谈后，我们觉得招待一下我们必须每天打交道的几名日本官员会让事情容易些。因为其中有些日本人会说德语，而我们也会说德语，这事不太难。【厄内斯特和希尔达都来自德裔美国家庭。】我真的相信，我们首次在中国期间后面的日子因为那次晚宴而变得更容易。

到此时，我们已花出不少钱，可以弄清楚我们的开销有多大。对于我们两人，食物和木柴上的花费一个月大约14美元。衣服、被褥和其他东西相当贵。

12月10日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利比夫人带孩子们启程回家。她不是一名护士，但她能做护士的工作，帮助我非常多。我们全都帮着收拾行李。她必须做一个详细的单子，列出每件她要装箱的东西。她离开那天，位于市郊的过江桥梁正在维修。所以我们只能坐小船过江，到火车站送她。安全措施很严，因为爆炸事件变得更加频繁。

就在圣诞节前，我们有一场天花恐慌。每个人都要接种疫苗。尽管我们最后一次接种是见效的，我们觉得不再次接种不安全。

我们在南昌的第一个圣诞节和北京的那次大有不同。然而，它如此有意义。在诊所我们为全部患者表演了节目。这些年来，休斯顿小姐一直为传统的圣诞节目制作和改良服装。节目后，她非常小心地打包，供来年使用。这些出彩的服装，加上她的指导和心意，给节目注入真正的意义。我计划为圣诞节制作饼干和蛋糕，但缺少许多原料（比如卡罗牌玉米糖浆）。作为代替，我们用“米糖”制作了其他东西。我们为我们的助手准备了礼物。礼物是些实用的东西，比如一块布料、肥皂、毛巾、火柴以



及和我们一起享用好吃的圣诞大餐。我们和我们的西方同事交换罐头之类的礼物。每个医院工作人员得到2元奖金，加上有荤菜的美味圣诞大餐。

圣诞节的早晨我们被唱圣诞颂歌的人唤醒，他们约有三十人。习惯是给他们饼干和橘子（南丰橘）。早餐后我们前往医院，确保每名患者得到一张用过的圣诞卡【卡片漂亮的正面，由美国教会的成千上万人的寄给传教士】。我们在病房举行一场简短的礼拜，然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属有一场小型礼拜。我们和中国工作人员一同进餐。晚上我们请所有西方人到我们家吃圣诞晚餐（鸡肉、土豆泥、酱汁、菠菜、李子布丁和一样奢侈品——来自上海的罐头豌豆）。我们非常想念我们在美国的家人。说实话，我们很想家。

## 1941

新年也和在北京时不同。没有烟花，因为我们过于接近前线【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前线有时离我们一英里，有时近不少。事实上，有几次我们如此接近战线，我们在行李箱里装好换洗衣物，以备我们不得不紧急撤离。新年前夜我们传教士聚在一起，重读圣诞故事，并以祷告结束。还有比跪着迎接新年更好的方式吗！

大约这个时候，厄内遇到他在医院的第一个产科病例。通常婴儿在家出生，所以这是少见的例外。是个男孩！而且是第一个孩子！还有更好的事吗？按照习俗，数天后我们被请到家中参加庆祝新生儿的晚宴。

大约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一个白俄【白俄罗斯人】（译注：注释的理解不对，白俄是因苏维埃革命而流亡海外的俄国人），名为鲁斯金斯，受雇于上海的一个电力公司。他喜爱苹果卷。每次他来见我们，我们做苹果卷吃。后来我们在上海见到他的一些家人。

新年的第二天，包裹到了，包括手术器械在内的一批医院补给品也到了。这就像又过了一次圣诞节。

因为韦斯医生在他的第一个产科病例中帮助诞下一名男孩，其他妇女开始来医院生孩子。其中一人的分娩持续了三天。那次使用了器械【产钳】。那位母亲做的第一件事是求厄内告诉她孩子是男是女。如果是女孩，她无力抚养。如果是男孩，她就得想办法来抚养。

1月13日，我们开了一个应对危机的会议。我们如何能节约煤和水？我们医院的泵状况很差。没办法修理。它是手动泵。这个泵要为两百人服务。以现在的速度我们只能在早上为手术室的東西消毒。

我们的花园已经非常棒。我们有紫罗兰、水仙花、茶花、紫菀一类的花、百日菊，以及其他。我们有萝卜、芜菁和莴苣。在后院我们有葡萄柚、柠檬和橘子。你可以说它是一块天堂。

说回到美国，我妹妹正在和一个年轻人交往，考虑结婚。她怎么能不经我们同意就考虑这样的事？【一本正经】当然我们明白我们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经我们同意，她和比尔·弗拉赫结婚了。她的选择再正确不过。【比尔·弗拉赫2007年去世。】

1月27日是中国新年。对于中国人这是一年的重大节日。所有人都相互拜访。我们至少有170名访客。晚上我们去医院的诊所参加节目。那个晚上医院工作人员，包

括厄内和贺兰德先生，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才华。我的合唱团表演了一个曲目，而我表演了一曲钢琴独奏。其间我们吃花生，那里的花生像米粒那么多。节日持续了三天。如果你没有准备食物【来招待客人】，那就太糟了。

2月的一天，日本官员过来给我们拍照。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战斗越来越近。夜里声音很大。

在那时鸦片战争的后果在中国仍然非常真实地存在。我们仍会遇到试图摆脱毒瘾的新患者。他们到来时骨瘦如柴，皮肤苍白，没有食欲，带着特有的呆滞目光。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受到排斥，因为患者为了抽上一口会做任何事情。我们有今天的现代治疗手段就好了！在那时，他们经受的治疗完全是地狱，但我们帮助他们当中许多人挺了过来。他们很感谢那些他们濒死的日子。有时候在治疗过程中他们变得非常狂躁和危险。但我们都没有受到伤害，而且常常为他们和我们自己祈祷。

作为一种特别的享受，我过去常做法奇软糖或热巧克力。但糖越来越稀缺，似乎吃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好吧，不吃糖有益于我们的身材。

1941年3月，和春天一起到来的还有臭虫。我在美国只见过一只。但我立即就认出了这种生物。那时我们没有DDT。它们困扰着所有病人，但打着石膏的病人受害最深。我们用喷灯“烧红”铁床，把床腿浸在一小罐煤油里（那些罐子之前是装日本桔子的），清理干净草垫和枕头，更换石膏，把床搬离墙边。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就足以让我们觉得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值得的。病人很喜欢看到我拿着喷灯过来。他们知道一段时间内他们的床上不会有臭虫了。

我们必须提高医院的工资。提高之后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1.5美元。这只能够维持生计，但这是医院最大的能力了。

从家里来的信到得越来越慢。只要有大规模的战斗，邮件就会停止。终于信到了。我们只是不停地写。从1939年9月到1941年2月，我打字并发出1000封信，还不包括业务上的信。

那些日子上午排满了大大小小的手术。我通常会参加大手术。因为天气较冷，门诊现在下午进行。我们空闲时间做什么？厄内斯特打理花园，他是个出色的园艺师。我们有时打网球，而我许多时间都在弹钢琴。我们晚上的时间则用来招待医院的不同人群。

不用多长时间你就会注意到麻风病人。他们可以说是到处乱走。没有法规隔离他们。附近有个地方他们可以去，但他们拒绝去那里。所以其他人又被感染。那时的治疗方法是臀部肌肉注射大风子油。注射很痛苦并且不总是见效。它确实能延缓病情。这药不容易获得，并且很贵。医院附近有一座麻风病院，但那时没有法规强制麻风病人去那里。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养蚕很有兴趣。有人好心地给了我一百只刚孵出的蚕。厄内斯特也对它们非常着迷。我们以前常常坐着看它们，像两个小孩。他能做的仅止于此，因为他太忙，没时间帮忙为它们采集嫩桑叶。一百只蚕吐出的丝足够做一只丝袜。

【希尔达手稿中丢失的一页显然是讨论了对蚕的照看和喂养。我自己记得对蚕的照看和喂养。刚孵出的蚕像这纸上的数字“1”那么大。每天，随着它们长大，需要

小心地把每只蚕从昨天的桑叶上移到新摘的嫩叶上。当它们很小时，那是精细的工作。你必须用羽毛或小刷子来移动。随着它们长大，它们吃得更多，它们更容易被转移，它们也排出更多便便。】

……蚕不停地吃，长到和我小拇指一般大（我的小拇指挺大的）。然后我的朋友告诉我把一个抽屉装满草杆，把幼虫放在草杆中，让它们吐丝。它们要吐丝时会高抬起头，近似圆形地摆动。我们看着它们吐丝作茧。它们不停地在茧中吐丝。最后它们慢下来，停止。那就是时候把它们带到学校【卫理会的学校，和医院隔一条巷子】，在那里它们被扔进一大桶沸水中。有个拿着一双筷子的人会用某种方法把丝缠到筷子上，然后不停地转动筷子，直到丝全部离开茧，露出里面的幼虫。之后，喜欢吃幼虫的人会把幼虫蘸上酱油，得到一份免费的午餐。我有理由赶紧离开。此时，如果允许蚕茧继续休眠【不过沸水】，到时候一只蛾子会咬破茧出来。蛾子们会聚在一起，交配。我放了一张纸让雌蛾产卵在上面，留给下一季。当下一季到来时，我把带有卵的纸放在我的衣服里孵化，在我填丝衣服的内衬里。哇！我有了新一批蚕。在蛾子通过在茧上咬个洞出来后，茧不能再用于缫丝做成袜子或衣服。但作为“断丝”它仍是好东西，可以用来填充在我们的冬衣里，非常暖和。

我现在全部时间在医院工作，很少有时间去诊所。当厄内斯特有大手术，我会在手术室里。其他时间我做清洁、清点物品和驱虫。4月16日我们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病例。一名女子，体重约一百磅，看起来像怀孕十二个月了，从农村来到医院。她的家人取笑她，因为她并没有怀孩子。最终，出于绝望她走了很远的路来到医院。这是个有风险的手术，这名女子知道这一点。厄内斯特重达四十磅的卵巢囊肿。我们在手术前给她拍了照片，手术后称了囊肿。感谢上帝手术成功。手术后她看着非常瘦。在她离开医院之前，她成了一名非常活跃的基督徒，向病房的其他病人传教。在她离开之前，又一名卵巢囊肿重达二十磅的女子来到医院。她害怕做手术。我们这名刚成为基督徒的女子鼓励她说，她不应该害怕，因为基督教的医生有上帝保佑。前一名女子离开时满怀喜悦，走向她的村子。后来我们听说她村子所有人都因为她的见证信了基督。

到了4月，真正的春天、或者说夏天开始。医院的墙壁和排水管道凝出水珠。建医院的人忘记将南昌的天气纳入考虑。

4月15日，我们遇到第一个脑膜炎病例。因为我没上过关于隔离技术的进修课程，我感到确实缺乏处理传染病的知识。但我们都做到了我们的最好。据我们所知那时没有出现其他脑膜炎病例。

4月17日，一封来自纽约传教理事会秘书的信中说美国和日本的关系越发紧张，我们应当考虑撤离。我们要做出决定。自然地，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为此祈祷。我们决定留下，并写信将决定告诉我们的家人。我们还说如果事情恶化，我们不会回美国，而是去自由中国。

我们的一名男护士（“小李”，李道立的儿子）患上肺结核。像许多人一样，他迟早得休息。

5月，我们12月从上海订的补给品到了。**我们太高兴了！**箱子里面装着罐头、咖啡、可可、木薯、奶粉、香草和园艺种子。从上海订的货物中，有医院的补给，也有少

量个人物品。有一些厚内衣是给厄内的，他很需要这些衣服。这些物品要维持我们生活很长很长时间。

到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中的累和泪开始造成损害。厄内和我都瘦了，并且厄内的胃出了问题，似乎是十二指肠溃疡。

大约那个时候，在医院存放亚麻布的小房间中发现了跳蚤。那时消灭它们的办法是密封房间用硫磺熏。

大约那个时候，我们还为医院接上了电。我们已经为此向日本人请求了很久。

老鼠正在制造麻烦。我们必须买猫。

【手稿的第26页丢失。我相信关于跳蚤的著名故事可能就在那一页上。厄内斯特和希尔达在他们家中遇到了老鼠问题。使用美国奶酪的老鼠夹不起作用。这些是狡猾的中国老鼠。鲁格小姐，一名中国内地会的老式作派的英国独身女传教士，提出让他们借用一下她的猫。她坐人力车带来她的猫，而猫一下就跑到烟囱上。每天晚上希尔达为猫准备好牛奶，每天早上空牛奶碗旁的地上到处都是带煤烟的猫爪印。几个星期后，鲁格小姐回来取她的猫。她喊猫，猫立即跳到她的腿上，两个一起坐着人力车离开。是的，老鼠现在都没了。但老鼠身上的跳蚤留了下来，四处传播。怎么办？厄内和希尔达的帮佣有办法。这名帮佣和他的儿子卷起他们的裤腿，来到屋里。他们发出奇怪的细小吱吱声。很快他们的腿上布满了跳蚤。他们出来，杀死跳蚤，再来到屋里，反复几次这个过程。很快所有跳蚤都被除去。】

由于可怕的高温和潮湿，衣服和书本发霉了。在一个晴朗干燥的日子，我们的书本和衣服都被拿出去晒。

随着政治局势恶化，我们的一些护士和助手离开。那使我们的工作负担更重。1941年7月28日，日本在美国的信用额度被冻结。7月29日，美国在日本的信用额度被冻结。8月1日，日本船只被阻止从旧金山驶离。8月2日，美国不再售卖丝袜给平民。8月9日，除电报服务外，所有和日本的联系中断。

到这个时候，我对自己使用中文的水平颇为自豪。但在处理日常用语之外的情况时，我碰到困难。我粗缝一件衣服，做出许多褶子。因为我们没有缝纫机，我找来裁缝做精缝。当我下午早些时候回到家里，我发现裁缝正在熨衣板上熨衣服，他已去掉所有褶子。我不得不再次做出那些褶子。

天气热，政治局势紧张，我们的脾气变得很急躁。我们发现自己和其他每个人因为小事争执。那时没有电扇。

8月1日，我们医院来了一个阑尾穿孔的孩子。这孩子在没有抗生素【还没有发明】的情况下活了下来。这在那时是少见的。

我们遇到不少血吸虫病人。那时的治疗方法相当严酷，病人需要很多护理。他们服药后便陷入沉睡。在床上他们不自主地排便。我们必须清理床铺。今天的治疗方法大不相同。病人因为在江中洗澡而感染血吸虫。

9月6日，我们的一名护士林小姐阑尾炎发作。她母亲不同意手术。我们不得不大费口舌说服她，因为这是林小姐的第三次发作了。那是深夜，城市已停止供电。我们必须准备脊髓麻醉。我们没有真正的麻醉师，有时会遇到问题。这促使厄内斯特为

脊髓麻醉设计了一个特殊的手术台。它非常有效，厄内斯特得以在手术中控制麻醉剂量。不幸的是，这个手术台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在那种情况下，黄先生，一名双腿截肢的人，用乙醚麻醉。黄先生曾是一名街上的乞丐。利比医生训练他使用乙醚。不幸的是，他不能识别使用乙醚过程中的危险信号。这是厄内斯特专门为脊髓麻醉设计手术台的主要原因。我总是希望厄内斯特能写出他的病例，写文章谈他在手术室使用的方法。但他一直没有时间，也没有口述记录机。

我们有许多阿米巴痢疾的病人。我们还有依米丁（治痢疾的药），但不多。有一种中国草药很好，今天仍在使用。我想它的名字是“Ya Tzu”或“Ya Dan Zu”（译注：不知究竟是何物，只好保留原文拼写）。

这是当时医院工作人员的名字：

代理院长	勒兰德·贺兰德先生
院务办公室	张先生 李道立 伊芙琳·高
诊所	？
牧师	王世清
内科医生	弗里茨·费舍尔医生
外科医生	厄内斯特·W·韦斯医生
护士长	范夫人
范夫人助理	希尔达·韦斯夫人
手术室主管	范先生
手术室主管助理	老葛
病房护士	何先生 何夫人（曹小姐） 李先生（小李） 张小姐
康爱德妇幼医院护士	林小姐 齐小姐 赵小姐

九月初，我们看门人唯一的孩子，一个名叫巧巧的小女孩，因为肾脏问题而病重。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每天早上送一朵小花给我戴在头上。（这种花闻起来像香蕉。）几天后她死了。她是个收养的孩子，因为父母生不了孩子。她是遗弃在江边被发现的。没有殡仪馆，也没有防腐处理。这家人做了个松木棺材，里面铺上白布，撒上许多漂白粉，把孩子放进去。简短的葬礼过后，棺材被埋在地里。当我听着土落在棺材上，那几乎令我无法承受。就在那一刻，我决定我的葬礼要简单。我甚至考虑过火化。

消息越来越糟。列宁格勒9月25日陷入德国人之手。在自由中国，长沙陷入日本人之手。接下来的几天，声响非常大。传言说中国国民党离这里只有三十里【中国的距离单位，就像码或千米】。

不管这些声响和不确定性，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除了医疗工作我们还有宗教活动，不仅仅是和我们职工一起，还和我们的病人一起。每隔一天，我们在每间病房有一个十五分钟的简短礼拜。我们在病人中传递印好的歌曲，给他们解释，教他们读和唱。一天中，我们会听到病人唱那些小调，但到了一天结束时，你已很难辨认出曲子原来的样子。他们非常喜爱的歌曲之一是《我家乃在天》。

因为夏季的炎热，我们本该去山上休个短假。我们得先到九江，再到牯岭。卡罗尔·休斯顿和费舍尔医生去了几天，然后因为世界局势不得不回来。我们其他人没能前去。拉尔夫·瓦尔德会督和夫人正要过来，举行会议，和传教士们会面。他们为我们所有人带了糖果和奶酪，但他们在九江被迫折返。

十月上旬，我们一名护士，何先生，向我宣布他和曹小姐要结婚。她是一名护理助手。何先生的第一任妻子在生孩子（第六个孩子）时去世。他问他是否可以在我们家举行婚礼，还问我是否愿意弹奏婚礼进行曲。这是我的荣幸。我告诉贺兰德先生此事。另外，厄内和我荣幸地接受邀请，成为新郎、新娘的孩子的教父、教母。何先生夫妇没能等到我们兑现这许诺，因为我们在南昌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十月上旬，我感觉不太舒服——有点恶心、发烧和腹泻。何先生计划在10月10日举行他们的婚礼。那天被称作“双十”，在中国是一个重大节日【中国成为民国的日子】。婚礼那天我感觉很难受，但婚礼必须继续。我不但没有感觉好点，反而更加难受。费舍尔医生认为我可能怀孕了。我有点笑话这种说法，因为已有两名医生告诉我我不会有孩子。但不久之后兔子测试【当时的测孕方法】证明我错了。因为大家认为有很大可能我不能怀孩子到足期，厄内斯特和我决定在容易流产的时期过后，我应该去上海，再到马尼拉【菲律宾】，等他过来。如果事情恶化，我会再去美国。于是我们申请通行证。我们等。通向我们院落的一个江边的门被封闭，一个星期后其他门也被【日本人】封闭。我们的通行证申请被拒绝了。当我们问日本人为什么，他们变得很生气，最后说了一句：“现在没人能走！”很难写信告诉爸爸妈妈我们的申请被拒。更糟的是我不能告诉他们我们要生孩子了。他们会担心坏的。

十一月很冷，木柴很稀缺。我们不能为病房或其他房间供暖。我们的确在手术室里有个小铁皮炉。当要用乙醚作麻醉剂时，我们只能用热水袋为病人保暖【乙醚是易燃的】。对于早产儿，我们将童床铺上垫子，垫子下面放热水袋，用作保育箱。

12月4日，一封来自会督的信敦促我们所有人从南昌撤离。他不知道我们已经申请通行证可是被拒绝。他也不知道我们要生孩子了，而我已瘦了约二十磅。中国人对我非常好，拿来各种美味调动我的胃口，但却没有效果。李道立甚至找来一罐美国腌洋葱。我尽力每天在医院工作，但午饭一送到病房，我就像被狗追赶的野猫一样消失了。到了12月1日，我开始觉得好点。我们继续学习中文，在准备一个考试。12月8日，当我们正参加考试，一名日本官员到来，要求我们所有外国人立即到宪兵总部。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意味着战争。我们穿戴齐整，这样如果我们被投入监狱，我们有足够暖和的衣服。他们让我们一会这样排队，一会又要那样，最后一名负责人告诉我们日本和美国的的关系已经恶化。这是相当隆重的仪式。目前，我们被告知可以如常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命和个人财产会得到保证。我们的大门会安排卫兵，他们会在我们院内巡逻，但我们不会被打搅。这天早些时候，一名宪兵（常石长官）过来。他告诉我们已经宣战。王牧师（译注：原文有注释，但似乎是“王牧师”中文发音的误写）那时和我们在一起。以他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和仪态，他站起

来，吟诵了第46诗篇。这使常石长官很受触动，也使我们感到宽慰。我们都回到自己家中，把情况告诉我们的仆人，并收拾好行李箱，准备随时接通知前往自由中国。晚上士兵们过来听勒兰德·贺兰德的收音机，这是个很好的。我们听到对马尼拉、檀香山、香港和新加坡的突然袭击的消息。

从那时起，我们的工作越发困难。每次我们带药品去诊所，我们的人力车会被搜查。每个进出医院大门的人都被搜查。我们系统地努力劝说我们的雇员离开医院，去为日本人工作。我们的人很忠诚。日本人还试图“借用”教会的学校和建筑。他们前去学生的家里，威胁他们的父母，如果他们继续送他们的孩子去我们的学校，将失去买米和盐的许可，甚至失去住在城里的权利。因此，次年二月学校关门了。一些老师逃到自由中国。

12月9日，我们在收音机中听到，俄克拉荷马号和西弗吉尼亚号在珍珠港被击沉；九十六架飞机在马尼拉被击毁，两百艘船在太平洋上被围追堵截。没有等周日的礼拜，我们马上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洗礼仪式，并开始把我们的物品分给中国人。

12月10日，威尔士亲王号【英国的】和另一艘大型舰船被击沉。我们听说旧金山和檀香山受到轰炸，马尼拉和新加坡将被夺取。

12月11日，大约2300名日裔和德裔美国人在美国被拘禁。

12月12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12月17日，一封来自本克曼先生的电报告知他不能继续为我们寄来资金。我们要如何支付雇员的工资加遣散费？美国领事馆也发来一封相似的信。

12月19日，日本人前来拿走我们的短波收音机。我们再也听不到美国之音或BBC。从那时起我们通过日本宪兵和当地中国人获得消息。他们还拿走了我们的相机和自行车。在十二月，我牙齿上的两个填充物掉了。没办法找到一名牙医。如果我的牙齿开始疼，我只能靠我丈夫拔牙。

因为钱没法再寄来，我们派了一名我们信任的苦力【普通体力劳动者，做各种工作】去自由中国联系舒伯特一家【带着教会资金的卫理会传教士】，要他带回相当于一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支付工资和遣散费并维持我们的生活。无法保证他能通过战线再回到我们这里。我们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祈祷他能回到我们这里。

我们的圣诞节过得很安静。我们以交换我们在花园种出的产品来庆祝节日。

## **1942-1943：忠守至最后**

1942年1月5日，日本人坚持要一份医院补给品的清单。这花了我们数小时的工作。这看起来是最后阶段的开始。

邮件递送得很慢，如果说它们确实是在递送的话。我1942年1月18日寄了一封信给母亲，她1943年1月才收到。在战争【日本和美国之间】之前，我一个星期写一封信给父母，但现在只是一个月一封。有些从美国寄给我们的信我们从未收到。医院的工作减少，所以我们试着让人们尽快离开。我们让我们的厨师走，因为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

因为我的身材正在变化，我必须考虑添置一些孕妇的衣服。那时什么也没有。伊芙琳·高有一块布料，足够做两件短罩衣。我把两条裙子的前面改大，这就是我的全部衣服了。日本人不允许我和露丝·丹尼尔斯一起去康爱德医院【卫理会的妇幼医院】找篮子和婴儿衣服。（在许多其他方面日本人是很大道的。）我有一块法兰绒，足够为婴儿做两件法兰绒外衣。而这些就是她能得到的仅有的新东西了。

压力和紧张开始在厄内身上表现出来。他患上十二指肠溃疡。幸运的是我们的奶牛有足够的奶来缓解溃疡。

大约这个时候，费舍尔医生和夫人变得非常紧张。宪兵来见他们好多次，想要看他们的护照。因为费舍尔医生是犹太人，他不敢出示他的护照。因为他们的工资【来自美国卫理会的】已停，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只得在日本人的医院工作。费舍尔医生承诺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为我们接生。他们承受着很大压力。

在二月初或一月底，我们被告知我们会被迁移并拘禁在中国内地会【英国的】。我们能带自己的食杂品、衣服和个人物品。所以我们开始收拾行李。幸运的是我做了许多罐装食物，那属于食杂品。不谈对错，厄内为一个箱子做了一个假底，藏了一罐煤油。它使我们的灯一直可用，直到我们离开南昌。

一天厄内走到城里。他要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医院忠诚的苦力。他表现得像不认识厄内，却快速地告诉厄内去哪面谈。他带回了一万美元，缝在他丝绵袍子的夹层里。如果有人配得上在他的冠冕上加一颗星，那就是我们亲爱的忠诚的苦力。这笔钱足够支付医院的工资和三个月的遣散费，还足够维持我们的生活直到我们离开。

3月3日我们接到通知医院将于3月7日被关闭。我们将在那天迁出。日本人允许我们将毯子和被窝代替工资发放。

然后我们离开家的日子到了。所有我们要搬走的东西都放在院子里供检查。日本人可以随便拿走任何他们想要的——打字机、缝纫机、毯子和椅子。我坐在一把椅子上，这样我们能把它搬走。我必须争取保住奶牛。我们把它拴在一棵树上。我就是指了指着我的大肚子，把它牵出来拴在卡车后面。我们被带往城市另一边到中国内地会。勒兰德·贺兰德、厄内和我使用一座房子楼上的一部分。露丝·丹尼尔斯、卡罗尔·休斯顿、伊芙琳·高使用另一座房子的楼上。两座房子的楼下除厨房之外被用于传教工作。费舍尔医生和夫人被搬到日本人提供的另外一座房子里，离我们大约步行五分钟。

我们搬迁的第二天，宪兵来了，向我们指出日常我们可以走多远。这范围包括了法国天主教医院，但不包括费舍尔夫妇的家。我们必须有特别许可才能见他们。无论我们去到街上何处，我们都不和人说话，因为他们之后会受到盘问。附近有一个小墓地。因为中国人除了埋葬时不去那里，我有时会去那里以远离人群。中国朋友能来看我们，但他们之后也会受到盘问。我们可以帮助中国内地会做传教工作，只要一次不多于三十人。但是没有对每天总人数的限制。厄内开始打理花园，梅尔索普先生对此很高兴。

上帝以神秘的方式工作。如果我早些时候得以离开南昌，我会上海乘船离开，直到我们后面到了上海我们才知道搭乘那艘船离开上海的人发生了什么。它在海上遭到轰炸，踉踉跄跄地驶到菲律宾。船上的所有美国人都被扣留在那里。那里的情



况比我们这里要差很多。如果我到了菲律宾，我就没法到美国。厄内斯特会和我分隔很长时间，肯定会错过我们第一个孩子的出生。

尽管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有强烈的信念，我也有害怕得腿发抖的时候。厄内从未告诉我他内心的感觉，但我肯定他有时也会害怕。在那段时间，我做了一些真正的噩梦。一次我梦到我在大洋中间一叶小舟上，将要分娩。另一个梦不是这样可怕的，反倒很美妙。我们全都聚在俄亥俄我家附近的一大块田地上，见证世界的终结。人们来到这里，或坐车，或走路，唱着圣歌。我们见到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厄内跑来跑去做他的事，我跟不上他。突然一道强光——我们知道就是这了——然后我醒了，月光照在我脸上。直到今日那个梦在我的脑海里仍非常鲜明。

在我们搬到中国内地会之后不久，有一伙人在周日上午到来，提出带我们所有人去自由中国。我们不得不回绝他们。那意味着走过石块铺成的路，跨过江，走不知多少英里通过战线，再穿过无人区，之后才是中国人的前线。其他人觉得我做不到，会拖慢他们。如果我们被抓住，那对我们意味着坐牢，对那些中国人则意味着死亡。

在我们搬到中国内地会之后不到一个月，我们被告知准备4月14日乘一艘交换船离开。所以我们卖掉我们能卖的。4月10日我们被告知那艘船被推迟了一个月。

4月18日夜里我们听到飞机在城市上空来回飞行的声音。它一再越过战线。早上日本士兵过来搜查我们的房间，寻找一名美国人。后来通过小道消息我们听说一架美国飞机落下，机上有五名美国人。这次正是杜立特突袭。后来故事传出来，一名机长和机群的其他飞机失散，来到南昌上空。他以为他在自由中国。飞机燃料耗尽，落在江上。机组成员全部离开飞机，向自由中国的方向走。机长向一个农夫问去自由中国的路。农夫太害怕了，把他们指向相反的方向，朝着城市走。他们被抓住，关进监狱，后来被带到上海。后来我们得知机长被处决。也是在后来，卡罗尔·休斯顿回到美国后，她见到了一些生还的杜立特突袭成员。在我们回到美国后，我们见到报纸上一则报道说杜立特突袭成员那天全部安全返回了他们的基地【不正确】。在那段时间还有其他轰炸。一次美国飞机轰炸了新机场，杀死了我们的一些朋友。还有一次他们轰炸了老机场。在夜里有许多机枪开火，甚至近到就在我们住的院落之外。

【根据1995年的采访，那次日本人要求希尔达烤一个派，用在他们审判他们抓住的杜立特突袭成员时。希尔达告诉他们事实，她既没有设备也没有原料来做一个派。很多年以后，在2000年代初，一名生还的杜立特突袭成员住在休斯顿的克莱尔伍德养老院，当时希尔达和第二任丈夫达尔文·安德鲁斯也住在那里。】

我现在处于孕期的第八个月，背痛，晚上没法休息。我的双手和前臂又患上神经炎。它们无力又疼，特别是在晚上。我把两只手臂放在枕头上，这能略微缓解。本地的药剂师调制了一种维生素B12含量很高的药品，味道很可怕。但是我吃这种药和酵母。我的睡眠支离破碎。如果这还不够，老鼠在这房子肆意横行，特别是在浴室。浴室没有自来水。那是很原始的浴室。我们只被允许在晚上10点前点一盏小煤油灯。在那之后完全不能点灯。一个晚上老鼠的动静太大，最后我下了床。靠着一只手电筒，我设法把一些老鼠逼到角落，把它们邪恶的灵魂吓飞。几分钟内，穿着钉靴的士兵就猛敲门，把我们全叫起来。这显示出他们在多么近监视我们。他们确信我们是在给游击队发信号。我跳回床上。梅尔索普先生、贺兰德先生和厄内最终说服士兵我们只是在赶老鼠。我再没有赶老鼠。

一天天城市的情况越发紧张。中国苦力夜里被日本人从家中带走，放到日本人的前线。这样中国人【从对面射击】就会杀死他们的同胞。尖叫声很可怕。看起来要发生一场大战。到处是士兵和马，还有更多的正在赶来。弗里茨和艾米不被允许来看我们。

6月1日，露丝、卡罗尔、伊芙琳和勒兰德接到指令于6月3日离开。日本人拒绝让我旅行，因为这意味着坐一天火车，然后坐几天船。他们不想发生意外。我随时可能生。厄内准备了一套接生器具，就是为了应对我们能走的情况。这真是悲伤的一天，看着他们离开，因为我们是那一地区仅剩的美国人。

因为我的预产期已经到了，我们决定此时应该在法国天主教医院过夜。每个人都知道孩子喜欢在夜里降生。天黑以后我们就没法去医院了。日落之后实行战时宵禁。所以每天日落时厄内和我走到医院，直到孩子出生。厄内和神父们一起睡，我则和修女们一起睡。清晨我们走向中国内地会。这持续了近三个星期。

6月15日，果然是凌晨2点，显然孩子要出生了。我和修女用中文交流，因为她们不会说英语而我不会说法语。我被送到产房。当我从轻度麻醉中醒来时，我听到“是的，是的，是小姐。”（译注：此处为法语。）我知道了这是个女孩。费舍尔医生及时赶到为孩子接生，并帮助厄内通过成为父亲的考验。你可能想知道我们怎么有钱来付账。在我们医院关闭前，我们得知法国天主教医院需要药品。所以我们征得日本人的同意向天主教医院提供了药品。

看起来可能令人奇怪，贝蒂出生后一两天，常石长官和另一名军官来看我，送给我一些小蛋糕和两大瓶果汁。果汁是可以稀释的，换一种说法，是瓶装浓缩果汁。我在医院待了十天。【那时美国女性产后卧床数天是一种习俗。这个习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改变。】

我们回到中国内地会后一个星期，常石长官到来，让我给贝蒂穿上裙子——她只有一条——而我要穿上我最好的裙子，然后到外面。他让我坐在草坪上的一把藤椅上，贝蒂坐在我腿上。他给我们拍照片。这相机就是我们自己被缴走的那台！我们交谈了一下，过了一会我问他愿不愿意抱孩子。完全没有犹豫，他坐在了椅子上，抱着贝蒂说：“给我拍一张。”【根据1995年的采访，当希尔达和厄内斯特离开南昌时，常石长官要了他们的圣经。】（译注：本书中有此照片，115页第1张。）

过了一个月，贝蒂的体重没有增加，总是哭。她体重不增加证明我不是称职的奶妈，我是在让我的孩子挨饿。这是为什么她总是哭。幸运的是，伊芙琳留给我一罐羊奶。这救了贝蒂的命。与此同时我们给上海的人们发电报说一切都很好。他们从上海发电报给爸爸妈妈。她当然完全不知道，当她接到电话时她对他们说，我不可能已经生了孩子。我肯定这很令她震惊。7月24日，常石长官又来了。事实上他每天来检查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同样的问题。我们对他有耐性。他告诉我们准备7月28日离开。于是，我们又收拾行李，卖掉或送出我们的物品。

7月27日下午，宇野大尉和他的宪兵过来，检查我们的行李，拿走他们想要的，关上前门，把我们置于严密看守下。只有弗里茨和艾米被允许来看我们。7月28日上午，我们和鲁格小姐、梅尔索普先生（仅剩的英国人）坐上卡车。我被允许带着贝蒂坐在前面的座椅上。人们成群地来到门口告别。他们感觉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因为我们是最后离开这一地区的英国和美国人。

当我坐在那时，我无意间听到一位中国女士说：“看那个婴儿，她多白啊！”贝蒂的头发是亚麻色。另一位女士说：“我听说他们每天给她洗澡，所以她这么白。”对于许多中国人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金发孩子。我们被带到一列火车前，送上一节车厢。我们这天晚些时候抵达九江。我们被带到一间日本人的小旅馆。如果我们想洗澡，我们只有和那里的其他人一起。我自己洗澡时是和一些日本女人一起。后来在晚上鲁格小姐说他们对她真好。她一个人洗澡。厄内和我大笑。鲁格小姐不知道旅馆里的所有人都已经在那里洗澡了，她是最后一个。当你在日本浴室洗澡，你坐在大浴池的边沿，抹好肥皂，再倒一些水在身上，然后走进大浴池。

我们在九江等了一天，更多被扣留的传教士从牯岭来（布朗一家、梅西一家、库弗一家、赫伯特一家、普莱斯夫人、罗金斯小姐、查尔顿一家和琼斯一家）。我们终于登上带我们去上海的江轮，四个人一个房间。

我们8月1日到岸上海，被带到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我们有冰水、冷饮和风扇。我们有折叠床，之间是过道。我们有大约两百人。男人们被关起来。

交换英国扣留人员的船次日早上离开，所以我们再没见到梅尔索普先生。鲁格小姐病得太厉害，所以她未能离开。

我们刚到上海时，或多或少可以自由走动。我们见了莱特一家、霍克一家、格特鲁德·沃特曼、莉莉·史蒂文斯，还有中西女中（译注：此处原文拼写可能有误，按推测是中西女中）的各位女士【都是传教士】。我们拜访了我们的会督拉尔夫·瓦尔德。我们去找了费舍尔医生的朋友库姆菲一家。我们听说在1942年11或12月费舍尔夫妇有了他们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费舍尔夫妇又一次受到日本人非常大的压力，要求出示他们的护照。于是一个晚上他们出发步行前往自由中国。他们给他们的孩子服了安眠药，给他们自己和孩子穿上中国衣服。他们把孩子放在篮子里，用肩上的扁担挑起篮子，就像中国苦力那样。他们告诉他们的朋友和日本守卫他们是去参加一个婚礼。

【很多年以后，希尔达和厄内在西雅图再次遇到费舍尔一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费舍尔一家作为难民移居加拿大，并成为加拿大公民。】

在第一批人离开乡村俱乐部后，又有另外的人到来，像布鲁姆医生和夫人、刘易斯医生和夫人、阿尔里奇医生和夫人、普罗克特先生、布赖森医生和桑德斯先生【都是传教士】。后来，又一艘交换船前往英国。

在搬进有名的乡村俱乐部之后三个星期，我们得以离开，住到海格路540号，那里过去是富勒家的房子。在接下来的五个半月里，我们和四位来自其他家庭的人住在一起：弗兰克·盖尔牧师，阿尔伯特·斯图尔特博士，古斯·纳史密斯牧师和莉莉·斯蒂芬斯。斯图尔特博士负责管理，直到我们都安顿下来。然后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划分了我们的职责。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那里一起度过的日子，因为它们在很多方面都很充实且有益。只要我们在这房子里，我们就像在后方的任何其他美国人一样。只要我们一外出，我们就必须戴上红袖章标明我们是美国人。有一些特定的地方是我们不被允许去的。我的工作正是适合我的，照顾孩子和学习中文。厄内斯特被请去帮忙通过瑞士领事馆组织我们美国人。【瑞士人是中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处理美国的公民事务。】那是因为有很大可能性我们所有人都将被拘禁。那任务意味着他必须每天去市中心。谁会坐上下一艘交换船？有传言说绿伯爵

号将于9月10日起航。那是谣言。不管怎样，我们的确已报名返回美国。传言说船被推迟了两个星期，那也是谣言。

与此同时，我们的宝贝哼哼、微笑、大笑，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时光。我们为她买了一辆二手婴儿车。许多时候她在里面睡觉和兜风。这辆婴儿车和我们一起去了集中营。

在这段时间，厄内加入了一个讨论组，参加者有瓦尔德会督、李半狄博士、芬兰总领事、孔周教长（译注：此处两个中国人名只是拟音）和一些其他人。它是一个哲学讨论组，讨论多种宗教。

直到这时我们还可以去看电影。我们很看了一些老电影。9月16日新的命令公布，我们不能再去电影院、舞厅和其他娱乐场所。并且绿伯爵号并没有驶来。

几乎不可能买到糖或人造黄油，但我们能在厄内的生日10月25日为他做了一个蛋糕。11月1日我们给在美国的家人朋友寄去一些圣诞卡片。它们从未被送达。

一个传得很厉害的消息说所有美国男人会被带走关进集中营。因此每个男人都收拾好一箱子行李。可是，11月12日，日本人只是来访问每个美国人，要他们填各种表格。

我有一些牙必须要修补。我们找到一位有名的白俄牙医。第一次事情很顺利，可是第二次我在他注射普鲁卡因后昏过去。**过敏！**【大约四十年后，在圣安东尼奥，经过测试后确定，希尔达并不是对普鲁卡因，而是对牙医使用的普鲁卡因注射液通常含有的微量肾上腺素高度敏感。】

又一道来自日本人的命令要求我们给房子里的所有家具贴上标签，并列入清单。

到这时天气已变冷。厄内找到一个铁皮炉子，驱走房间里的寒意。因为潮湿的天气我们需要一个地方来弄干尿布。那个铁皮炉子帮了忙。

12月14日，我们在上海听到空袭警报。12月17日，有传言说东京受到空袭，还说绿伯爵号将于2月30日启航（译注：“2月30日”不知是写错了还是另有含义）。

中国人当中的饥饿状况很可怕。在每天清晨去市中心的路上厄内会看到至少一具夜里死去的人的尸体。

1943年1月23日，一批人接到通知准备进入集中营。1月31日一批男人前往浦东集中营。2月5日，盖尔先生和纳史密斯先生前往阿什集中营（译注：此处将原文缩写AAC理解为Ash Assembly Center，位于现延安西路原英国兵营的集中营）。我们确信很快就会到我们的号码。2月7日我们去教堂时想，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史密斯博士讲话。我们知道我们的行李会受限。所以我们买了坚果，把果仁挑出来。果仁比带壳的坚果占用的空间少，能提供蛋白质。2月15日早上，我们看到弗兰克·盖尔大叔和古斯大叔走路前去他们的集中营。我们沿着街边走，帮他们提一些物品，直到我们不能再和他们一起走。战后我们在南昌又见到弗兰克大叔，但我们没再见到古斯大叔。阿尔大叔接到通知。在他离开之前，莉莉、厄内和我接到通知。我们还能送一送阿尔大叔。2月25日，莉莉被带到闸北集中营。我们认为我们也会去那里。与此同时我们要清理一座房子，参加最后的中文考试，储备一些东西，做出安排让某个人给我们寄包裹，收拾一两个大箱子的行李，还有其他做不完的事。

## 闸北集中营

3月2日中午，一辆卡车来装我们的箱子和床，把它们运到闸北集中营。我们一晚上没睡，仔细处理。早上我们被送上车，先到乡村俱乐部，再到闸北集中营，那里以前是一所中国大学（译注：大夏大学，旧址位于现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我记不清我们是在二楼还是三楼。我们的房间有四个家庭，每家三个人。房间最远端的是摩根一家。他们来自澳大利亚，是商人。摩根夫人是个瘾君子，在闸北那里时她正在戒除，所以有时会很难受。他们的婴儿很可爱。挨着他们的是朗一家。朗先生的是雀巢乳品的一名代表。他们来自加拿大。他们的小女孩和我们的贝蒂同龄，我们常常一起用婴儿车载着孩子玩。挨着朗一家的是图克一家。他们是加拿大犹太人。图克先生是个精明的商人，很喜爱我们的贝蒂。他能用双手做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夫人是一名钢琴家，曾在哈尔滨举办过音乐会。对她来说铁丝网后面的生活非常难，没有钢琴，没有音乐。他们的小男孩大卫大概九岁，容易紧张，尿床。我们尝试通过药物尽量帮助他。这一排接下来就是我们，我们有两张单人床，一张给贝蒂的童床，两张折叠桌和两把折叠椅。我们每人分到四十平方英尺。对面是比尔·阿瓦德先生和他的两个小男孩，小比尔和菲利普，分别是13岁和9或11岁。阿瓦德先生是一名系带等产品的进口商。【他妻子没有被拘禁。】（译注：阿瓦德夫人不是美国人，而是葡萄牙人。）我们后来在纽约拜访了他。

我们上午10点半左右离开我们在海格路的家。等我们找到我们的房间和床位并把它们布置好时，我们已经想上床睡觉。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晚上8点的点名。一名日本官员和一名翻译晚上8点来巡视。有一个人一直在官员前边，叫我们及时走出房间到过道。然后我们立正，等到我们的名字被叫到后才可以稍息。如果我们没有把婴儿带出来，官员会走进房间看他们。之后我们走进我们的房间，直到点名结束的铃声响起。点名开始后不能去洗手间。那意味着等1066人全被点到。点名每天早上9点和晚上8点各一次。如果某个人不在他的位置上，我们全得等在那里，直到那人被找到。

早餐我们吃碎小麦、茶和面包。这些碎小麦的背后很有故事。在我们进入集中营之前，大约几个季度之前吧，这些碎小麦通过红十字被送到中国提供给中国人。日本人截下不给他们。可是当我们美国人和欧洲人被拘禁，日本人把这些碎小麦给我们。好嘛，在又热又潮的天气下，小麦已经发芽甚至招虫，虫子又生出幼虫。年纪较大，做不了洗碗、重体力活或医疗工作的人在规定的上班时间坐在户外的棚子里，从碎小麦里挑出那些活的蛋白质。有时我们在得到碎小麦时还有奶粉，有时没有。如果你足够饿，你就吃得下去。

最早进入集中营的一批人出色的谋划使得他们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组织，让厨房有序运行、在我们房间沿墙做了架子、监督靠墙搭建了浴室、建了一间办公室，等等。这个组织和日本官员密切合作，规章条文被制定出来，使我们全都安顿下来。午餐我们有鱼、米饭和卷心菜。鱼是用有点变质的花生油煎的，而卷心菜时常煮得过头。极为偶然的情况下我们有炖牛肉吃。晚餐我们将剩饭菜做成汤。直到今天我仍不喜欢吃鱼、鱼汤或煮卷心菜。想象一下孩子们吃这样的伙食。6岁以下的孩子每天可得到一品脱牛奶和一个鸡蛋。每个星期孩子可得到一个苹果。

我们每天的固定流程如下：早上7点起床，7点半早餐，7点半到8点半取婴儿食物和婴儿用的热水，9点点名，9点半取饮用水，11点取婴儿食物，11点半午餐，2点到3点给婴儿煮奶瓶，3点取饮用水，2点到5点在洗碗间洗碗，5点取婴儿食物，5点半晚餐，7点取饮用水，8点点名，晚上10点熄灯。当然我们并不各人做自己的，互相帮助几份事一起做。厄内经常会在取婴儿食物或饮用水时，同时也为我们房间里的其他人带一些。

洗衣服是个问题。在一个靠墙搭的棚子里我们有自来水。我们使用老式搓衣板。洗床单又是另一件麻烦事。厄内用咖啡罐做了一个洗衣活塞。它很有效。我们用非常细小的肥皂屑做成肥皂水。只要天气配合，我们有一块地方晾干衣服。偷盗是个问题。得有人看着洗好的衣服直到衣服干了。

在空场上我们有一个相当长的棚子，发挥多种作用。在周日它是我们的教堂：先是天主教徒，然后是犹太教徒，最后是新教徒。我们在晚上有一个社区礼拜。在一周其他日子那里是孩子们的学校。在学校时间之前和之后，会有碎小麦清理、合唱团练习等活动。我们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医生、传教士、商人、教授、大学校长、妓女等等。我们幸运地有“颂歌”和“猎豹”两位有名的舞者，给我们带来娱乐的时光。医疗小组马上就忙了起来，我可以选择每天在诊所做两小时护士或是在洗碗间工作。因为我们两人之中要有一个一直照看贝蒂，厄内和我轮流在诊所工作。我协助海拉·沃特斯医生。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接种疫苗。感冒和传染病肆虐。首要的疾病之一是被叫作支气管炎的流行病。因为婴儿会由支气管炎引发许多疾病，我们对这病没有多想。但是回过头看，那可能是一场轻度的脊髓灰质炎流行。当贝蒂开始走路，她走姿奇怪，并且她的背脊柱侧凸。

当有人病情严重，他们会被送到医院【集中营外】。一名医生必须陪着病人。一些消息通过这个渠道进入集中营。

在我们进入集中营大约一个月后，“红十字会”的包裹开始通过我们朋友寄来。包裹里是我们要求的对我们饮食的补充，像是给我们的蜂蜜、糖，给贝蒂的橘子汁、番茄汁，还有肥皂。开了一个小杂货铺。通过瑞士领事馆我们可得到特定的必需品，像是卫生纸。我们每个月可领一卷，那有时候不够。你以为我是怎么坚持写日记的？复活节每人得到一瓶牛奶和两个复活节彩蛋。儿童还得到气球。复活节后不久每人得到一磅糖。5月5日我们每人得到一个苹果。

与此同时，我们遇到空袭，我们听到远处的爆炸。也是大约那时，我们所有人又得到鸡蛋、苹果和另一个红十字会的包裹。

在我的生日，5月10日，我们卫理会教徒在集中营后边的场地上聚会，吃生日“蛋糕”。我们存下我们的饼干，饼干上铺果酱，再铺饼干，再铺果酱，做成一个分层蛋糕。有人有支蜡烛，把它放在蛋糕上，但不点着。（蜡烛得留给下一个过生日的人。）埃迪·怀斯、佩吉·库德巴克、格特鲁德·沃特曼和米尔德里德·普罗克特是我的客人。我们一起唱快乐的圣歌和祈祷。5月13日是我妹妹的生日，我自然很很想她。但我们的注意力那天被吸引到贝蒂身上。她可以自己抓住瓶子，还可以鼓掌（不是同时）。

到这个时候，男人们蓄起胡须。这有一个原因：省钱，因为剃须刀、剃须皂和热水都很稀缺。

集中营里最受欢迎也是最忙碌的地方之一是缝纫室。我们有一台缝纫机【踏板式，不是电动】，放在我们过道的一端。当孩子长高，他们的衣服被改给下一代。修补是必需的。法里恩夫人和她的伙伴真的很忙。各种我们可以捐出或是丢弃的，像是线、纽扣、可用于修补的布料，都被送到那个角落。你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下一个孩子开始时穿的都是全新的衣服【碧翠丝，生于1945年】。

类似地美容师忙着理发。我们不用担心价格和小费。不过，没有烫发或染发。

**规则。**我们制定了我们自己规则。只要没有事端，日本人不会介入。不过，我们知道，1066人生活在一起，我们必须有严格的规则。规则之一，无论何处都不允许使用超过40瓦的电灯泡。晚上9点55灯闪一下，这是“熄灯”警告。晚上10点闪三下意味着必须马上关灯。如果这条规则没有被遵守，总开关会被关上。这条规则作为一条警告被刊登在集中营的周报《集中营时报》上。另一个体现严格纪律的例子出现在一次球赛中。不管人们有多累，球赛可以帮助改善营中的精神面貌。一次有人打出一记本垒打，球远远地飞出限制区域。左或右外野手如此专注于接住这球，他只是跑，没有意识到他已处于“禁地”。日本守卫每时每刻在屋顶上监视我们。那一刻他们瞄准并开火。当然这个小伙被吓得魂不附体，其他人也都是如此。感谢上苍，守卫的目标有点超出射程。

有一些人尝试在晚上隔着围栏把信息送到外面。有时他们会被抓住或是被打断。后果就是整个集中营的人都会受罚。日本人最喜欢的惩罚方式之一是所有人一整天都不允许离开建筑。在雨天谁又在乎——但在炎热的夏季，和所有孩子一起被关在室内是一种折磨。更糟的是他们不允许我们洗澡。上海的高温离了风扇或淋浴可不好受。

我们进入集中营后过了不太长时间，我们每天可获得面包。中国人把它们卖给日本人，并不知道它们会来到我们的集中营。他们在里面放了一些东西，引起轻重不一的腹泻。你能想象1066名腹泻的人在用马桶吗？它们是老式拉绳式的，是供数量少得多的人使用的。很有一些马桶无法使用，它们总是需要修理或是溢出了。在厕所里我们走在板子上。由于各种原因，马桶座圈全被移除。我们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就被建议买一个马桶座圈或是从我们住的地方带过来。大多数人用“像框”一词指他们的马桶座圈。那时不难见到人们戴着他们的“领子”走过过道。

男人的角色在有些情况下会极大地改变。一个我们附近的家庭在他们进入集中营之前刚生了一对双胞胎。他们的小便盆得来来回回地拿到厕所。家中的男人曾是上海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在各种事情上都帮得上忙。在集中营这里，他就像其他人一样帮助自己的妻子。一天厄内在过道遇到他拿着便盆。他自言自语：“我从未想过我会拿着（脏话）一个便盆！”。

由于腹泻和紧张以及一些其他原因，我们身上的脂肪层很快不见了。在六个月里，厄内瘦了四十磅而我瘦了二十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开始变得像稻草人。我们穿着宽松的衣服，远早在它们流行之前。

许多滑稽的歌和诗被写出来取笑日本人。它们有隐含的意思，如果你懂我的意思。这些歌在欢乐的夜晚唱，我们笑到流眼泪。我们的守卫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然后我们会突然唱起《上帝保佑美国》，而我们的守卫【不懂英语】起劲地和我们一起唱。

## 格利普霍姆号与遣返

此时来了消息，将有另一艘交换船。名单被贴出来。我们简直无法相信我们的眼睛，更不用说我们的耳朵。有许多的赞美和感恩。当然，直到我们上了船，我们才真正相信。那时有太多混乱，以致我忘记把它们记在我的日记中。我们被告知我们可以带最多六十六磅：

1. 医生开具处方的药品
2. 婴儿吃的奶粉
3. 一条毯子、两到三条床单、一只枕头
4. 个人衣物
5. 出生证明、护照、文凭、结婚证、通讯录
6. 不许带书写纸、银器、餐具、书籍、照片、手电筒、电器

阿瓦德先生没有被遣返，因为他的妻子在上海。但他的两个儿子要去纽约的亲戚那里。他们被托给我们照顾。作为回报，我们把我们满满一大箱子物品托给他们照看。里面有我们的银器、邮票收藏、另外的床上用品、一些亚麻布和照片。他把他的名字写在箱子上，说他会一直保管它，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中国。或者他会把它运给我们。

当局威胁要对我们的箱子做全面检查，因为集中营里有间谍【既有为西方的，也有为日本的】。他们将他们怀疑的人的箱子的衬里撕开。他们还威胁彻底搜查我们的钱包和小手提箱，还会搜身，如果他们有所怀疑的话。他们甚至威胁要检查阴道，因为曾有通过那样的方式传递秘密信息的案例。你想知道我是如何在没有纸的情况下记录我们行程的吗？好吧，我们发了三卷卫生纸，而贝蒂没有用那么多。

在离开的那天，我们必须上午8点准备好接受检查。女人和孩子被驱赶到一个区域接受检查，而男人在另一处。我们在那里吃了棉豆做的午餐。指挥官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我们上了客车。在我们离开时，乐队——剩下的部分——演奏了《友谊地久天长》。我们出发前往码头。在那里我们必须通过海关。我们坐着一直等到晚上7点。女人和孩子首先被允许上船。厄内9点半左右上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奶粉。我们最终在午夜上床休息。

我们的船叫帝亚丸。食物比集中营里好。没有给婴儿的食物。而我们自己可以在下午茶时间和晚上买到咖啡和蛋糕。没有毛巾，也没有洗浴，除非你给乘务员塞钱。我们不得不自己洗床单，没有客房服务。不过我们女人这边的情况要远好于男人那里。我们在香港载上更多乘客，总人数达到六百。尽管有许多不便，我们举行了周日礼拜和每天的圣经课。1943年9月29日之前，我们顺流驶向西贡【日本人控制】。真是漂亮，棕榈树在风中摇曳，星落的茅草屋，还有大片的稻田。当我们接近西贡，那里的当地人想拿给我们香蕉。我们的舌头伸长到了膝盖，但是日本人驱赶当地人，或是弄沉他们的小船。

10月2日我们在新加坡【日本人控制】上岸。那里热得汗臭。我们看到四处是小摊，但当我们看到各种水果正被装上船，我们就把它们抛到脑后。我们看了第一场电影，让我们的思绪从炎热的天气中解脱。那是一部可爱的电影《五月时节》。由于这种那种原因，从那时起我们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供应水。那正是“水呀，水呀，处



处都是水，一滴也不能入口。”（译注：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老水手行》中的句子，此翻译来自杨德豫。）不过，我们已再次进入大洋，气温凉了下來。

10月4日我们开始非常缓慢地沿着苏门达腊通过马六甲海峡。传言说我们正经过一片布了大量水雷的区域。我们有救生船，可是我们发现它们没有用。再加上没有足够的救生船载我们。因此我们全部在甲板上坐了一整晚。一定是有一大群天使和上帝的手在守护着我们。我们在船上很有一些病人。令我们更为麻烦的是冷藏系统故障，肉变质了。结果就是我们很有一些人呕吐和腹泻。一名我们卫理会传教士，布莱克福特小姐，病得厉害，遭受了一次心脏病轻度发作，又加上变质食物的毒害。

10月15日11点左右我们在印度果阿上岸。【果阿是葡萄牙殖民地，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中立地区。】行李被卸下来放在码头上。我们被允许下船，踏上陆地，在分隔帝亚丸和格利普霍姆号的道路上来回走。【格利普霍姆号是瑞典船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用来交换因战争被扣留的平民。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中立国。】格利普霍姆号上的乘务员拿来水果、奶酪和蛋糕给我们吃。很快我们就会登上那艘船，我们用“天堂”一词指代它。19日我们在道路一侧排队，来自格利普霍姆号的日本人在道路的另一侧排队，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墙。我们看不到他们。我们将要去“天堂”，而他们将去受战火摧残的日本。登上格利普霍姆号的阶梯时，我们受到美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迎接，他和我们握手，说：“你们现在自由了。”另一边站着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给我们一支二十五美分雀巢巧克力棒（译注：当时有巧克力投币贩卖机，二十五美分硬币可得一条。）。我们的眼珠真的要蹦出来。我们已经两年没有见过巧克力。我们中的许多人一口就吃掉它。我吃了一条，觉得反胃。我们全部坐在甲板上，等待分配船舱等事情。与此同时，乘务员开始把食物拿上甲板上的桌子。出于习惯人们开始排队。但是食物不停地拿上来（自助餐），人们开始不排队，放开大吃。下午1点半左右我们可以吃东西。我们无法吃下我们原本希望的那么多。几乎每个人都吃了一些巧克力，它会减少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我们不会在我们的第一餐吃太多而生病。到了下午6点我们进入我们的船舱。我在90号房间，和赫伯斯特夫人一起。

10月21日，因为帝亚丸就要出发前往日本，两艘船上的基督教团体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礼拜，然后一起唱《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这天后面的时间我们被允许上岸到一家酒店门口，看美丽的花、树、鸟等。我们为一名在海上去世的人举行了一场简短的葬礼。

我们1943年10月22日启航。那天我们收到了邮件。我们花了几乎一天读我们的邮件。在我们航行时，我们见到一群群飞鱼。天气更凉了。10月26日红十字会给我们每人一些衣服、肥皂、牙膏、内衣和鞋。这像是圣诞节。

贝蒂感冒咳嗽，病得厉害，11月2日我们搬到一个单独的小船舱。11月3日我们抵达南非伊丽莎白港。人们张开双臂迎接我们。市长声明这座城市是“开放城市”。几位当地人请我们去他们家里过夜。他们姓海德。你猜怎么着？他们和纽约州格洛弗斯维尔市的一座资助我们工作的教堂中的一些人是亲戚。他们带我们参观了可口可乐工厂、凡士通公司和吉百利巧克力公司。海德先生是可口可乐工厂的经理。我们想喝可乐随时有。第二天海德夫人带我购物，五年来我第一次见到伍尔沃斯百货商店。我们享受着美好的春日天气。城市很干净，房子有着红色屋顶和棕黄色的墙。城市里有大约一万个英国家庭、二十个美国家庭、黑人、荷兰人和土著。据说我们

船上的人那天把城市里所有的巧克力都买走了。住在那里的人想要巧克力只有等下一船货运来。

我们11月4日再次启程，我们前面是好望角。11月5日我们已感受到大浪的影响。比利·瓦尔德（译注：前述托付给他们照顾的孩子）病得厉害，我们怀疑是疟疾。出名的鸟信天翁跟着船。多么雄健的鸟！鲸鱼也出现在我们左右。晚上我们看电影。六个星期时间，我们看了很多电影。

好望角周边的浪如此之高，船首低下进入下一个的浪里，船尾的螺旋桨完全露出水面，呜呜、咔咔，哼哼地响。然后船首又再次抬起。据说浪有四十英尺高。我相信！在那段时间我和默特尔·韦尔斯开始成为亲密朋友。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甲板上走路。事实上贝蒂是在船上学会走路的。当我们到了陆地上，她走得像喝醉的水手。我和默特尔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她的姐姐安·海岑加医生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我们不会知道小珊农·韦尔斯将成为首批女宇航员之一。

在接下来海上航行的六个星期里我们必须距离任何其他船的航道两百英里以上。我们必须每刻钟向世界广播我们的位置。天一暗下来，船上灯火通明得像时代广场。这样没人不会注意到我们是一艘慈善船或遣返船。这六个星期中的一段时间我们很接近马尾藻海，有很多船只在那里失踪。我们可以看到海藻在水中盘绕，但是并不足以被卷进螺旋桨。

11月14日大约日落时分，我们接近巴西里约热内卢美丽的港口。第二天早上我们见到了壮观的影像。在驼背山的顶峰有一个十字。它在云中时现时隐。另外两座山的山顶通过缆车与它相连：糖面包山和乌尔卡山。我们大约中午时靠岸，受到一些我们卫理会传教士的迎接。科布小姐作我们的向导。她带我们在本内特学院吃了午餐，然后去植物园。那是世外仙境。那里有各种棕榈树、橡胶树，各种花，像杓兰、百合花，还有兰花展。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兰花。第二天我们自由活动。巴西人非常友好。他们很多人会拍我们肩膀，问我们有没有看兰花展。物价很高。一只闹钟要160克鲁塞罗，长袜29克鲁塞罗，衬衫60克鲁塞罗，苏打水5克鲁塞罗，而苹果是20美分。当我们离开港口时，我们待在外面甲板上，直到我们再也看不到驼背山上的十字。这个十字在那里是为了一个原因——象征巴西和它的邻国永远和平。

11月21日我们用来自印度洋的水为贝蒂洗礼。贝蒂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婴儿。她由美国父母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生下，成为日本人的囚徒，在法国天主教医院由德国犹太医生和墨西哥护士接生，现在在海上由一名卫理会传教士霍克博士洗礼。

厄内斯特在11月22日生了重病。我们搬到一间小船舱，好让我能照顾他。他的体温数次达到104华氏度。显然他患上某种重型疟疾，它倾向于在气候变化时发作。

11月29日我们收拾好我们的行李，期盼着见到自由女神像，踏上美国的土地。

## 美国

我们1943年12月1日靠岸。我们排队等着下船，却被告知我们得整晚留在船上等待接受询问。联邦调查局询问了每个到过中国内地的美国人。第二天我们被快速地带到第五大道150号【卫理会传教理事会当时的地址】。大惊喜！爸爸在那里迎接我们。我们在柴尔德斯餐厅吃了午饭。晚上我们在沃恩医生夫妇家吃晚餐。当然还有会议和体检等。我们被要求参加12月7日在巴克山瀑布举行的传教会会议。没能让

爸爸带我们一起回家是挺让人失望的，特别是贝蒂，她和爸爸从一开始就爱上了彼此。但是我们是受传教理事会的指导，觉得有义务参会。我们确实抽时间和爸爸一起去了无线电城。

12月14日我们回到俄亥俄州马里恩看母亲、亲戚和朋友。我们第一次见到比尔·弗拉赫【玛格达琳的丈夫】。我们不会知道在后面的日子里比尔将对我们多么重要。我们被要求休息三个月，但人们对我们的工作极有兴趣，所以我们一直很忙。

## 1944

1944年1月初，我们到德克萨斯看望厄内斯特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他们人数很多——厄内有近50名堂表兄妹，还有相似大数量的长辈和晚辈。】那是典型的德克萨斯1月天气，大量的雨和泥，我们感冒和喉咙痛。贝蒂大部分时间都病着。然后我们回到俄亥俄拜访资助我们的教堂。就好像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行李装进的箱子又把它们拿出来。那些旅途中的一趟让我们意识到上帝的手保护着我们，而他还有更多的工作要我们去做。我们正在前去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的途中。我们要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换火车。因为天气——雪和冰——我们的火车到克利夫兰晚了。我们错过应该换乘的车。带着一个婴儿，在深夜里，这可不好玩。我们都发了躁。我们在火车站等。当我们终于上了一趟火车，没有床铺留给我们。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等待一个睡觉的位置。过了一会列车长告诉我们：“你们应该高兴你们错过了你们的火车，那趟车在阿什塔比拉城外失事，多人遇难。”

在格洛弗斯维尔见到海登一家真是太棒了，我们在那里拜访一座资助我们的教堂。接下来我们去宾夕法尼亚州凯恩镇。我们很遗憾未能见到克莱兰德夫妇，他们正在为“山姆大叔”工作。我们见到了帕尔默一家和其他的克莱兰德“帮”成员。

在休假期间我们的一件乐事就是花了几个小时和外公外婆梅耶斯一家吃晚餐。外婆和往常一样在我们身旁唠叨。她还是能做出我吃过最好的土豆泥。另一件乐事是在家参与每年一次的杀猪。这是家中的大事。所有的叔叔婶婶们聚在一起，把肉剁开，有的切成条，有的绞碎。我们做了许多香肠。

【根据1995年的采访，希尔达和厄内斯特在1944年初在地区教堂做了许多演讲，三个月里有大约九十场。人们非常渴望听到关于中国的事。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听到演讲中的一些内容来帮助自己“恨”敌人。】

4月厄内去辛辛那提参加辛辛那提大学综合医院的三个月课程。比尔·弗拉赫参加“山姆大叔”的训练。

1944年7月15日，我们前往底特律，我们将在那里住到1946年7月。厄内斯特这段时间在亨利·福特医院和安娜堡【密歇根大学】的外科攻读他的外科硕士学位。厄内斯特和拉姆医生发表了一篇名为《钽管在无缝线血管缝合中的应用》的文章，刊登在《美国外科杂志》第80卷第4期452-454页上。这篇文章是在亨利·福特医院的赞助下完成。它是针对擦伤、受损和断开的血管的外科技术一大进步。

那时候就像是在打仗。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吃早餐。上午8点厄内已到医院。我们住的离医院走路约五分钟。厄内在中午会打电话给我，听到铃响我就把食物端到桌子上，他吃完就走，一下不休息。晚饭时也是同样的过程。他通常在半夜回到家。偶

尔我们休息一个晚上或周末。那段时间我们为传教活动外出演讲。时不时我们会和同一任务中的其他医生还有他们的妻子聚在一起。

能同爱德·韦斯和海伦·韦斯在同一个城市真是太棒了，尽管他们在城市的另一边。周日我们穿过城市去他们的教堂。【爱德温·韦斯牧师是厄内斯特的一个哥哥，在底特律做了多年卫理会牧师。】

11月，外公梅耶斯去世。我计划去俄亥俄参加葬礼但贝蒂病了。

## 1945

1945年1月，母亲来到底特律做甲状腺手术。我尽量花时间陪她，让海伦·韦斯照顾贝蒂。

五月我出现晨吐。1945年12月28日，我们被赐与一个女孩，我们给她取名碧翠丝·安。当我在医院时，贝蒂由海伦带。在那里她患上严重的麻疹。医院本身也有感冒流行。所以我们病人得自己照顾自己【因为战争期间缺少护士】。我原本期望母亲来帮几天忙，但她也患上感冒。厄内尽最大努力操持各项事务，还洗衣服。好吧，一次他把他的一只黑袜子和尿布放在一起。于是我们有了粉红色的尿布。毫无疑问，外科医生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是手术室！当碧翠丝约两个月大时，我患上严重的乳腺炎，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几天。

韦斯妈妈【厄内的妈妈】坐了她人生第一趟飞机，来到密歇根。她先住在爱德和海伦那里，然后来和我们住一起。

战争刚一结束，传教理事会就要求我们返回中国。厄内斯特本可以比我和孩子们早几个月走，但我们想一家人一起走。碧翠丝1945年12月28日才出生。理事会想让厄内斯特主持南昌医院或担任院长。他拒绝了，因为他听说齐同瑞医生是南昌医院院长或代理院长。齐医生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这一所出色的学校。厄内斯特和我们都强烈地感到，现在是时候让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担任领导，而我们服务中国远为更佳的方式是担任顾问或是部门领导，根据需要可以把我们换到其他地方。这是他做出的最好的决定。厄内斯特最后接受了外科主任一职。

## 1946

1946年7月我们已准备好启程经西海岸返回中国。不过我们决定在离开前见到我妹妹第一个孩子的出世。所以我们在爸爸妈妈那里待了稍长一点时间。一个晚上我们吃了很多西瓜后刚上床睡觉。比尔打电话来说西瓜下肚后他们的儿子别无选择只得出来。比尔和玛格达琳第一次做父母。我真的真的认为比尔指望他儿子一生下来就是呼呼咯咯各种笑。不知他是开玩笑还是确实吃了一惊，他看到的却是一个红色皱巴巴的小婴儿，不像六个月大的婴儿那样好看。不过很快比尔对于他的加里就有说不完的话。三天后我们启程经辛辛那提前往德克萨斯。这一次和爸爸妈妈分别是很艰难的。相较于返回中国，他们可能更愿意见到我和厄内分开。许多次我问自己，我们让他们为我们祈祷和担心是否公平。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韦斯妈妈明白这一点。她说我永远不可能让厄内放弃传教。这使得我们无法尽情享受在美国的时光。这个问题在1951年我们经历了共产党之后变得更为严重。

在旋风式地访问了我们在德克萨斯的家人后，保罗·韦斯牧师和玛丽·韦斯和我们一起出发，同行至卡尔斯巴德洞窟。【保罗是厄内的一个哥哥。】

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穿过莫哈韦沙漠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贝蒂和碧翠丝很适应旅行。在加利福尼亚我们见到很多传教士朋友：辛普森一家，贺兰德一家和斯图尔特一家。我们以为我们会马上登船，但是遇上码头工人长时间罢工。我们住在赫维特夫人家中，那时她正外出休假。我们又交到好运。琼斯先生让我们使用他在唐尼维尔的一间小屋，他是我们在上海认识的一位药剂师。那是一次美好的内华达山脉旅行。晚上鹿出来，我们观察它们。一个早上我们发现了熊的粪便。那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天黑后外出。小屋的看守雷蒙德先生和彭菲尔德夫人带我们去看了那个地区的一处金矿和其他有意思的东西。我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每隔一天厄内下到唐尼维尔镇上看看罢工有没有结束。终于消息传来，罢工结束了。我们出发去旧金山登船。

我们1946年9月28日启航，乘坐之前是运兵船的猞猁号。这意味着有约两百人在我们这节，三十六人在我们舱口，全是女人和儿童。餐厅在更高的一层甲板上，由一个露天的楼梯上去。你能想象我带着两个孩子上楼梯去吃饭、洗澡、上厕所等等？男人在另一层甲板上。贝蒂自己有张床，我也有张床。为了防止碧翠丝在船上到处乱爬，我们在本来是床的位置放了一个儿童围栏。她在那里睡觉、玩耍。大约三分之一的女性晕船。我记得卡罗尔·休斯顿全程都病着。其他没带孩子的女性是天使，帮助我们带孩子的女性。在那趟旅途之后，我常说我们的主忘了一个祝福。它应该这样写：“独身的女性是有福的，因为她们是仁慈的天使。”那次两个星期的旅途是值得记住的。

## 中国：1947-1951

### 重返中国

1946年的某个时候，传教会理事会从美国军队买了一套位于菲律宾的多余的医院设备【移动军队外科医院的前身？】，那套设备将被分给中国南方的教会医院。当我们抵达上海，厄内斯特被选为分配补给物资的人员之一。在分配补给物资之前，厄内斯特到南昌作一次“快速”访问，见一见医院的工作人员和传教士们，还看了看需要什么。（那时传教士有卡罗尔·休斯顿、露丝·丹尼尔斯、弗兰克·盖尔牧师和格特鲁德·孔。）厄内斯特在医院所见令他难过。所有铁管、泵、电气设备、窗玻璃、电梯等都被掠走。没有被日本军队破坏的东西在军队离开后的空档被破坏。齐医生和其他几位医生正在做的工作给他很深的印象。他们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重新开始医疗工作。多个长串字母缩写的联合国战后机构在提供帮助（CNNRA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和UNNRA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还有IRC（国际红十字会）。正在复校的国立医学院请求南昌医院帮助为他们的学生提供临床教学以及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培训。

我们1946年10月到达上海时，安德森一家接待我们。他们不知道我们会停留六个星期。我们也不知道。物价令我们震惊。一条糖棒1800，双联肥皂660，咖啡3000—1磅，针织羊毛80000-100000—1磅，下午工作的阿妈【照看婴儿】6000-7000。

我们联系了我们在闸北集中营的邻居阿瓦德一家。他们有我们的一大箱银器、邮票、照片等。

几天之中，贝蒂和碧翠丝都患上痢疾。贝蒂很快恢复，但碧翠丝却病得越来越重。我们最后不得不带她去中国内地会医院，在那我们发现她还染上阿米巴痢疾。她曾捡起一只香蕉，没剥皮，塞在嘴里。她看起来像一个小稻草人。最后她恢复了，我们是时候继续行程。

回到上海后，厄内斯特将要送往南昌医院的物资聚到一起，计划11月23日左右离开。

没有船只只会送带着孩子的西方女人前往内地【因为战后的短缺和困难】。所以我们决定我带着孩子乘飞机，然后等厄内乘船到九江。那是令人难忘的旅行。我们被允许携带一个手提箱和我们三人吃的一篮的食物。幸运的是碧翠丝已经适应便盆，但她仍在吃婴儿食物。我真的得做些计划。我带着一个大篮子装热水瓶，篮子的一边我挂上碧翠丝的白色搪瓷便盆。1946年11月27日，上海的天气很舒适。我们穿上秋天的衣服。贝蒂穿上一件可爱的蓝色雪地衣。我们上午7点45离开上海，上午10点左右降落南京。这飞机是一架DC3，有斗形座椅【被改造的军用飞机】。非得另一位乘客帮我抱一个孩子。当我们在南京降落，我们被告知我们正处在台风当中，我们将不会继续前往九江。好吧，我不会返回上海，即便我要睡在地板上。南京的传教士刚刚抵达，他们没办法接待客人。不过至少我们找到了一处歇脚的地方。好吧，我们决定先去吃午饭，因为我们早上起得那么早。我们吃了典型的传教士午餐——花生酱三明治、煮鸡蛋、苹果或梨。碧翠丝的脸上和围兜上全是帕布龙【那时的婴儿食物】，贝蒂正在吃一只煮鸡蛋。这时飞行员走出办公室，过来大声说：“所有人

去九江，走！”其他人都已经离开，到某处就餐或者找住宿。所以一个苦力将碧翠丝和帕布龙等各种东西一下抱起。另一个人将贝蒂和煮鸡蛋等各种东西一下抱起。我能想到的就是她的雪地衣。我知道南昌不会有干洗设备。然而，我们首要的想法就是赶往九江。那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处在台风中，我很高兴有一位乘客照顾贝蒂。我们都晕飞机。不过所有事情最后都会过去。不久我们接近九江。雨倾泄而下，风平着吹。飞过长江时，飞行员一直在寻找机场。江看起来宽度超过一英里，尽管实际上没有。我们没有看见飞机场，但是我们在下降。我们降落在一片场地当中。惊喜！弗兰克·盖尔在那里迎接我们。他并没有按之前计划的前往南昌，而是选择留下来迎接我们。他一直想着他可以直接带我们去南昌。在倾盆大雨中，走在泥泞的地面上，风胡乱地吹，我们浑身湿透了。弗兰克带来了雨衣等。我们最终上了一艘小船，扑通扑通地渡过长江，期间一直在想我们能不能做到。当我们抵达岸边，并最终抵达卫理会传教站，我们又一次感谢上帝。帕金斯一家安排我们过夜。我们换了衣服，把湿衣服放在罐形火炉旁烘干，之后，一顿温暖的晚餐真的让我们感觉很好。

因为弗兰克“大叔”第二天将前往南昌，已经雇了一辆卡车，教会的人们劝我们走，不要等厄内。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直到圣诞节才见到厄内。好吧，第二天早上天气晴朗，一早卡车【旧帆布篷的军用卡车。】就来到我们传教站。它是满的，装载着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袋袋面粉和一些重箱子。我们登上卡车后面，与面粉和箱子在一起。那是一百英里的旅程。路不能称之为路。我们有条河要用渡船过去。我们抵达河边时，暴风雨来了，渡船坏掉。那是下午1点左右，雨倾盆而下，我们无法前往旅店。不仅如此，天气变冷，我们那天晚上遇到第一场雪。弗兰克大叔有准备。他随身带了几件丝质衬里的中国长袍，我们在卡车后面过夜时给我们保暖。当地一个旅店运来食物给我们。但是我们夜里在这些面粉床上舒服地睡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早上11点左右，渡船修好，我们出发。路上的坑洼超过我们的想象。有一次一个坑让我们颠得如此厉害，一个箱子飞到了卡车的顶部，落在那个白色小搪瓷便盆上，把它压皱得像一个手风琴。那太过分了！不管怎样，我们按时到达南昌。那是感恩节后天。我们很高兴，却又僵硬和疲劳。孩子们竟能逃脱肺炎，真是个奇迹。她们甚至没有感冒。

因为所有之前的传教士房屋都空无一物【因为战争期间的劫掠】，我们一开始和比我们更早回来的单身女性住在一起：露丝·丹尼尔斯、卡罗尔·休斯顿和格特鲁德·孔。第二天中国朋友们开始来访：我们以前的厨师、医院的人等。我叫来了一个木匠，为我们将要住进的房子做了一些家具。那是一栋大的双联房屋，舒伯特一家曾住过。建筑本身已经【从战争破坏和缺乏保养中】被修复。

我们抵达三周后，收到厄内发来电报说一艘载有教会货物的驳船在上海黄埔港沉没。五十吨物资中他们只救回一吨。第二天，经过打捞作业，他们得以找回医院的床、窗玻璃和数箱药品。我确信我们的个人行李也在那艘驳船上。但之后一封附信说它们安全。我们期待厄内启程，和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事实上他平安夜下午6点抵达。

当厄内斯特和齐医生抵达九江，他们将全部货物转至三艘帆船。这些船载着货物以及齐医生和一些医院工作人员经鄱阳湖到南昌。

厄内斯特带一些小的行李坐救护车从九江来到南昌。【不，他不是病了；那是一辆新的救护车，必须从九江开到南昌。】

在此期间，英国知名和平主义者缪丽尔·莱斯特在南昌停留了几天。她很出色。

## 1947

我们搬进我们的房子，开始拆开行李。元旦我和碧翠丝、贝蒂都病得厉害，腹泻、发冷和高烧。贝蒂神志不清，而我昏迷。这真是对厄内的盛大欢迎。我们把我们的痢疾归因于我在街上买的一些饼干。因为条件不卫生，我们在街上买的任何东西都必须去皮、开水烫或在烤箱中重新烤。不知怎么地我疏忽了，没有把这些饼干重新烤。我和孩子们同中国客人们一起吃了一些。我和贝蒂几天后恢复了，但是碧翠丝没有很快恢复。

1月中，我们已准备好开始在医院工作。厄内必须返回上海，帮助分配和归类医院物资。与此同时，我们收到来自亨利·福特医院【位于底特律】的一个包裹，厄内曾在那工作。那件包裹的关税高达20250法币。

厄内离开得正是好时候。从他离开直到他四月返回，孩子们生病，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首先贝蒂患上百日咳。碧翠丝在我们离开美国前没有接种百日咳疫苗，因为她太小。所以我们非常担心。我们设法找到一些疫苗给她注射，但是已经太晚。她已开始咳。如果她没有接种疫苗，我确信她会死，因为她的百日咳病情很重。一天她的呼吸暂停了一分钟。我叫来齐医生，他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他说他的儿子曾呼吸暂停两分钟【因为百日咳】，仍活了下来。而且如果我写信要厄内回来，等他回到我们这，碧翠丝的情况会变得更好或更坏。如果她会死，厄内也不可能及时赶到。那似乎是碧翠丝的转折点。那之后不久，贝蒂病得厉害，患上某种皮疹，而后又是红眼病。她在中国幼儿园里染上这些。

2月20日，一些【来自美国的】奶牛来到医院。因为我和弗兰克·盖尔是仅有的曾给牛挤过奶的人，我们被选派照看奶牛，并教一个人如何照看它们。当我们给牛挤奶时，人们聚集来看这些巨大的西方牛，还有两个外国人在给它们挤奶。太可惜了，我们没上电视。因为照顾这些奶牛更多地是一件幸事，而不是一项负担，其中两头牛被送到我们教会院落一段时间。

3月中，贝蒂得了水痘和支气管炎。在照顾孩子的间歇，我拆箱来自上海的医院的药品和补给。我必须写上它们的用法，因为全部的说明都是英语的。然后它们被放在储藏室的架子上，列出一份完整的清单。

我的确花了时间观察外科，看技术能如何改进，帮助他们准备好配合厄内斯特的技术。他们非常优秀。他们中的一些已在上海医学院和西门妇孺医院【一所教会医院】受过训练。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见到手术室中医生和护士的互动方式，和在手术室外的情形相反。惯常的礼貌性的客气不见了。相反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直截了当。当然他们讲礼貌，但是在手术室中直截了当是最基本的要求。我还抽出时间每天一小时跟我的老师学中文。

麻烦总是潜藏在周围。我们有一阵疫情恐慌。我们发消息给厄内，让他给我们送来疫苗。疫苗到了，医生和护士三人一组，由警察陪同，挨家挨户地走遍全城。我想



要和他们一起，但中国同事们说一个外国女性会引发太大的骚动。每天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接种疫苗。我们是一群病人，因为疫苗让我们很是辛苦了一阵。

现在，说回上海那边。厄内斯特得以从沉船中救回价值五千美元的物品。实际损失的物品约为一万美元。他最终将上海的那批物资和来自美国的床全部聚在一起。装载着供九江和南昌的三所卫理会医院的两百五十吨物品的大驳船4月上旬启程。因为长江和鄱阳湖四月水位较高，厄内斯特得以用一艘大驳船从上海一路驶到南昌。他在驳船上和船员们住在一起。厄内斯特4月18日到九江。在那里停留三日以卸载物资后，他继续乘驳船在鄱阳湖上航行了三天。他4月23日或24日抵达南昌。船员们对厄内斯特非常好奇，因为他是第一个乘坐他们的船旅行、吃他们的食物、睡在他们的甲板上的外国人。他们看着他打字机写信等。他被允许睡在船长的舱室，财富女神在他的头边，生育女神在他的脚边。这没效果。他从未变得富有，也没有更多孩子。他学到了非常多和船民的迷信和习俗相关的知识。

一个来自美国的包裹4月28日寄到。十一磅包裹的关税是42000法币。我们那时也从国际红十字会获得物资。齐医生负责此事，但当他不在时，我不得不处理。一些天主教修女从南城来取一些国际红十字会物资，我们必须打电话到九江。打电话只花了两个小时。这些修女是爱尔兰人。

有一些亮点。格特鲁德·孔知道我会弹钢琴。所以她让我在教堂工作。有时我会在她表演节目时为她伴奏。她有鸟儿般的歌喉。一天晚上我们被邀请至一位政府官员的家中。南昌的官员们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基督教的】葆灵中学或是豫章中学。有时，通过孩子们，父母们成为基督徒。一位官员成为基督徒并受洗。为表示感谢他请格特鲁德到他家中唱歌。还有一次，我们被请去一个家中，妻子是基督徒，但一直未能让她的丈夫信教。她去世了。在那之后他请我们到他家。泪水从他脸上流下，他说他唯一的愿望是他的妻子能够在她去世之前看到他受洗。

就在厄内到来之前，基督教青年会的路易斯·蔡从美国回来。我们急切地想听听关于我们国家他会说什么。他的印象如下：1) 商店在周日关门；2) 女人的帽子很疯狂；3) 纽约的火车站；4) 十三四岁年轻男女的自由；5) 纽约的自动售餐机；6) 出色的女性（指她们的教育程度和能力）；7) 富人和穷人家中都有供暖；8) 出色的教育；9) 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缺乏基督教精神；和10) 对盒子、木材和其他物品的惊人浪费。各种东西的丰富程度也令他印象深刻，像舒适的住房、冰箱、每家两台收音机、一两辆车、地上的地毯，等等。我想知道他今天【1979】会怎么说。

为了雇船从上海到南昌和将物资从九江运到南昌，共花费四千万法币。真的，当你想一想，就会明白后方的人们给了传教士极大的信任，来处理如此大量的钱物。汇率是12000法币兑一美元。

卸船花了三天。医院的物品被送到医院，我们的物品到我们家。医院所有的空房间都被用来打包或拆包物资：用于换敷料的新滚轮车、手术台、担架、X光机、冰箱，等等。药品和外科用品还要更长时间。我们在医院的办公室被塞满了东西。然后我的工作开始了：为到来的物品列清单以及找到正确的英文名并把它们翻译为中文。每天我们两人在医院帮忙拆包直到下午6点，然后我们回到家中拆包我们个人的东西。就在那时我们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我们决定从那时起我们自己采购和打包【不易变质的食物和其他物品】。一台全新的缝纫机经过一路运输坏了。运送它的盒子是好的！那就是说，当有人去上海时，他们得带它去修理。打包我们餐具的工人不

称职。一盒盐撒了，使得所有的铁器生锈。至少50%的玻璃器皿损坏。烤盘弯折扭曲，不得不修理。有些东西，像绞肉机的把手和一些用具，完全不见了。不管怎样，床和床垫完好地运来，医院的许多物品都很好。

因为碧翠丝已经将近5个月没有见到她爸爸，她真的不认识他。

现在厄内斯特已回来，我们的行李已拆好，是时候开始宴请我们的中国同事、牧师等。我们尽量按照当地的习俗。一起用餐是了解和熟悉我们同事的最好方式之一。我们小心地不弄混群体。那是说，你不能在请工人群众【蓝领群体】时，又请地位更高的护士或医生。因为我们有一个厨师和一个照顾孩子的阿妈，这使得我可以全心投入医院的工作，不用担心家务琐事。厨师必须每天上街买肉、新鲜蔬菜和其他食物。市场至少有一英里远【所以厨师必须走路或坐人力车】。我们没有冰箱。洗衣服靠手，其他的事情也是。我们没有冰箱。熨衣服是用一个烧炭的熨斗。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适应倒退至若干年前的生活。

医院满是伤寒、鼠疫、肺炎、结核、腹腔深部脓肿和肛瘘的病人。

黑市汇率是三万法币兑一美元，而官方汇率是一万两千比一。

1947年5月19日，我们在医院安装了新冰箱。它用汽油，很安静。它运行一个星期需五加仑汽油。

5月27日，当地大学有一场学生罢课。政府官员将它置于控制之下。学生们来到我们医院。他们赢了。

1947年6月7日，我们和政府的护士学校会面，和他们签了一份新合同。他们的三分之一的学生将于7月1日离开南昌医院，因为他们正在建设他们自己的医院等。三分之一的人会继续假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会留在这里。之后我们会考虑开办一所护士学校。我们会找一名中国护士来主持，而我会做顾问。

6月30日有一场小洪水。水漫过江堤，到了和医院相邻的我们院落的第一个斜坡。

1947年6月23日是端午节，我们吃粽子。粽子是玉米叶卷着的糯米，蒸熟后趁热吃。你可以把糯米蘸糖。如果你吃得够多，你会沉到湖中！【熟糯米密度很大。】

我们的孩子适应得非常快。碧翠丝向每个人问好，已经会说许多中文。当她累了，她会抓一块碎布，把她的拇指放在嘴中，用碎布盖住她的拇指和拳头。贝蒂爱花。她摘下它们，把它们戴在她头发上和纽扣孔中，又送花给每个人。她们很快和隔壁齐家的女孩们成为朋友。

7月8日我们去农村野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人用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军用货车载我们。那是六十里旅程【一里=500米】。因为一座桥坏了，我们无法前进，只得等它修好。我们一直等到最后一块板被钉上。

我在南昌遇见的最优秀的女性之一是路易丝·王。我猜是音乐把我们拉到一起。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她将前往美国作一年的学习。我多么想她！我们最好的学者之一也将同时前往美国。他不擅长社交但是一个好基督徒。他的名字是楚牧师。后来，这两位将对我们有很大意义。

我们很依赖于自行车。传教会理事会将它们包在救济衣物里寄给我们。这些衣物中许多儿童的长裙和短衣。我拆开那所有东西，放在客房里。一天，贝蒂带她的两

名好朋友到客房，给她们每人三套短衣。后来当我发现此事，贝蒂坚持让我上街给她们每人买一顶帽子。

好消息！南昌和九江之间的铁路已贯通。我们可以坐在车厢中，九个小时到九江。天气很热，是时候带孩子们离开低地，去牯岭凉爽的山上。据说过去，在西方女人和小孩能在夏天前往山上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死去。所以我带孩子们去山上。我们得以在七月乘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卡车前往。花了十二小时，行驶一百英里。我们组成车队，因为土匪极为猖獗。我们的车队有五辆卡车和一辆客车。每辆卡车有两名士兵。每当我们停在一处，我们就像《格列佛游记》中的格列佛。乡民们会出来看“洋鬼子”。大约晚上8点到达九江后，我们在比丽·琼斯【女传教士】处过夜。厄内和齐医生原计划赶第二天早上的飞机去上海，但他们的航班被取消了。所以他们和我们一起上山。我们乘客车从九江出发到山脚下，大约十四千米。我们被用轿子抬上山。每个轿子由四名轿夫抬。轿夫们每天要走好几趟，但对于我们，走上山会是一件真正的难事。孩子们喜欢这趟旅途。我们的行李、食品等由一些苦力驮着。在山脚下我们很热。等我们到了山中的谷地，我们需要一件毛衣。轿子的行程有两个半小时。我们有兴致地观赏云。当云从山上翻滚而下撞上我们，贝蒂极为兴奋。不同的气候当然会有不同的作物。我们就是在那里买到土豆和大黄。我带了一些罐子装大黄。

几天后厄内和齐医生去上海取一辆救护车。他们轮流把它开回来。在他们的路途中经常要大量交涉，齐医生作翻译。救护车是从美国运给奥林·斯托克威尔医生【卫理会传教士】的，但没有办法送到他那里【在中国的另一处】。所以它被卖给我们医院。

在这期间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超感官知觉。（在那之后我有很多那样的体验。）厄内斯特和齐医生7月26日启程从上海返回南昌。第一天他们行至杭州，大约走了一百英里。不算太坏。他们住在长老会传教站，在那里遇到一些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凯恩镇的朋友。根据厄内写给母亲的少数几封信中的一封，救护车是和另一辆给帕提先生【卫理会传教士】的车一起用火车运输。三人睡在平车，和他们的车在一起，直到他们到达兰溪。他们浑身都是火车引擎的烟和灰。从那里他们开始自己驾车。那时起他们进入土匪出没的区域。桥梁被破坏。他们被困在第一个渡口，不得不付一大笔钱让救护车和另一辆车过河。跨过溪流唯一办法是驶过架在上面的原木或枕木。在一个地方，他们很可能因一些士兵才得救。很难找到地方睡觉。最终，当他们碰巧在一个镇上，他们去找当地最大的商人，解释了他们的困境。主在此事上伸出援手。这名商人将车辆带到他的院外，雇了四名警卫保护它们。这名商人还给他们提供洗浴、晚餐和晚上的住宿。在那期间，我在夜里被唤醒，有某种东西告诉我他们需要我的祈祷。我担心得来来回回地走。从那时起，每当我从沉睡中醒来，我知道主有消息给我，而我遵行。

他们抵达南昌，又热又脏，筋疲力尽。厄内人生中第一次全身都是痱子。

牯岭【在山上】很适合为冬天做准备。我在那为孩子们织各种衣物。冬天孩子们穿上织的毛衣和毛裤。毛裤外还罩着裤子。她们同时穿几件毛衣。她们会问朋友：“那是几件毛衣的冷？”

牯岭还很适合远足。一处他们叫作“狮子岩”，这样叫挺准确。那里直降2000英尺。每当你走进一片云，你得停下，直到你能看见。否则就会坠下悬崖。在一处有一个

奇异的现象。平淡无奇的地方中间立着三棵非常高的杉树。它们看起来就像非常高的加利福尼亚红杉。与它们周围细瘦的杉树相比这三棵树像是巨兽。

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点，叫作落日岭（译注：此名称从英文回译，从其他英文文献可知位于莲花谷旁）。那里你从山谷望去，能看到九江城和长江。这让我想起耶稣望见耶路撒冷城而哀哭。

来自各个宗派和各个国家的传教士，还有西方商人，在夏季来到此处。蒋介石委员长【中国总统】和他的夫人也来这里。我们很荣幸一个周日能在教堂坐在他们后面。我们很高兴他来，因为他带来了他的警卫。那也可为我们提供保护。

花和鸟与低地的花和鸟不同。我们看到许多鸟，包括亚热带的鸟。我成为一名观鸟爱好者。

碧翠丝正在捕捉新的词和表达方式。物价飞涨，当厄内听到邮费时，他说：“天哪，不会吧！”从那时起我们听到碧翠丝走来走去，说：“天不会，天不会，天不会。”

汇率再次开始飙升。现在是四万法币兑一美元。一只鸡蛋值六百法币。

我请美国朋友用包裹寄来蜡笔、铅笔、发夹、线、肥皂、小玩具等。这些东西会被存到圣诞节，到时医院每个工作人员都会收到一份礼物。我还请求寄来用过的圣诞卡片。这些用过的卡片被反复使用。一些学生把它们放在墙上。我们学到用包裹寄食物有风险，除非它是罐装的或是封得严实。否则它无法在夏日的炎热中幸存。一个包裹中装着几包干豌豆汤料。当我们打开汤料，发现它上面全是霉。干谷物片也是同样下场。如果我们买了一罐五磅的可可粉，我们不敢打开它，除非我们计划立即把它全部用掉。我们学会在干燥的天气打开那种易变质的东西，并把剩下的重新封在小罐中。

与我一起工作的最可爱的女士之一是露丝·喻夫人。她和我在医院共一间办公室。我们分享了许多故事。还有其他女性，像林小姐、齐小姐、罗小姐等。

每年9月15日左右天气会突变，气温从华氏100度降到64度。我们会数到9月15日还有多少天，像美国的孩子们数到圣诞节还有多少天。

我们的医院在中国南方很有名，常被叫作“小协和”。南昌还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总部，并有一座大火车站。因此我们的医院常有西方【美国的或欧洲的】病人。中式饮食通常不太合西方人胃口，如果你又生了病，……！所以我们会从我们家中为西方病人送餐。手术后他们会在我们家中休养。在我们第二次在中国工作期间，我们只有六个星期没人与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从中国善后救济总署收到一些用作婴儿尿布的布料。你们能想象一所医院在没有婴儿尿布的情况下运转？母亲们带来她们自己的尿布。【那时还没有一次性尿布或一次性的任何东西。】

现在是时候教人们清洁医院的大厅和房间。我们给每个清洁工拖把、桶和水。我发现水被倒在地上。好吧，可以用示范的方式教。所以我用拖把拖地，不久我们就清洁了大厅。

因为我们是两千英里外的北京学过中文，我们又得在南昌学一种新方言。在北京我们称女教师“Jiao Shi”，在南昌称为“Lao Shu”，在北京的意思是“老鼠”。我感到太

尴尬没有问为什么女教师是老鼠。一天我发现他们不是说“Lao Shu”而是“Lao Si”。（译注：此处为方便理解，将原文中的拼写转为汉语拼音。）这只是一个词。你们想象不出因为语言的误解我们陷入了怎样一团糊。

在周日晚上我们前往基督教青年会参加英语教堂活动。有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人用他们的吉普载我们去。我希望我是一名漫画家，能画一幅吉普和吉普上的人们，下面写上“它带你去”。但因为我只是一个呆“瓜”——中国人把笨脑袋叫做“瓜”，不像我们叫做“卷心菜”——所以我只好留待其他人来画这漫画。

偶尔我们做爆米花。不长时间消息就传开了。我们旁边突然就聚来一群中国孩子。齐医生的最小的女儿喜欢面包和果酱，她会来我们家，吃上一些。碧翠丝会去齐夫人门口的台阶上，得到一些中国食物。贝蒂和齐家更大的女孩也是好朋友。

碧翠丝已是一个真正的淘气鬼。厄内和我出去参加晚宴，把孩子们留在家吃东东西和小睡。我问碧翠丝她吃了什么。她眼睛闪了一下，说：“小睡。”我认为贝蒂会成为一个生物学家。在牯岭她捉蝉。回到南昌她捉蟋蟀，还请她的所有小朋友帮忙。

我们开了一所护士学校。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最终会有一名全职校长。目前我暂时代理校长。我做临床教学、教手术室技术，并部分时间在手术室工作。我们第一班有五名学生。

9月28日，城中有一场严重大火。超过一千户被毁，一万人无家可归。

地震在那一地区很少听说。但1947年10月27日，我们因床的摇晃和窗户的撞击声而醒。

我们经常请成群的人到家中吃晚餐。一天晚上我们请来实习医生和住院医师。我们问他们想吃什么。他们一致要求吃西餐。对他们所有人这是第一次吃外国食物。所以我们一步步教他们怎么做。我们几次笑出来。我们提供的食物中有果酱和面包。果酱沾到许多地方，甚至是土豆泥上。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人如此兴奋，汗从他脸上流下。那是11月，屋里没有取暖。我们后来做游戏。这既给我们带来许多乐趣，又增进了我们的关系。

我们不时闻到不寻常的臭味。在餐厅和客厅之间我们有滑动门。一只老鼠死在那些墙中的某处，我们够不到。我们不得不取消一段时间内我们家中的聚会。我多么希望我们有一些今天的除臭剂。

1947年10月，一个早产儿在我们医院出生。我们给婴儿皮下注射葡萄糖溶液，每次用滴管喂婴儿一盎司母乳。10月19日婴儿回家，重四磅十盎司，比出生时增重两盎司。

1947年11月，在福州举行卫理会来华百年纪念。我和孩子待在家中，因为我严重感冒。厄内上午9点左右离开。午饭后我躺下休息，正处在梦境的第一阶段时，我听见厄内的声音，惊得我醒来。我认为我一定是在做梦，但那**不是**梦。他和那架飞机上的所有美国人走进前门，那天晚上和第二天和我们在一起。飞机遇到一些液压问题，只能不用起落架降落。南昌有最长最合适降落的机场。所以飞机只有转头返回南昌。厄内说，奥林·斯托克威尔【传教士】一直在读一本悬疑小说，直到他们遇到问题。他突然拿出他的圣经。一位女士问飞行员事情是否严重，他说：“真他妈严重。”厄内说，当他们接近南昌，他长舒了一口气。他确定如果他们坠毁，至少他

们会被找到。(福建,那时福州的机场,是在多山的地区。)(译注:原文如此)飞行员是一名美国华人,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他盘旋又盘旋,直到他不能再盘旋。然后他从机场的远端开始降落。主让飞机停在跑道的最尽头。否则飞机就会落在壕沟中。我从感冒中恢复,能为这所有人提供食宿,我不止是高兴。等飞机再次出发并抵达福建,我更高兴了。

我给母亲写了一封关于中国的结核病工作的信。信上我贴上中国的“防痨章”,它讲的是上海的结核病工作。海岑加医生,一位传教士医生,曾在上海做结核病工作。这个邮票就是纪念他。战争期间海岑加医生因为年老在我们的集中营【闸北】去世。吴绍青医生接过这工作,已获得相当的声誉。我们战争期间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见过他。吴医生曾任南昌医院院长。

1947年12月,路易斯·罗宾逊小姐来访,令我们极为兴奋。她是首位访问我们的教会理事会代表。通过她的帮忙,南昌原康爱德医院【卫理会女医院】将被重建,用作结核病医院。

1947年圣诞节前的一周不同于平常年份。我们这里下雪,供水系统结冻。猜猜我们这些疯狂的美国人做了什么?我们做了冰淇淋。天气如此之冷,我们几乎要坐在罐形火炉上吃冰淇淋,但它真好吃!

时不时我们遇到一些在我们医院中引发骚动的美国病人。雷顿·韦恩代表友爱会工作。他患上肺炎,需要每三个小时肌肉注射油剂青霉素。他的臀部成了插针垫。他逗中国护士,直到她们分不清他说的是真话还是玩笑。他描述她们的注射方法:首先,他说,她们用加冰的酒精擦拭来冷冻。然后她们找这里最钝的针,甚至不应该给马用。她们扎穿皮肤,寻找神经。当她们找到神经,哇哦!她们注射青霉素。然后他嚎叫,就像有人要杀他。

临近圣诞节时我们的合唱团在广播电台演唱。我表演了一些曲目,包括卡尔·穆勒的《圣诞幻想曲》。

我拐弯抹角地得知贝蒂将在圣诞表演中扮演圣母玛丽。她已学会一些中国习俗,就包括给我那样的惊喜。

好吧,1947年圣诞节很不寻常。12月23日我们在教会的教堂有两场重头戏。先是耶稣马槽降生场景,接着是一场悲剧。在最后时刻,街上的人们涌入大门,挤进戏剧上演的地方,那里本已过于拥挤。他们以前从未看过马槽降生场景,他们大笑是因为他们觉得好玩。这是一个传播福音的绝好机会。我们停下表演,告诉他们耶稣降生的故事,然后继续节目。在两场表演之后,圣诞老人来给每个职员和他们的家人一个小礼物——一盒蜡笔、一条肥皂、针、线等。我想到了所有在后方为这些人有个更好的圣诞节出力的人。合唱团还在省医学校演唱,同样我也表演了几首钢琴曲。

圣诞节当天凌晨2点唱圣诞颂歌的人开始到来。整晚他们一小组一小组地来,直到五点半。然后我们试着抓紧时间眯一下,却又被我们的两位小天使贝蒂和碧翠丝吵醒。妈妈和爸爸早已寄来我们的圣诞包裹,所以它们已在客厅。有玩具娃娃给贝、碧。从那时起娃娃每天晚上陪贝、碧睡觉。

圣诞节后过两天是齐医生的生日。碧翠丝的生日是28日。所以我们两家一起庆祝。我们第一次请齐家来我们家吃西餐，看到贝蒂向齐家的孩子们演示如何用西方的方式吃东西相当好笑。

## 1948

贝蒂开始上中国学校。学期末时她在她班上排第九。她只上半天学。另外半天她跟着我努力学习卡尔弗特家庭学校课程。她是一名出色的学生。

共产党已在中国北方造出很大动静，我们在美国的伙伴很担心。我们觉得相当安全。

寒冬中的一天，一个婴儿被遗弃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他们把婴儿带给我照料，直到我们能找到一个收养家庭。养母来带走婴儿那天，出门时有人放了几串鞭炮，为婴儿的新家祈福。你们觉得这习俗如何？

中国新年在1948年2月10日来临。一整天人们来祝我们新年快乐。每人都期望得到一点吃的东西。我们摆出花生和中国茶。这持续了三天。到那时，厨柜空了，人们也吃厌了。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新年，地上有一些积雪。我们让碧翠丝出去在雪里玩。你们应该看看在雪里玩时她脸上的表情。

我们所爱的人中有很多生病。盖尔医生【女传教士】不得不接受手术，正在康复中。齐小姐，我最喜欢的护士，病得厉害，后来好转了，多亏了青霉素。彼得，一个基督教家庭的小男孩，患骨结核，随着感染侵入他的大脑，慢慢地死去。他有所见过最大的褐色眼睛，是那么好的一个病人。他过去总是笑。

大米现在超过一百二十万法币一担【“担”是中国的计量单位，像我们的“品脱”或“蒲式耳”】。一年前的价格是大约五万。对于穷人这太可怕了。一名护士告诉我们有些人只能吃米糠。结核病确实造成了很大危害。一名护士因它病倒，一名医生也是如此。然后卡罗尔·休斯顿也染病。

3月1日，我们的护士学校开学。我代理校长，直到我们可以找到一名合格的中国护士接任。在某些方面，我一个外国人做校长有优势。我可以坚绝对申请入学者说“不”。中国人不能对亲戚或朋友说“不”。一个年轻女孩试图不参加入学考试就入学。我可以简单地说“不”。这是好决定，因为她三门考试中两门不及格。然后她来问是否可以让她们试试，看看她们能做什么。我尝试了各种客气的说话方式，最后我问她那样的分数她能否进入教会女校。她说：“不行。”然后我说她必须提高自己的水平才能学习护理。

三月初，我们遇到了白蚁问题。我们的房子似乎正好有那种对它们胃口的木材。它们大吃特吃。不久我们的地板就出现了洞。有种木材它们不会吃——樟木。我们只得打水泥地基或者用木馏油处理木材。

大约这时，一些优秀的音乐家来到我们地区。其中一位是张小姐。她真正有鸟儿般的歌喉。我多次为她伴奏。

妈妈和爸爸不断用包裹给我们寄来物品。每个包裹中他们都会放一些有滑稽图的报纸。那些报纸会第一个被抢着拿出来。它们一家一家地被传看，直到它们变得破破烂烂。

夏天的鸟儿来了。南昌在许多鸟儿的迁徙路线上。很有一些热带鸟类在我们的路上晃荡。其中一种鸟是寿带鸟。它的尾巴是锈色的，长度是身体的三倍。当它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尾巴会在风中起伏。它是一种很害羞、很安静的鸟，不像松鸦。它们只是小声地“吱吱”地叫。

各种传染病随着夏天到来。一天男校的一名学生突然患上脑膜炎，在有人能为他做检查之前就死去了。这使整个地区陷入恐慌。在那之后不久的一个夜晚，贝蒂在半夜醒来，尖叫。当我赶到她身边，她神志不清。她坚持说她后脑痛。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她得了脑膜炎。我们在医院为她订了一个房间，好让他们做脊椎穿刺。在我们已准备把她送到医院时，她从小睡中醒来，感觉好多了。头痛消失了，她被发现患了早期支气管炎。接下来她每三小时接受青霉素治疗。

我们收到足够的纱网布，所以我们可以为医院做蚊蝇防护。医院的每个工作人员也得到一块网布用于自己的床。我们从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得到DDT，这意味着臭虫的末日。

霉，霉，霉！雨，雨，雨！现在是雨季，很热。我们无法让我们的衣服变干。今天的快干衣服【和电烘干机】真是太棒了！雨水如此之多，大地成了海绵。当太阳满怀报复的怒火出现，大地蒸发出水汽，我们洗的衣服也是如此。结果就是我们所有的衣服都闻着作酸味。我们的鞋子过一个晚上就长霉了。

我们的房子大多数时间满是人。那是因为南昌已成为一个交通中心。方圆数英里的人来到南昌医院。南昌是上飞机或火车或客车的地方。要从上海前往牯岭必须经过这里。1948年5月23日的那个星期，菲茨一家（宣圣会）过来，想找个地方住大概一天。他们的儿子病得很厉害，所以他们停留的时间延长了很多。与此同时，建筑师保罗·韦恩先生，布利斯·韦恩【卫理会传教士和音乐家】的哥哥，来到南昌帮助我们开始结核病医院的建设。因为家中有如此多的人，我不得不清出贮藏室，放进一张床，把孩子们移到楼上的封闭阳台。我们非常欣赏保罗·韦恩的才智和对我们的帮助。之后他会再次到来，并带来他的两名中国同事。

医院的问题很多，不仅仅是关于病人的。时不时我们会失去护士。一名病人告诉护士长他看见她的丈夫和其他女人出去。我们知道她的丈夫不太忠诚，但仍抱有最好的希望。她与丈夫对质，而他否认这指控。他发现了是谁告的密。他向那病人大吵大嚷，甚至威胁那病人的生命，我们不得不要求他离开。那意味着他也会带走我们优秀的护士。

菲茨一家终于可以再次出发，但因为洪水他们无法离开。最后他们只能以65美元雇一辆卡车载他们走一百英里，还要付汽油钱，超过一美元一加仑。

一天晚上，我以罕见的荣幸在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英文俱乐部发表讲话，谈医疗和基督教。大约有三十人在场，只有三人是基督徒。集会大约进行到一半时，一个男孩问他如何才能找到更多关于这个“基都”的内容。这次集会时间很长。那样的黄金机会会有很多。

厄内在亨利·福特医院工作时做了一些X光工作。那些经验在许多方面获得了回报。他被叫到九江帮助他们安装X光机，并向他们演示如何使用。厄内被认为是江西省最好的X光师。天气热，热，热。厄内进入X光室拍X光时，里面没有风扇或空调。所以他出来时汗一直滴。



炎热的天气对许多东西都不是好事。一箱多维生素药来了。我们不得不很快找一些男孩，让他们一次数出一千粒，把它们装入瓶中。否则它们会全融到一起。

格特鲁德·孔小姐刚结束休假返回。她带了一台收音机，但不得不把它留在海关。当她终于拿到它，所有好的真空管都被拆掉，安上坏的。她不得不等上很长时间以换上新的。

碧翠丝已成了一个淘气鬼。当我说“吃饭”或“洗澡”，她就跑着过来。当她想睡觉，她跑上楼拿她的枕头给我。

贝蒂已为又一次生日作好准备，计划了一场聚会。她在冰淇淋和中餐之间考虑。

初夏我们收养了一个男孤儿。唐林，十岁，在医院吃饭，和厨师一家一起睡，我们送他上学，我们还给他买衣服。我们让他白天在我们家玩，晚上指导他做作业。我们不会知道后来他几乎令我们全家丧命。

我们得到一台收音机，这意味着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准确时间。

1948年6月16日，我们进行了护士学校学生期末考试。

天气已经非常热。唯一保持舒适的方法是每天在浴缸中泡两次。我们只能把浴缸装满水清洗，因为很难把水全都抽出来。

1948年6月22日，我们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际红十字会收到三箱各类手术器械。

我们收到一些电风扇，令炎热的天气变得可以忍受。风扇被放在手术室、X光室和家中。电力只在晚上有。

7月5、6、7日，一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波丽娜·张到南昌举行演唱会。我为她伴奏，花了不少时间练习。她用英语、意大利语、德语和法语演唱。

通货膨胀突然急速上升。6月30日我们收到一个来自美国的包裹，关税为一千五百万。

除了接待来来往往的客人，我们还得从里到外把房子粉刷一遍。粉刷匠每组三人，以旧方式工作。他们先刮掉旧粉刷，再重新粉刷。当然我们不得不将家具四处移动，并忍受噪音。我们的客人对此不在意，只要他们有东西吃，有地方睡觉。事实上粉刷匠的工作做得很好。木工完成后，他们在地板上刷上清漆。它有美丽的光泽，能用水洗，防白蚁，耐热。清漆唯一的问题是刚涂上时如果你接触到它，会像毒藤一样引发皮疹。正当各种粉刷和上漆工作进行时，又有一名客人来了。她提前送来她的行李，而我所能做的就是让她待在房间中间。

我已计划好粉刷一结束我就带孩子们上山。厄内和齐医生计划前往上海为医院取一些资金。正在这时我们得到消息说九江发生洪水。九江在前往牯岭的路上，所以我们不能出发。我正是这么想的！那天晚上我们上床睡觉时想着我们会在南昌多待几天。但就在夜里我和贝蒂两人对清漆过敏。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做——离开这房子。

当粉刷进行时我们搬到室厅吃饭。我们搬到封闭阳台睡觉和穿衣。是时候做罐装桃子、玉米和番茄。因为洪水的消息我们必须接受伤寒和霍乱疫苗注射。贝蒂每天问

我们什么时候接受注射。她知道我们没有接受注射就不能上山。所以在为清漆所苦又未能接受注射之时我们是很可怜的。剩下唯一要做的就是收拾行李出发。

【清漆被用来防白蚁。那里白蚁的胃口令人难以置信。一次他们吃穿了希尔达的集邮册。那是说，它们吃穿了贴邮票的所有纸页。它们不吃邮票本身，因为它们不喜欢邮票上的胶水！】

我们买了票，希望我们能克服洪水的困难。直到我们到达九江我们才知道我们乘坐的是最后一趟离开南昌的火车。在九江附近，洪水已经切断了公路和铁轨。所以我們很幸运。

因为我们必须带上食物、餐具、衣物和其他各种夏天的必需品，我们有十三件行李。其中还包括为冷天准备的被褥和羊毛外套。我们出发时穿着短衣，孩子们也是。我们上午七点半离开家，等待行李检查等直到九点。如果厄内在那里可能会快点，但他已在去上海的路上。通常火车走这段路要三个小时，但那天花了五个小时，因为我们必须在经过一些洪水区域时缓行。我们刚到九江就又遇上一场倾盆大雨。我们不得不坐下等待。雨一停我们就出发，走了大约一个街区，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可以雇到一条船穿过城市。从那里我们没法到传教站。这条船花了我们八百万法币，但是我们得以到达一座小山。在那里我们雇了一辆卡车，带上我们的行李和两个帮佣，行驶半个小时到山脚下。你们会问为什么我必须带两个帮佣和我一同上山。好吧，我要全部时间给贝蒂当老师，而小的正在长牙齿。坐卡车的费用是一千八百万法币。然后在山底下我们要和抬我们上山的轿夫讲价。那真是麻烦。突然我见到一位老朋友，刘老板，他长年送传教士们上山。他就像贼窝中的天使。他来接手。当我们正要出发上山，天又开始下雨。我们知道山路会变得很滑，而且天就要黑了。所以我们决定留下过夜。我们被领到一个小旅馆的一个楼上房间，那里实际是阁楼。我们安好折叠床，和鸡一起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了一些饼干和茶。在轿子上颠了两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了那个会是我们夏天的家的地方。孩子们真的很享受坐轿。我更喜欢走路，但没办法走完全程。在某一处，我走了一千级台阶。这趟旅程共花费九千万。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电报要钱。那是确定无疑的。通货膨胀无休无止。我们为中国担心和害怕。仅仅两年前汇率是三千比一，现在是八百万比一。

牯岭美丽又凉爽。我们的夏季别墅几乎位于“卫理谷”（译注：老别墅群一带）的山顶。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餐厅看到六七重山。因为房间或多或少都有玻璃窗，我们可以看到云互相追逐，从一座山上翻滚而下，又爬上另一座山。我敢说上帝在这里那里放下一堆堆土时是很享受的。当我们不看云时，我给贝蒂上课或为冬天织衣物或写信。

大约8月3日我们从厄内处得到消息，他和齐医生正在从上海返回的路上，他们已花费三百亿法币在结核病疗养院的建设上。那在任何语言中都是一长串数字。同一天我们沿着山谷到山中小镇买几个饮水的玻璃杯。一个玻璃杯要四十万法币，一担米要三千两百万法币。

在研究和观察物价上涨的间隙，我们观察鸟类。山雀以一种吸引人的方式倒挂，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听起来像火。另一种鸟，声音很大，也很多彩，是华南松鸦。还

有一种鸟我们一直没能认出名字，是一种深色的鸟，翅膀上有一个白色的三角形，尾巴橙色。

报道中说洪水正在消退。物价仍在上涨。十二盎司煤油要三十美分。洪水或许已经消退，但【社区】游泳池的水确实已经消退。事实上它出现泄漏，必须维修。所以它被排干。一天晚上晚饭后，贝蒂和她的朋友去散步。这次他们想把碧翠丝也带上。我同意了，警告他们注意游泳池。游泳池四周有护栏，但有人拔起了一些桩子。贝蒂和朋友们要聊天，自然地碧翠丝就走散了，走到游泳池。游泳池边有约一英尺宽的水泥过道，但碧翠丝要凑近看。她摔下去，脸先着地。一些大一点的女孩看到她摔下去，送她回家。我给她洗澡，包扎伤口。当她脸色发白，开始呕吐，我吓到了。我确定她有脑震荡。我发消息说我要带她去九江。但他们回复说天气很热，跑一趟对她的害处多于益处。所以我们只能焦虑地期待好转。我整晚坐着陪她。到早上，她看来好了些，但她的眼皮青紫，肿得睁不开眼。周日她想去周日学校，我们决定不让她去。她青紫的眼睛可能会影响布道或是引发围观。尽管她受伤了，我看到她拿一本贝蒂的小书给厨师看，向他解释什么意思。贝蒂一直在教她。

碰伤的青鼻子成了流行。当和孩子们一起走路时，贝蒂没有留神，摔到了鼻子。还有一次，我们正从家往教堂走，我们抬头看，发现迎面走来的是蒋介石委员长和夫人。我们让到一边，蒋夫人向我们非常亲切地微笑。他们曾到教堂见所有小孩子。后来我们在教堂里看到他们。【蒋夫人和她的姐妹与中国卫理会有强有力的联系。】

厄内终于来到山上。第一天，我们几乎没法让他离开床。我们一把他移到椅子上，他就一动不动地待在那。他带来消息，医院将得到一个冷藏血库。还有一个包裹送来女孩们的奶奶给她们做的一些裙子。关税仅为六千三百万法币。

厄内到达几天后，中国的货币从法币换为金元券。

一个传教士家庭有一只宠物兔子。因为他们就要下山去，而后休假【回美国休一年】，他们把兔子给贝蒂。好吧，一连几天，女孩们争吵着谁该来喂他。它真是会很讨人喜欢。它会直接从我们手中吃，甚至会吃糖。

另一个传教士家庭给了我们他们的大黄猫，因为他们也要休假。我想知道谁会胜出，猫还是兔子。猫是令人珍爱的动物。这天终于到来，我们要回南昌了。我们要如何带猫和兔子下山？我们已经有孩子们和许多东西要带。贝蒂把兔子放在一个有绳子收口的糖果袋中。她和阿妈坐一台轿。我把碧翠丝放在腿上，再加上猫，它被系在一个篮子里，有一块肉给它吃。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我们到达山底。在那里我们和一些友爱会单身男传教士一起坐上一辆卡车，它将载我们和我们的包、行李去火车站。这辆卡车已经快不行了，冒烟、颠簸、哼哧哼哧地响。令我们痛苦的是它散发出汽油味。但这是唯一的交通方式。所以我们挤在一起，坐在行李上。摇啊摇，颠啊颠。过了一小会，我们的阿妈，熊嫂，脸白得像一张纸。每当她感到东西在动或是看到东西在动，她就会晕。她很难受。所以两个孩子都归我带。又一会，贝蒂也晕车，要我抱着兔子。好吧，不久之后兔子的耳朵塌下来，瞧它那样子。看起来我们都晕车，但我们仍继续前进。一个小伙帮我们照看猫，他说：“看这猫！”你所能看到的就是猫的眼睛眯成一条窄缝。它瘫在篮子中，对肉或兔子都毫无兴趣。我们其他人挺过这趟旅途，到达了九江的传教站。在那里我们和教会的同仁们一起吃午餐。那时猫和兔子一直待在一起。猫没兴趣追兔子，兔子病得厉害，也不怕凶

狠的猫。我们上了火车，又把两只动物放在一起几个小时。似乎和平已降临所有造物，包括动物。

在我们到达南昌后，当气味消散，我们只得把两只动物分开。我们不可能眼睛一直盯着兔子。一天它大胆地跑出去，跑得太远，这便是故事的结束。猫是一个捕鼠能手，真的养得很值。但是一天它跳进屋顶上的排水管。它很可能是在追一只老鼠。我们一直听见喵喵叫，但不清楚猫的具体位置，等我们找到时已太晚了。它太虚弱，没能活下来。直到今天我还是忘不了那个场景：从山上回家的路上，两个晕车的人和两个晕车的动物。

在我们下山前一两天，我们和一群传教士一起在中国餐馆吃晚餐。在那里我们遇见莫法特一家。我们不会知道我们会在韩国遇到萨姆·莫法特，参加他和第二任妻子的婚礼。他们很受我们喜爱，特别是在厄内1974年生病【中风】期间。

## 重返工作

在山上下下来后我们投入我们的秋季工作中，包括会议等，还有许多来访者。我们的来访者中有一位是吴医生。他和我们的一位传教士（Elma Pennepacker，彭英美）结婚。吴医生是一位结核病权威。当我们去上海时，我们会去拜访吴医生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安妮和弗兰克。瓦尔德会督和夫人也来了。瓦尔德会督喜爱做糖。所以在我们后院的楼梯上，厄内和瓦尔德会督捣太妃糖，而凯瑟琳·瓦尔德和我做其他事。保罗·韦恩也来了，因为他将要帮助结核病医院的建设。

1948年9月16日举行了新护士学生（第二班学生）的入学考试。目前为止我们有十三名学生。第一班还剩下九名学生。

我们现在一天二十四小时有电。

9月，医院有一个新名字：卫理会南昌医院暨苏珊·托伊·恩赛因纪念医院和康爱德纪念结核病疗养院。

10月，医院满是流行病病人，伤寒、疟疾和其他奇怪的病。护士长喻夫人前往广州参加一个护士会议（两周时间）。在她离开期间，处理各种事务的责任就落在我身上。

夏末的几个月里有一次货币改革，看起来似乎改革的效果很好。我们都很受鼓舞。但到11月物价开始跃升，我们都知道我们又陷入另一场金融危机。我们提前制作了许多罐装食物，买了糖和面粉。谢天谢地我们这样做了，因为有两个星期时间我们买不到鸡蛋、面粉或大米。那时的理解是货币危机的背后是共产党。到了11月10日，有消息称政府计划将首都迁至南昌或广州。一个大的飞机场已经迁入，所以我们成了一个“航空”中心。外国人以及中国人将直到明年2月从上海离开这个国家的船票和飞机票全部订完。美国领事馆建议我们准备好在11月下旬撤离，每个人允许带一百磅的行李。【共产党开始控制中国不少地方。美国处于冷战中。】好吧，到了11月26日厄内病了，怕冷发烧，接近肺炎。所以我没有走。但是一些友爱会的传教士从农村离开。我计划于12月1日离开。与此同时，我装好送往上海的三个大箱子，计划在那里等待，直到厄内能和我们一起。

司徒大使【美国大使】天气一转好就如期而来，帮忙寻找首都的新地点。那意味着我们可以留下，只要政府首脑还在。

好吧，当12月1日到来，厄内仍病重卧床。我不能离开，留下他一个人。这时已经是肺炎。12月17日是第一天他不发烧。12月19日碧翠丝患上严重肺炎，和厄内一样。我已改变计划等厄内好转后再离开。我们又计划一过圣诞节就离开，过了一晚贝蒂又严重耳朵感染。厄内说：“我想主已回应你的祈祷，想让你留下。”所以我们又拆开装好的行李，写信给会督说我们计划一家人留在中国。

除了这个主对祈祷的回应，另一件事也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离开中国的计划。厄内和齐医生是很亲密的朋友，他们交换许多想法，有些想法是他们只在两人之间交流的。事实上他们成为血盟兄弟【他们交换了一滴血】。一天我们问他关于我们离开中国的事。他给出了一个相当长的回答。他那时大约四十岁。他说，他在中国四十年，有战争或战争的传闻时，他在军队到来之前就逃走。现在他有妻子和六个孩子，还有年迈的双亲，他要跑去哪里？【他和他的家人并不来自南昌地区。】齐医生是一名优秀的基督徒。他那时做出的一番陈述令我们思考良多，并真的增强了我们留下的决心。你们必须明白，中国人一般决不会在回答中如此直接，但齐医生和厄内已如此亲密，他们可以交换想法并且知道他们对彼此是完全真诚的。我并不是想暗示中国人会对你撒谎，只是说他们并不总是给出直接的真相或回答。这是一种文化，需要在中国长时间生活后才能真正明白这种思维方式。现在，回到这故事。齐医生说传教士们可以收拾他们的行李。当有麻烦时，他们可以回国或逃到安全的地方，等待战争或革命或骚动结束。然后他们可以返回，重新开始。可是，他说，对于我，我必须在此时留下，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事。他还答应如果到时候我们的存在令他和中国人感到为难，他会让我们知道。【他确实这样做了。】他进一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打开我们的眼和耳，但闭紧嘴，依赖中国人的判断。喔！那次谈话很打动人心。

## 1949

1949年1月5日起，政治局势动荡（译注：这一段讲的是蒋介石辞职）。但南昌仍颇为平静。据说现政权（国民党）的首脑蒋介石委员长是一个好人，但他的下属们使政治败坏（裙带关系和贪腐）。以我这些年的观察，家庭的纽带如此之强，亲戚们必须被雇佣，即使他们没有能力做这份工作或者是骗子。这看来已伤害中国。在医院的工作中也是这样。

1月，天气足够好，可以为结核病医院的地基浇筑水泥。

特劳森一家1月10日离开。特劳森先生负责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他们坐火车前往上海，那将花三到四天。那时每个旅行的人要自带炭火取暖。

1月，医院收到了来自经合署的二十三箱药品。这批药品种很杂，需要大量时间分类。

2月，工程师们（唐纳德·徐、摩根·曹和保罗·韦恩）来继续推进新结核病医院的建设。三、四个月之前他们曾来此检查。现在他们会停留一段时间。他们和我们一起用餐，睡在这里，在医院洗衣服。韦恩先生几天后回上海。

我完成了为护士学校写本书的工作。恒小姐写中文，我写英文。我从未得到一本印出的书。

3月，我们乘飞机前往上海，花了两小时十五分钟。我们见到了一些我们的老朋友，其中有吴医生一家。我们去见了邓拉普医生，他是一位耳鼻喉专家。他说贝蒂在摘除扁桃体之前必须接受一些治疗。这意味着我需要停留更长时间，然后一个人返回南昌。

我们开心地购物。几乎就像我们是在美国。孩子们因为看到的東西高兴得尖叫。一个晚上我们吃到牛排晚餐。这真是享受，是三年来的第一次。在南昌我们能找到的唯一一种牛肉是水牛肉。那是水牛辛苦劳作一生在耕作中死去时才有的。那肉会很难嚼。

我曾接受牙科治疗，昏迷两次。牙医告诉我不能再使用普鲁卡因。你们可以想象，每当我不得不拔牙，就要吸麻醉气体。所以这些年来我每六个月就去看一次牙医，只用非麻醉的止痛药。感谢上帝，有了高速钻！【过去的牙科钻头速度更低，耗时长得多。】

邓拉普医生告诉我们先回家，之后再过来做贝蒂的扁桃体手术，因为她的情况还不适合摘除。所以回南昌喽。

在上海人越来越多，有五百万人。【有很多难民，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当你去火车站或某些类似的地方，你恨不得用绳子把你们一行人系在一起。好吧，厄内来照看行李，我来照看孩子。我们要如何跟住他？我们买了一些花，有了一个聪明的点子，把它们放在一个篮子中。厄内把篮子扛在肩上。我们的眼睛就一直盯着篮子，就这样上了火车。我们不得不在杭州过夜。那也算是旅行！。我们期望第二天早上到南昌。大约午夜时，我们感觉火车停在一个站。我们用光了煤。所以一个小火车头不得不去南昌取煤。我们十六个小时面面相觑。幸运的是这个车站在一个村庄。我们买米饭、茶和麻花。小贩不停地叫卖。他们围在我们的窗前看洋鬼子吃东西。这到了令我们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在上海买了一些糖，上面有包装纸。我用包装纸做了一些蝴蝶结。女孩们开始把它们卖给中国小贩。这些好奇的小贩最终发觉了这把戏，走开了。当然，这些小贩主要的兴趣是听这两个小孩子讲这么好的中文。

十六个小时过去，我们继续我们的行程，只是又停在一座山前。铁路从南昌带来的煤质量如此之差，我们没办法爬上这座山。所以我们只有再次等待，直到我们获得足够的蒸汽。我们出发了。列车长已经电报通知我们会晚点。但是那条消息没有包括这第二次停车。齐医生、曹先生还有司机已经按我们预计到达的时间赶到南昌火车站。由于战时管制【宵禁】，他们不得不在火车站过夜。我们家中的帮佣整晚都没睡觉。我们在火车上有一个卧铺【普尔曼型】。但我们可能也整晚没睡。列车员早上3点把我们叫起来，5点让我们下火车。当我们回到家，孩子们如此兴奋，不想吃早饭，相反，她们跑去见她们的好朋友岚秀和梅秀。

到了4月10日，汇率疯涨。国民党人手足无措。过一个晚上，物价高于前一天三倍、四倍，有时甚至到八倍。如果你有金条或白银，你没问题，但如果你持有纸币，那太糟糕了。为预备这种情况，我们将教会和医院的工资以金条和银条的形式携带。很重，很难携带。因为我们带着大量的金银条，我们非常着急赶回南昌，把它们放

在不同的地点。还需要更多钱，但现在不是回上海的时候。只要共产党还停留在长江的另一侧，我们就没问题。

到了4月20日，情况还相当平静，厄内决定再去上海，带来更多资金。他离开不到二十四小时，共产党渡过了长江。厄内的行程花了四十个小时，直到抵达上海他才知道这剧变。那一期【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和平谈判失败。他急切地尝试预订机票返回南昌，因为他现在确信南昌将会落入共产党之手，他将没办法回去。到4月25日，上海、南京和九江已陷落。在这个时间点上，我试着前往上海是不明智的，因为铁路已在一些地方中断。与此同时，厄内仍在尝试着取钱并返回南昌。他和韦恩一家在一起。他和保罗返回上海的公寓时，一路上拿着一个打字机箱子，里面装满金条。它很沉。那里没有电梯，所以他们走上楼。上去时，打字机箱子胀开。咣当！咣当！所有的金条落在楼梯上。厄内和保罗费了很大力气，找回大部分金条。没办法知道他们是否找回全部的。厄内继续尝试找到一架飞机，但是没有飞机到南昌。最后他们说他可以先到长沙。所以他买了张票，希望他可以找到办法回南昌。

当然，在南昌的我们一直万分焦急。终于收到一份电报说他上路了。厄内希望并祈祷飞机会在南昌降落，但没得到确认。他认出九江和长江。突然他看到他们在鄱阳湖上空，正在靠近南昌。虽然说不清原因，他知道他要降落了。飞行员以他需要一些燃油为由降落在飞机场。事实上他的油箱足够满，可以飞完全程。厄内没有问什么，下了飞机。在我们到达机场见到他之前，飞机已飞走。见到厄内我真是太高兴了。弗兰克·盖尔大叔和我一起。我确信厄内会抱紧我、吻我。相反他只是将公文包扔到我手里，另一个包扔给弗兰克。那个包几乎把我的胳膊从肩膀拉脱。里面满是金条。我们有许多话要说。从那时起有一段时间没有直达南昌的飞机。

4月21日到4月27日厄内在上海的这几天，我老了十岁。共产党渡过长江，包围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城市陷入毫无法纪的状态。齐小姐离开医院和我住在一起。摩根·曹已是我们的客人。白天他出去但和我们一起吃饭。

一天晚上大约9或10点，有人敲门。那确实令人不安，因为没人夜里那么晚来访。我去开门，发现那是齐医生。这真的有点令我震惊，因为一个已婚的中国男人不会拜访一个已婚的女人，更别说一个外国人，还是在天黑以后。他面色苍白，我可以看见他的上唇有汗珠。那很不寻常。我问他是否病了，他说不是生病，而是他很担心我的生命安全。由于我们正处在毫无法纪的状态，地下团伙，“青帮”，不受控制，对城市一片又一片地劫掠、抢夺、强奸等。他说他知道我们将许多供医院用的钱保存在我们的文件柜中。那个晚上青帮会朝我们这个方向来，肯定会洗劫我们的医院，袭击我们的护士，还会来到我们家。他问他是否应该留下来保护我。他还建议拿出金条，除了少数的，赶快藏起来。他说应该把文件柜敞开，让那些家伙拿走他们想要的。我的任何抵抗都将是徒劳的。我告诉他，他有妻子、六个孩子和双亲要保护，以及医院，还不要忘记护士学生。我最终说服了他。曹先生和齐小姐帮我藏金条——在壁炉和阁楼——任何我们能藏的地方。我烧了一壶水泡茶，然后我们三人在黑暗中坐在客厅里，无尽地等待着。我们停止低声谈话后，是死一般的寂静，但我们都很有警醒。大约凌晨1点，又是一阵敲门声，我想，他们来了。我去开门，发现那是我们一名可靠的雇员从医院来。他说：“韦师母，他们过去了，你可以上床休息了。”我们感恩地祈祷。我们去睡觉。我自己是没睡着的。其他人说他们也没睡着。第二天，我们听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数年之前，战争期间在自由中国【第二次世界大

战】，齐医生曾给一个人做手术。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青帮的头领。当他看见齐医生，他对他的手下说：“这个人救了我的命！不要碰他或其他任何与医院有关的东西。”我们从未找到我们藏的所有金条。

厄内4月29日从上海回来后，我们认为不久之后我们的城市也会被共产党夺取。事实上我们确信他们正在过来。之后突然他们发出一则广播消息告城中父老，说他们很抱歉，他们还要一个月左右时间才能来“解放”我们。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上位于前线，各种机构，像银行、邮局还有省政府都搬走了。还有许多其他人也走了。商店关门，价格快速下跌。一块银元能买一百二十个鸡蛋。类似地，医院的病人数量也下降了。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家，在花园里做园艺。飞机服务和火车服务停止。劫掠猖獗。我们开始夜间巡逻，所有人都要轮班。

之后数天时间，我们在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1949年5月22日，有了动静。我们后来听说这座城市以七千美元被卖给共产党。国民党军队以整齐的队伍离开城市，渡过赣江。然后共产党军队开进城市，我们被“解放”了。只有大约两个晚上有战斗。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睡在地板上。子弹飞过我们的房子。战斗只有那些。工作陷入停顿。

在战斗中，弹药堆被击中。尽管它是在江的另一边，至少有一英里远，它引发了一系列爆炸，照亮了整座南昌城。厄内和摩根去盖尔家，站在地下室门口看。我紧跟在后面。我们轮流用望远镜看这一连串爆炸。摩根在看时，正好发生一次爆炸。我猜望远镜使那场景看起来就像世界末日。他一个蛙跳，进了地下室。他在军队中接受过一些特殊训练，真的能像青蛙那样跳。那真是滑稽。

解放后的第二天，我们对戴上红色帽子【共产党人】的人数感到惊讶。其中一个人真的愚弄了我们。他是一个名叫雷蒙德的小伙，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看上去对教堂活动很积极，善于交朋友。过去他和摩根以及合唱团中的其他一些人很熟。摩根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聚在我们家中聊天。我回想起来，雷蒙德曾经很是令人烦心。你不能总指望他来合唱团。无疑他在印刷和散发宣传品。好吧，当我看到他戴着红色帽子，我真的非常生气。然而，他特意来到我们家，说他会保护我们家。之后，当他被派往北方，不得不把他的妻子留下，他过来告诉我们他如何从几所高中毕业。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在课业之外为共产党做各种工作。他竟然还厚颜地请求我们在他离开后照看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其他类似的人。但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

由于政治局势，我们只好在给家人的信中写上完全无意义的废话。

那年的这个时候，鹭鸟又回来了。我们离江很近，院落中有许多遮阳的树。鹭鸟飞到江中，为它们的幼鸟带回鱼。它们在途中经常会掉落一些。在我们往返于医院和家的途中，我们戴上大的斗笠，因为我们可能会被鱼或白沫击中。与往年一样，这“投弹鸟”又来了。这种鸟会在夏天飞往南方，在我们附近地区只停留一两天，然后继续向南。当投弹鸟到来，就是种水稻的时候了。外国人过去常说这种鸟的叫声是“再投一个”。同样的鸟我们在北京时经常早上四点在我们的窗下为我们唱歌。还有一种鸟是黑鸬，全身黑色除了黄色的喙。除此之外这种鸟有鸬鸟的所有特征，像在地上跳来跳去和用趾站立把虫子拖出地面。

贝蒂现在到了这样的年纪（七岁）：她照看蚕的整个生命循环，收集嫩桑叶作它们的食物，而后又收集草杆让它们在上面吐丝作茧。她还开始搜集蜗牛。她把它们放



在厨房的一个罐中。它们开始爬到厨房的墙上。于是她不再搜集蜗牛，而开始搜集蜜蜂。

碧翠丝也度过一段快乐时光，不过是另一种。她和梅秀【齐医生最小的女儿】整天在一起。碧翠丝在早餐后给她带几片果酱面包。一个早上，我们都在走廊上睡觉，我们听到小声喊：“碧——翠，”那是碧翠丝的中文名。碧翠丝冲她喊，用中文说：“我还在床上，我不想起来。”我们不禁偷笑。

邮件暂时中断。但到了周末，邮件再次到来。到5月31日，事态逐渐回归“正常”。厄内斯特被允许去医学院上课和做其他医疗工作。医院的工作轻了一些，所以我们决定跟齐老师继续我们的中文课程。【齐老师是齐医生的兄弟。】

护士学校已经决定提早结束学期，因为其他常规学校也提早结束学期。贝蒂在中国学校她四十人的班级中排第八。我觉得那很出色，因为每天下午她在我指导下学习美国【家庭学校】课程。学期结束后不久贝蒂关节痛，并且发烧。在一轮青霉素治疗后，她恢复了。我们担心她得了结核，因为她脊柱侧弯。

有许多游行和舞蹈，持续不断。流行的共产党舞蹈是鼓舞，所以每人得有一只鼓和与之相配的一套特殊装束。

由于政治局势，我们不能前去山上度夏。靠着电扇和浴盆我们得以保持舒适。

我们这下了许多雨。事实上，发洪水了。我们的院落中有几层平台。较低的一层已被水淹没。同样医院里也有几处被淹。我们不得不让奶牛离开牛棚，因为它们站在水中。为了保证堤坝不破，五百人一直在堤坝上工作。

因为我们有多一点的时间供自己支配，我们去乡间玩了一天。那里比较凉快。贝蒂发现了一窝青蛙。我们一刻不歇地把它们都抓住，放在盒子里带回城。在回来的路上，一只青蛙从盒子中逃出。在我们察觉之前，我们的车上已满是跳动的青蛙。我们不得不停下抓住它们。我写信给母亲，警告她在贝蒂的手下农场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安全的。

7月1日，在护士学生和其他人中有场骚动，特别是在学生中。这群人中有一名学生显得能力很强，表现得几乎像一名已毕业的学生。在各种活动中，她都是头目。后来我们发现她已毕业于另一所学校，可是在暑假作为一名学生转到我们学校。一天，她来找我，说：“如果你继续让学生值夜班以及提一些其他要求，我就离开。”我已有准备，说：“你的文件明天早上会准备好，你可以离开。”按中国习惯，她没有退路。第二天她离开了。那之后麻烦少了。

另一个带来麻烦的人，名叫丹尼尔，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来自农村，在那他认识了珍妮·林德【卫理会传教士】。在他上学期间，她一直帮助他。他进了一个错误的圈子，不得不躲起来。他来找珍妮，她让他和她待在一起。在政权更迭【解放】之后，我们发现他也戴上了红色帽子。后来他不得不接受手术。当厄内切除他的腺样体时，他全靠厄内。厄内让他承诺他不会向红色政权告发珍妮。他做出承诺。据我们所知他从未告发她，但他做了一些其他事。

上海和我们之间的通讯现在已被切断。邮递员来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邮件只有走香港【离开这个国家】。那意味着我们也只有一条路离开。尽管那样，我们仍可以收发贝蒂的功课。我们每天学一点，因为她发现整天玩也很是无趣。她和她的中国

朋友捉蜻蜓和会飞的甲虫。中国孩子捉住甲虫，用一根线绑着它们的身子，然后让它们飞。那就是他们一天的玩具。

7月4日，城中的所有传教士聚在一起。（译注：美国国庆？也许只是巧合。）墙上的手写标语显示，我们可能将来不能随我们的意愿聚会。我们共有十八人，包括澳大利亚人。

7月9日起，我们无法兑换我们收到的支票。我们请求将它们留在纽约。有越来越多的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撒下宣传单。在医院的工作没有那么紧张，所以我用下午时间做罐装食品。即便和上海的通讯已被切断，仍有一些资金到来。

尽管天气很热，一位小提琴家沈先生来演出。他计划于8月20日举行一场音乐会，请我为他伴奏。我必须非常努力才能配合上他。他表演了八支曲子，从莫扎特到巴赫到德尔德拉到皮埃尔和戈达尔·戈塞克。他的最后一支曲子是俄罗斯的，胡拜的“美丽的凯蒂”（译注：原文的拼写有问题，而且这也不是俄罗斯的）。它非常优美同时也非常难。在他离开后，我们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

友爱会服务队驻在农村的传教士们觉得他们的工作被极大地扰乱了，所以他们搬到我们的一个公寓。类似地，一名刚从金陵神学院毕业的牧师也搬到与我们正相邻的一个公寓。他还没被指派到某个教堂，但很可能是豫章中学教堂。

9月2日左右，我们收到了自从5月解放以来第一封来自爸妈的信。我们太高兴了。它寄出的日期是7月2日。

突然间，医院满是病人，尤其是那些伤寒病人。

人们度过了【解放后的】惊恐阶段，逐渐安定下来。

关于新政权的一些事情真的给人们以很深的印象。“军队”之前一直是一个糟糕的字眼，意味着欺骗和无纪律，特别是在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几个月当中。当共产党军队开进，人们预计也是一样的。新来的军队缺乏物资，需要餐具、柴火等。他们要求借一些东西。人们出于害怕而给他们东西。但当军队离开，他们打扫干净地面、归还餐具并说谢谢。他们从未喝得醉醺醺或是惹出其他事端。人们震惊了。他们第一次看到官员和学生、苦力一起修理堤坝。学生们愿意用双手在泥土中工作，作为一种教育。当然，其中一些是通过此种方式：“你真心想这样做，不是吗”，不然就被送去“西伯利亚”。

大众教育开始了，面向每个人，包括老婆婆。其中有些东西是好的。我有时间，参加了一些班。我教我们的阿妈如何读写一点中文。还有卫生运动、土地改革等。第一次，一个人不能用钱逃脱兵役。之前，一名父亲要做的就是交一大笔钱给军队或是用钱雇一个苦力顶替儿子的位置。你可以想象一支苦力组成的军队。当然，所有这些改变给穷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穷人占大多数，所以没有花多长时间，宣传便广泛传播并产生效果。这是“取悦”阶段。

在政权更迭后的六个月里，几乎所有事情都陷入停滞，直到每个人都已听熟毛语录，能反复背出。在学校尤为如此。豫章中学离我们的房子大约一百码远。一条小巷和环绕我们的院落的墙还有学校的墙将我们和他们隔开。每天早上，学生们准时听一长段关于共产主义教条的讲话。然后学生分组讨论他们听到的讲话。每组中有一个共产党人。到一天结束时，也就是深夜，每个学生对毛主席的教条就有了统一

的认识。还有歌曲也被一遍又一遍地唱。直到今天，我仍能听到那些歌曲回响在我耳旁。其中一首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译注：早期的版本没有“新”字。）因为天气很热，我们的窗户总是开着。整个夏天，我们听学生唱歌，我们听喇叭放演说。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被灌输了。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无法摆脱这些声音。到六个月结束时，所有学生和许多其他人能够以相似的方式思考。所有从他们口中说出的话都是相同的，否则。

教堂开始受到不利影响，因为群众集会是在周日上午举行。如果你去教堂，之后你就会被盘问。我们自己在这个阶段没有受到侵扰。

正在建设中的结核病医院此时遇到麻烦。新址被发现以前是被填起的湖。为了获得坚实的地基，必须通过架子填入土壤。这花费了比预期长得多的时间。

现在是学校开学的时间。我们正进入共产主义政权的第二阶段，或者称为“不行，不行”阶段。新课文被安排进课堂。一天，我让贝蒂把她的书从学校带回家。第一课说：“毛主席是我们的救星。他是我们国家的救星，”等等。我们最终找了个借口让她离开中国学校。事实上，现在她的美国功课更难，需要更多时间。

美元已不再能被兑换。

所有的枪支都要登记。

10月，韦恩先生和徐先生从上海来察看结核病医院的进度。

11月，我开始在护士学校教手术室技术（学校在政权更迭时关闭了一段时间）。

11月，由于洪水的破坏，医院部分地方正修复和重新粉刷。现在有一百名住院病人。

当我在教贝蒂时，如果她的功课真的很好，我会给她一颗星。碧翠丝还不到四岁【1949年底】，时不时她会坚持在我们上课时进房间。一天她想要一张纸和一支笔，我给了她。当然她只会胡乱地涂画，然后她交给我，坚持要一颗星。她很确定她那张纸和贝蒂的一样好。

尽管有各种困难，我们得以在当地剧场表演亨德尔的《弥赛亚》。自从路易斯·王从美国回来，她帮忙演奏钢琴。我们轮流在合唱团中演唱。格特鲁德·孔和往常一样完成了极为精彩的导演工作。这是她最后一次导演《弥赛亚》。她不会知道她将面临什么。

## 1950

在一个忙碌的圣诞节之后，我们又有很好的新年活动安排。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医院的草坪上吃晚餐，接着我们全体合影。然后我们有一系列节目，护士学校的每个班级都参加了。有适合时代的舞蹈、戏剧。苦力们表演了一场乡村戏剧，非常滑稽。有些职员表演了某种戏剧演唱，我还听不懂。有人为厄内斯特和我翻译。欢乐合唱团（教堂合唱团）表演了一些世俗歌曲。

进入1月，俄罗斯戏剧、音乐等逐渐增多。葆灵中学（女子学校）的女孩要表演俄罗斯戏剧，需要一些家具，西式家具。她们来借我们的，我们没觉得借给她们有什么坏处。

一名甲状腺病人被医院接收时体重70磅。她接受了手术。她出院时体重150磅。这个病例被刊登在当地报纸上。

1950年1月22日，消息公布，所有外交官和领事官员会在3月离开。

2月7日，我们接到政府命令，登记医院所有物品。

新政府要求简化社会活动。

2月，牯岭外国人学校的孩子们全部放假，途经这里回家。其中一个小姑娘，十岁，被带到我们医院做阑尾手术。

厄内斯特为一些不寻常的外科病例做了手术。一个被认为是最近死去的胎儿变成了石头。他还从一名十二岁的孩子的支气管中取出了一粒玉米。

这时许多传教士离开。基督教青年会的约根森一家认为是时候离开了。他们的小儿子和碧翠丝同龄。他们两人在一起时，比一群猴子惹出的麻烦还多。一天，当工人们在牛棚里浇水泥，我们正在我们家中举行周日下午礼拜活动。这两个孩子觉得他们可以在水泥上留下他们的印子。他们痛快地玩耍，把水泥弄到他们的头发上和衣服上。在我们聚会时，他们进门，经过大厅，进到客厅。我不得不把他们扔进浴缸。

这年早些时候，韦恩先生和徐先生再次从上海来检查结核病医院的建设。他们觉得现在是时候让工程师摩根·曹长驻工地。那之后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少了。他做礼拜和周末过来。

摩根对研习经文颇有兴趣。所以我开始和他一起研习。我们对他的背景和他尝试走出的各种挫折知道的极少。他心爱的人在他到南昌后不久就去世了。现在他又有了另一问题，但他没有透露。他很认真地研习经文，提出非常深入的问题。他定期上教堂，参加青年小组和其他教堂活动。他是一个很好的男高音，不时在教堂表演独唱。我们不清楚他在何种压力下工作。

3月21日，一场“卫生”运动开始了。公共卫生部门发放天花和鼠疫疫苗。所有医院被要求派出小队走遍城市每家每户注射疫苗。公告称拒绝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4月，在申请并得到旅行许可后，我们前往上海。厄内斯特有一颗牙肿了，而且那里有给医院的物资要取。与此同时，一个在医院工作的人的孩子患了白喉。碧翠丝经常和那个孩子玩。所以碧翠丝和贝蒂两人都被给予抗毒素。贝蒂没问题，但碧翠丝有很强的反应，突然出荨麻疹，发高烧。那使我们赴上海的行程推迟至4月20日。

我们刚上火车，碧翠丝就病了。看起来她似乎得了脑膜炎。没有任何我们能做的。她躺在那儿，像一只倾覆的小船。这持续了数小时。但是突然她抬头说：“妈妈，我想喝一点水”。这几个字是对我们祈祷的回应。

因为结核病医院的建设工作某种程度上陷入停滞，工程师也和我们一起赴上海。厄内斯特拔了牙，贝蒂摘除了扁桃体。我把最后一颗智齿拔了。

作为一项享受，我们去看了《乱世佳人》。

当我们乘火车回南昌，只花了二十四个小时。

我们的音乐团越来越强。每一个会表演的学生也是如此。我们共有大约三十人。我们会把餐厅和客厅之间的滑动门打开，把沙发放在走廊上。在练习后我们会吃些甜点，把沙发移回客厅，清洗盘子。

5月10日是我的生日。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南昌过生日。生日那天我得了重感冒，再加上我们还有外国病人在医院。（因为大部分传教士和其他人很难前往上海就医，他们只有来到我们医院。那意味着我们总是要从我们家中送餐。）但是，我的生日还是得庆祝。早上6点之前，孩子们唱生日快乐歌叫醒我，带给我一些苹果，这在中国是某种奢侈品。庆祝的高潮是一些炭烤牛排，真的很特别。

我们的邻居，熊牧师夫妇，生了个女孩，他们给她取名“希尔达”【英文名】。

5月22日是阑尾日！化验室技师（小李），我们的阿妈和邓述堃的儿子都做了阑尾手术。

6月6日医院不得不为一个患白喉的孩子做气管切开。他的支气管中有一粒豆。他活下来了！

6月，我开始在医院指挥一个合唱团。我不具备那能力，但有时候你得做你必须做的事。

6月，政府要求所有医院去注射霍乱和伤寒疫苗。整座城市要在一周内完成。工作人员发现他们能一小时注射200次。

摩根令人意外地于1950年6月24日来看我们。他已结束了他在福建的工作，正在赴北京的途中。他说他将前往北京做八个月的进修。他其实是在掩饰。事实是他是去接受再教育。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更多关于摩根和悬在他头上的大问题。我们猜测当他去福建时他遇到了问题，但不确定。他在离开之前告诉了我们他的故事，因为我们很确定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摩根协助美军【在自由中国】，目睹了许多战斗。他的姐姐（译注：也可能是妹妹），一名医生，协助共产党。他的兄弟们也是共产党。但是当摩根协助美军时，他和一些自由中国的传教士在一起。问题就出在这。他曾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传教士他不喜爱和尊敬。但是，他在上海时，在他的兄弟和姐姐对他施加的各种压力下，他无法继续拒绝，特别是当他被派往北京。他是一个悲伤的人。还有许多像这样的故事。他如此想留在基督教群体中，但是家庭胜出了。他继续给我们写信，直到我们离开中国。当他听说我们即将离开，他请求允许他来为我们送行。但他们说：“不行。”他刚离开南昌，朝鲜战争就爆发了【7月3日】。

我们将新实习医生请到家来吃晚餐。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私人家中吃美国食物。对于用刀叉等吃东西，他们感到有点尴尬。我们就安慰他们，说我们第一次用筷子吃东西是在日本，那里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

从7月起，“提成”，以前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再被允许。以前百分之十的回扣是合理的，但是现在，完全没有。

这是几年中最热的夏天。有一阵疖子的流行。由于天气炎热，厄内斯特早上5点开始手术。

8月8日，厄内斯特做了一个兔唇手术，成功了。

8月14日，盖尔医生和盖尔牧师离开返回美国。【盖尔医生，女，在康爱德医院工作。】盖尔医生已经病了一段时间。露丝·丹尼尔斯小姐也离开了。

这一年中我们第一次吃新鲜的西瓜。它们从其他省份运来。它们很好吃，价格也合理。

碧翠丝和【齐】岚秀9月4日开始上幼儿园。我们想既然她们的老师是牧师的妻子，不会有问题。我们错得多离谱。

每年9月26日左右，有个关于月亮的节日。你可以买到各种“月”饼。有些比其他的好。根据传统，节日这天上所有的喜鹊（一种鸟）会在天上组成一座桥，让两位恋人得以相见。黎明之前恋人必须回到各自的地方，让鸟儿们可以回到地上。

9月11日，学校假期结束。护士学校开学。我和贝蒂的下午课程也开始了。终于我们的护士学校有了一位校长，春小姐。我们现在有四十四名学生，极为需要一位校长。我们的护士长，喻夫人，处理不了所有的工作。由于政治原因，我不方便在护士学校做太多工作。

10月1日是一个大日子，因为它是周年纪念，解放一周年。因为那是周日，我们没有别的替代方法，只有把我们的教堂礼拜改在下午。有一阵又一阵的游行队伍，里面有旗帜、灯笼、鼓、俄罗斯的音乐和舞蹈。出了一种新邮票，大张印有毛的头像。大部分的颜色是红色。大约九天后，世界和平青年代表团抵达这座城市。他们受到盛大的欢迎。学生们厚颜地来到我们家，问他们是否可以摘我们的花，送花束给访问者。我必须承认我内心极为愤怒。我说：“好吧，你们不能忘记这些花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种子而来。它们由美国资本家种下，由美国资本家养育。如果你们想要花，你们可以拿。”他们面露尴尬的神情，但他们还是拿了花。

10月25日，我们庆祝厄内的生日，他在中国的最后一个生日。我们原希望给他一个惊喜，但贝蒂说到此事。然后珍妮·林德过来问那天晚上要做什么。我为他的生日做了几件衬衫。

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变得非常受欢迎，举办了许多会议。他们已经被【共产党】很好地渗透。我在日记中记录，11月24日，卫理会、中国内地会和弟兄会的全部传教士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工业委员会秘书一起吃午餐。他和我们谈话，而我在日记中的评论是“已被洗脑”。越来越多的老师遭到起哄，传教人士被质问。梅茨小姐离开，林德小姐申请通行证，我们再次请求主的指引。

我们的房子变成了动物园。我们在我们的走廊上为化验室养豚鼠。它们繁殖得这么快！一天晚上一只新生豚鼠从笼子里掉了出来。你从未听过那样的吵闹声。它迫使我们起床。我们把娇小的家伙放回笼子，那里安静下来，直到天亮。使事情更糟糕的是我们有一只小狗。它会逗弄豚鼠，令它们惊恐地站起来。终于它们不再尖叫。小狗还卷入其他淘气事中。一天它碰到了对手。院子里的两只狗把它逼到角落。一只从一边拍打它，另一只则从另外一边拍打。小狗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救了它，它永远是我的朋友了。

贝蒂仍在学校中，在她四十七人的班级中排第三。她的成绩卡上写着几条评语：“太容易丢东西，不爱惜书籍，但是她很善良、礼貌、聪明、用功。”。在她班上，学生之间的批评已经开始。

事情开始收紧。医院里的所有东西都必须向政府登记，包括我们家中的。中国新年是一个真正重大的节庆，但是这一年简化了很多。其他节庆也大为简化。那是我们传教士一直期盼的，因为人们会因为众多庆祝活动而负债。

碧翠丝长得很快，唱得很好。她会开始时唱：“赞美主，赞美主”，结束时唱“三只老虎”【中国歌谣】。她会说的英语多了一些，但说起来就像中国人说英语，因为她先学的说中文。

贝蒂用中文教她的中国小朋友怎么编织。我都不知道用英语该怎么教。碧翠丝过来对我说：“妈妈看狗，她做了这个”（译注：此处是儿童语言，译文只是勉强猜测），然后把她的脚放进编织的袋子。

新警察部门的人员定期来检查康爱德医院和南昌医院、教会学校等。

其中一个警察是一个能唱出美妙歌曲的年轻人。摩根和他提过，我有一些独唱【乐谱】，可以为他演奏。所以一个周日下午他来了。我们先从一些世俗音乐开始，后来他唱起《万福玛丽亚》。他真的很动情地唱。然后他突然意识到，他做了一件共产党人不应该做的事。没有多说一个字，他突然离开，说：“我不能再来这里。”后来我们发现他毕业于一所天主教大学。不论他是多么优秀的共产党人，他决不能完全抹除过去。

尽管有所有这些巨变，青年小组、同时也是合唱团，一天晚上来到我们家。谈了一会儿之后，他们问我们是否愿意做他们的赞助人。我怀疑这是否明智，但是我们很高兴他们愿意请我们。我们一起祈祷、唱歌，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

大约那时候，我招了一些新的音乐学生，那意味着我会尽我所知教他们。其中一人名叫卢克，另一人是熊牧师。他们两人都很优秀。

碧翠丝处在耍恶作剧的阶段。我们正在楼上的卧室。出于某种原因，她认为我在小房间中。她快速关上门，等着里面发出声音。当什么都没发生，她从钥匙孔往里看。好吧，厄内和我再也忍不住，笑了出来。她脸上的表情很是特别。

我想谈一个人，王牧师。他是珍珠港事件那天陪着我们的人之一，当时他吟诵了第46诗篇。当我们1946年回到中国，他仍然很硬朗，尽管他有八十多岁，或者接近了。他是富有感染力的布道者，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是医院的牧师。当共产党人来时，他毫无畏惧地和他们交谈。我们知道我们医院有共产党病人。所以我们说话做事非常小心，不知道谁是告密人，谁不是。一天我听说王牧师走向一个我们都知道是共产党的病人。王牧师径直走到他的床边，说想和他谈谈。病人有点抗拒，但王牧师就这样坐下开始谈话，说：“这是我们的医院，你是我们的客人，而我会告诉你关于基督的一切。我说完之后，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想法。”好吧，王牧师说完后，这个病人无话可说。最终，当王牧师感到他已过完他的一生，他想回到他的老家，死在那里。那对中国人非常重要。

因为护士长要参加再教育班，我很忙。有时斗争和批评是如此激烈，她回来就病了。我肯定那一时期很多人患上了胃溃疡。共产党开始向人们施压，增加了晚上的学习时间，直到他们按照共产党的思维方式思考。

老鼠！出于绝望，我们借来了盖尔家的猫。老鼠钻进我们的肥皂里，肆意啃咬。它们钻进我们保存食物的厨柜，钻进我们的抽屉柜。终于使我们无法忍受的是，它们

钻进贝蒂的作业，吃掉她画的作为每月家庭作业封面的一幅小鸡图。盖尔家的猫的名字是“修补匠”。它大显威风，杀死所有老鼠。

与此同时，共产党向厄内示好，以让他留在中国。他们知道他言出必行，又是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他们想让我们搬出教会的院落，由政府付给我们工资。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那样做。首先，那会是叛国。其次，我们将不得不时时刻刻听他们差遣。厄内必须很圆滑地应对。当我们两人申请通行证，对于他们是一记大耳光。他们不高兴地收下申请。但当他们需要帮助，厄内仍会去医院。

友爱会服务队11月撤离，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工作已无法在农村继续。我们的工作仍在很好地进行。

人们现在一批紧接一批地离开，包括中国人。

九江的卫理会传教士收拾行李离开，必须经过南昌。所以12月28日，帕金斯夫妇、皮特曼小姐、伍德拉夫小姐、迪内塔·普洛格和贝茜·普洛格成为我们的客人。

厄内斯特将越来越多的工作转给他有能力的助手。他在旁待命应对困难问题。

12月12日，我们开始为医院的物资做全面清点。

厄内斯特和我两人现在试着减少下个学期我们的排课，这样我们可以准备好离开休假。

12月30日，我们在上海的银行的个人账户被冻结。

一种针对结核病的疫苗出现了！

现在共产主义的第三阶段将要开始。我们已经经过取悦阶段、“不行，不行”的阶段，现在我们将开始见到人头落地。接下来的六个月是一场噩梦。我所能想到的就是，一张大网布在海底，所有的鱼觉得它们是自由的。一点一点地，网绳被收紧，然后突然这网被收拢，无路可逃。

我们经常听人们说他们可以表面上顺着共产党，内心里他们仍按旧方式思考——说这些话的是基督徒。我们警告他们有时嘴会说出他们心中所想，于是就会有麻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送了大量食物到中国，成箱的罐装食物被送到南昌。有些食物中国人就是不愿意吃，像罐装奶酪、鸡蛋粉、腌黄瓜、腌牛肉杂碎、豌豆汤料和布丁料。全部都是很大的10号罐罐装的。一些这类食物被卖给传教士，只收过手费。我们很买了一些，放在我们阁楼，以备急用。现在是时候用它们了，因为我们的钱已被冻结。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之后，我们再也不想吃巧克力或奶油硬糖布丁或杂碎、或鸡蛋粉或罐装奶酪。但它们使我们坚持到离开中国，我们离开时剩下的给了格特鲁德·孔。它们让她活下来。

政府批准护士学校重开时，指示开展“再教育”课。中心思想是让每个人对任何其他人反感，制造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裂痕，让人们批评部门领导或医院院长，让人们批评美国，等等。我们去了一些这样的会议，见到事情是怎么进行的。我们还发现每次会议都被书面记录，这样你可能说出的任何他们不喜欢的话都能在之后被用来针对你。这种情形下，我们只能坐着听，闭上我们的嘴，不论他们说什么。我们内心是多么愤怒！人们被挑动至这样的程度，丈夫不信任妻子，父母不信任孩



子，等等。一段时间后，大组被分为更小的组，每组八人。每次接下来小组中的任何成员可以批评任何其他成员，而他们最好有一个好的答复。每个人都几乎害怕得不敢开口，担心自己会受到批评。每件事都被怀疑。一个人如何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在几次这样的组会上，我坐在护士中，我很难听下去。我不敢想象那对她们是多么艰难。

到这时，我们也被审问。有人秘密地提供了由我们的供述形成的第一份文件的复制。我们记住内容，之后每次被审问时，我们都能给出相同的回答。如果他们发现一丁点差异，他们就会质问为什么。一次他们让我独自一人，问我对政府有什么看法。那是一个新问题，复制的文件里没有。我只是说不管怎样，这是一个新政府，人们必须给新政府一点时间，看它能做什么。只要人们有工作，有好地方住，有好东西吃，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必须记住那段陈述，并在之后多次重复它。

到这时，我们知道我们每人都被安排了两个共产党人。他们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从那时起，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和任何人说话，总有人盯着。我们警告我们的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那很难，因为贝蒂和碧翠丝都是很和善的孩子，并且她们的中文很棒。【根据1995年的采访，希尔达和厄内斯特那时一直关着窗帘，这样没人能看到屋子里。他们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

到这时，人们公开表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不明智的。平安夜我们被建议不要去教堂而是留在家中。如果某个人走进教堂，我们也不交谈，只是看和听。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在教堂的礼拜仪式结束后，表演耶稣马槽降生情景的演员走进我们的房子。他们一言不发地搭起马槽降生场景，接着一面表演，一面念出圣诞故事。然后没说一个字，他们默默地走出去，他们的脸上流下泪水。我们的眼中也满含泪水。因为我们知道从现在起我们再也不能和青年小组见面，不能被看到和他们讲话。我们确信这是我们和他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看来是有可能的。12月30日，我们在银行的个人资金被冻结了。

## 1951：忠守至最后

我们受邀留在中国，但我们考虑是否需要休假一段时间，以接触更为现代的医学、再次看望我们的家人和接受更多的教育。厄内斯特对整形外科和胸外科感兴趣。他希望我进一步学习护理、麻醉或化验室工作。我们两人都承诺在一年的休假后回到中国，如果中国现政府给出某种邀请而美国政府也同意我们这样做。

到这时，厄内斯特成功的外科手术令他名扬方圆数百英里。甚至共产党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会把他们的病人交给他。一次，他们给他一个他知道会带来麻烦的病人。他有能力处理这个病例，但当某些上级一定要告诉他要如何治疗这个病人、要给什么药以及要用什么样的外科技术，厄内斯特发火了。他说：“这是我们的医院，你是我们的病人，这里的年轻医生是我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他们会听我的命令并且只听我的。如果你不喜欢，就去其他医院。”厄内团队中的医生吓得发抖，因为他们都觉得会被带走坐牢。但是，因为厄内挺身面对那些上级，他们最后说：“好吧。”这一小段麻烦过去了。

还有一次，他们让厄内签一份文件，承诺他要做手术的病人会活下来并且不出现问题。厄内又一次发火，说：“一个医生是傻子才会签这样的东西。手术总会有风险。”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他们考验厄内。那时候厄内回到家躺下休息常常会感到胸痛。1月中旬，厄内又有些胃痛。当我回头看，胃痛很可能是他的心脏已开始出现问题。

一天，格特鲁德·孔问我知不知道碧翠丝在中国人的幼儿园做什么。我说：“不知道。”因为碧翠丝很会唱歌，而且比大多数同龄的中国孩子高一点，她成了她们班的领唱。当他们游行示威时，她带领班级唱歌跳舞，表演各种反美歌曲。其中一些非常令人作呕。有一首叫“美国大恶狼”。她兴致勃勃地唱着这些歌。一天，老师带她的幼儿园学生去动物园，让他们看猴子。告诉他们的事中有一条是我们是猴子的后代。一位牧师说：“好吧，如果我们是猴子的后代那又怎样。仅凭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变成猴子那样。”一天碧翠丝从学校回到家，向着外面清澈的蓝天说：“那里没有上帝。”我们询问她，发现这是她在学校学的。我们如何能容忍这样的事？她的老师是牧师的妻子。牧师知道这件事吗？他相信这一点吗？她是一个共产党人吗？他们住在邻屋。为了保住工作，她只得教他们让她教的。家庭中总要有一个人挣钱，因为牧师很快就会失去收入。那时我们明白我们在家里碧翠丝面前说话时必须极为小心，而且必须让碧翠丝离开学校。我们能找什么借口呢？因为小孩子的心灵是很容易被塑造的，我们知道这危险性。

1951年的开始，我不得不和共产党人一起彻底清点医院阁楼和储物室。这花了好几天。幸运的是一切都很清楚。医院的账目同样很清楚。

1月6日，珍妮·林德和更多的中国内地会人员离开。1月10日，我们申请离开这个国家的通行证。我们的五年已满【这是卫理会传教士通常的服务期限】，并且传教会理事会已经提醒我们是时候休假了。没过多久我们已申请通行证的消息就传遍了每个人。访客开始到来。我尽快结束了我在医院的教学工作。同样地，厄内也停止了他在医院的工作，除非他被叫去会诊。我们通过珍妮和其他人把消息带到美国，这样理事会就能通知我们的父母。

1月12日，天气如此之冷，水管全都结冻了。

护士学校的第一班学生毕业了。

1月25日是令人痛心的一天。那个男孩，我们送他上学，付钱让他在医院吃饭，晚上让他和我们的帮佣一起住，向共产党说了一些关于我们的谎话。士兵们把他带到我们家，指控我们，想知道真相。我们叫来王牧师为我们作证。王牧师听完一切后，告诉士兵们我们是如何从街头带回这孩子、让他接受教育、供他吃、供他住、晚上让他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在我的帮助下学习。士兵们对此极为愤怒，以至于威胁要当场杀死这男孩，拔出了枪。我们求他们饶他一命，不过他们把他带走了。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做孩子们的工作，让他们背叛父母。他因为害怕而背叛我们。

2月8日，我一整天在医院做志愿者。我们缝抽单、枕套等。我们听说他们将送来七十九名士兵。其中大多是结核病患者。我们将他们全部在床上安顿好时，已经是晚上9点。

2月16日，我被叫到警察总部，被告知我已获得离开中国的通行证，可以随时走，但厄内没有被放行。我们真是失望，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意图继续对厄内施压。如果我走了，我们认为毫无疑问他将永远无法离开。我们的中国朋友也有同感，建议我

留下。这是艰难的抉择。我敢肯定他们觉得我疯了。我能为不走找什么理由呢？我写厄内已经不太舒服，需要回国。我又写我不适应航行——在海上的头几天确实如此，而贝蒂也不适应航行。她以前往往会病得厉害。我要如何在我自己晕船情况下带着一个生病的孩子旅行，并且我还有一个孩子要照看？我当然需要厄内帮忙。好在警察接受了我的理由，说我可以留下，直到厄内的通行证获批。所有人都认为我做出了好的决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会允许厄内在后面离开。

外国传教士是时候回国了，如果他们要走的话。中国内地会在2月22日撤出了他们的全部人员，而弟兄会则是在2月23日离开。

3月5日，我们不得不登记我们的个人事物，包括我们的账户。此时厄内斯特只会因为特殊病例被叫去医院。信件仍能通畅地寄往美国。我现在在家做饭，也做中式食物。我们利用空余时间向我们的老师学习中文。

格特鲁德·孔一直非常受年轻人喜欢。她在他们当中不知疲倦地工作，如同在任何人群中。她也是卫理会的司库。现在，任何担任司库的人都被共产党怀疑收买中国人的好感。格特鲁德并不害怕。但她以她的善意借了钱给一些人，并帮一些去了美国后回来的中国人在美国的账户中保管了一些资金。这些资金被“掩盖”了——有些是葆灵中学的，有些是个人的。当被警察逼问时，有的人透露了这些被掩盖的资金。当警察“挖出”这些钱，他们在不正确的账户中找到不正确的数字。当人的性命堪忧，有时会失去理智。共产党建议对格特鲁德进行“人民公审”。她无法相信。我们的中国朋友知道他们将不得不指证她。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用一些荒唐的说辞蒙混过去，让她被驱逐出境。

与些同时，警察几乎每天审问格特鲁德。看起来将会有一场公审。共产党将迫使她的所有朋友指证她。她的朋友们不知道能说什么，他们并没有可以指控她的。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说些什么。他们很希望能令她被驱逐出境，但他们没有把握。

3月20日早上，他们来抓她，把她带到位于豫章中学操场的审判场地。中间搭起一个平台，犯人会在那里根据人群的意愿站着或是跪着。然后控告词被宣读。人们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指证被控告的人。在所有这种大会上，有一两个人带头对控词说“对！”，然后所有其他在场的人也不得不说“对！”。如果他们不说，他们之后就会被质问。在人群中到处是监视着其他人的告密人。在一场审判开始之前，每个人就知道或差不多知道审判的结果会是怎样。经过将近一天的这种审讯后，最终的要求会是处决、驱逐或监禁。经常我们会听到一声枪响，这就是结果。在格特鲁德的案子中，指控她的人试图对事情轻描淡写，指责他们在他们到访她家时不礼貌。他们说她坚持让他们脱掉套鞋才能进屋。好吧，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要求的。在花了一整天指责这类小事之后，他们最终决定将她严格软禁在家，未经允许没人可以看望。任何胆敢去看望她的人会被认为是反政府，会失去工作等。格特鲁德不得不几乎一天跪在那个平台上，听着那套话语。之后她被带去她的家。厄内和我，作为医务人员，要求和她一起走，陪着她。他们的确同意我们见她。她极为难受，吐了血，胃里一丁点食物也留不住。厄内给她一片安眠药，希望能让她休息，还有其他一些药帮助她被呕吐折磨的胃。

在这些审判中，会有各处的人们来参加。在格特鲁德的案子中，被要求出席的有豫章中学的全部学生，还有老师、工人以及其他一些她曾经一起工作的人，再加上那

些被共产党选来指控她的人。我们知道那里有许多人在为她祈祷。审判前一天的晚上，圣经妇女【无神职的女传教者】和牧师为她组织了一场夜祷。

这只是这类审判的开始。一天又一天，我们听到暴民一阵一阵的呼喊，他们正在审判地主和其他他们能找到任何罪名的人。然后我们听到枪声。之后是寂静。在这些审判中的一场，一个儿子背叛他的父亲。他把情况报告给当局，于是有了一场审判。按照事先的决定，父亲被射杀。任何家庭成员，如果去收尸埋葬，也可能被审判。这个儿子，当他见到发生的一切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已沦丧至何种地步。第二天，他带走了父亲的遗体。这种事情几乎每天发生。这就是清洗。

大约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必须申请一张身份证。必须按要求出示它。没有它你找不到工作。没有它你买不到某些特定的东西。没有它你去不了某些特定的地方。如果有人被抓到在你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雇佣你，他会被作为国家的敌人带到警察那里。当然，警察可以拒绝发给身份证，如果他们选择这么做，特别是对于那些和国民党或特定美国人等有关的人。还有那些共产党认为没有生产力的人。任何用双手劳作或是在工厂上班的人被认为是非常有生产力的。画家或音乐家或类似职业的人被认为是没有生产力的。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人被认为是敌人。土地改革开始了。他们找到某种方法褫夺地主的土地。土地被分给民众。你能想象一块土地被分给一个城市孩子，他对种田一窍不通？你能看见一个乞丐被分给一块土地，他不知道该拿它做什么？所以这些承诺的实现使穷人更穷，而富人也更穷。当许多人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时，已经太晚了。他们无法回到他们原来的道路。他们担忧自己的性命。

那些早先以为通过向共产党告发会获得新政府中的高位或是受到赏识的人失望了。任何会告发国民党人的人不会在新政府中被信任。他们有点迷失在人群中。这太晚了。

因为我们是仅剩下的美国人，共产党允许孔小姐过来和我们一起进餐。我们传出消息，这样人们能来看她。

厄内感觉不太好。他胃痛。孔小姐的健康状况在恶化。我们劝说政府让她搬到我们的房子，这样我们能照顾她，最终被批准了。她不得不住在楼上，仅仅被允许下楼和我们一起进餐。放弃自己的隐私对她很难，但【软禁的】孤独令她无法忍受。我们设法让人们来看我们，然后他们能从后面的楼梯上去探望她，而我们则在望风。

复活节是个平静的日子，但我们仍设法让其他仍在城中的西方人过来吃了一餐饭。福尔克纳先生和梅尔索普先生来自中国内地会，普克内尔先生来自弟兄会【三人都是英国人】。孔小姐也在。还有一些没能前往上海的来自牯岭寄宿学校的英国孩子。他们在我们这里过夜。我们为他们举办了一场小型聚会，做了一些冰淇淋。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这是他们几年来第一次吃冰淇淋。他们的口音让我们的孩子觉得很奇怪。第二天他们便继续行程经香港离开中国。【英国人并不像美国人那样和共产党处在“战争”状态。他们从未和共产党完全断绝外交关系。】

等待厄内的通行证获批的时间似乎没有尽头。气氛越来越紧张。4月15日，福尔克纳先生、梅尔索普先生和普克内尔先生离开了。那就只剩下格特鲁德和我们家了。我们试着用清理房间、收拾行李等来打发时间。我甚至买了一把两根弦的琴，叫做二胡，上了两次课。我还计划买另一种听起来像管风琴的吹奏乐器。

我们现在尝试为格特鲁德申请一张通行证，让她和我们同行，帮助照看孩子。共产党不会听。他们最后说如果我们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厄内斯特可以走，但格特鲁德必须留下。我们尽我们所能地坚持。最终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坚持下去，一个人也走不了。消息传开了，在教堂举行了一场小告别会。无论我们是不是政府的敌人，他们不能不让我们举行告别会。气氛很悲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人。

在我们可以离开之前，我们必须送出或是卖掉我们的物品，还要有某人为我们担保。所谓担保是说，那个人要签一份文件，里面写着如果我们有任何未偿的债务或是任何会让我们被指控的事情，那个人要用他的生命为我们的“罪”的负责。谁会签那样的文件？好吧，一位老人签了这文件。我们发现那是齐医生的父亲。他说他已经度过了他的一生，并不害怕死亡。于是我们能买票了。事情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那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5月6日，在我们离开两天前，警察涌进我们的房子，搜查所有东西。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最后他们看来满意，离开了。我们又觉得一切顺利。那天大约午夜，警察来到我们门口，把厄内从床上叫起，带到警察局。他们把他置于强光下，指控他是一名间谍。他们拿走了火车票。他们希望他写一份自白，说他是一名间谍，一直通过他们在我们阁楼上发现的一个电台向外发送消息。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在哪儿发现了那个电台。很多家庭曾住在那座房子里。他告诉他们，他不能签一份本身是谎言的文件——毕竟他们要他说出真相。他们带他回家，但我们无法入睡。他们再次过来，将他置于强光下，坚持让他按自己的意思写一份自白。所以他写，如果他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做了什么错事——以及许多其他无意义的话——他表示歉意。只有真正熟悉英语的人才会读出厄内不是间谍，那是捏造的指控。最后他们允许他离开。他精疲力尽。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从警察那里取回了我们的票。但当他们把票给我们时，他们说“走！”。所以我们结束了把东西送出去、更多的卖掉、向人们告别的一天。

5月8日早上5点，我们启程离开我们深爱的南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原以为只有少数人会为我们送行。很多人来了。我们的孩子被弄糊涂了，但对于去看美国的爷爷奶奶感到很兴奋。或许最难的事情是和齐家人告别，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朋友、顾问、我们的家庭医生、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担保人。其次是我们的帮佣。我们亲爱的阿妈一直照看我们的孩子，特别是碧翠丝，从她还是个婴儿就照看她。其他帮佣也跟着我们很长时间，我们就像一家人。碧翠丝看见我们的阿妈哭了，抱住她说：“当我的头发变黑，我长大了，挣了钱，我会回来接你。”当我们向格特鲁德告别，我们知道我们将再也见不到她。她病了，而且只要共产党在，他们就不会让她走。多难说再见啊！最终，火车离站了。我们被人看守。我们是如此悲伤以至于麻木，甚至没有意识到有看守。

那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途，花了一整天一整晚，还有第二天的部分时间，我们到了广州。在吃了一些包装好的三明治后，我难受得要死，似乎是因为腐败之毒。我几乎无法抬起头。幸好家中的其他人没有生病。我们每人有一个座位，但没有地方躺下。第二天，5月9日，埃利亚斯先生看到了我的窘况，说他有一个铺位，可以让我用。我真是太感激了。这段旅途我什么也记不清，我猜是厄内照看着孩子。大约下午5或6点我们到达广州。我们已经听过各种在看守下撤离的人们的故事，他们有时会在广州被带下火车，投进监狱或送回他们原来的车站。我们非常不安！当我们下火车，听到一个声音喊“你好，韦斯医生！”，我们放宽了心。那是曾任中国旅行社

上海分社社长的梁先生！旅行和运送物品时，厄内和他打过不止一次交道。我们惊讶地看到他穿着共产党的制服。无疑，他对自己的位子非常有信心，因为他愿意叫出我们的名字，把我们带到新亚酒店。他还带走我们的钱，告诉我们到香港取兑换的美元，并帮林德小姐也取一些，她之前离开时带了太多钱。尽管天气炎热等等，我们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5月10日（我的生日），我们早上5点起床。这天有望是我们的自由日。我们回到火车上。每一英里都使我们离自由更近，而离我们亲爱的中国朋友和同事更远。最终，我们停下，到了中国的边境。铁丝网！我们还在中国一侧，必须通过检查。如果他们发现他们不允许的东西，我们仍可能被监禁或送回。当我们的行李被封口、盖章，我们真的长舒了一口气，并继续前进。

铁丝网的另一边，我们的朋友们正等着我们，他们从南昌离开，但还没有取得离开香港的船票——麦考伊一家、福尔克纳一家、普克内尔一家、艾略特一家、瑟尔一家、多佛小姐和梅尔索普先生。他们为我的生日带来了花和生日蛋糕。多么棒的欢迎！

【格特鲁德·孔继续在南昌被监禁了几个月。当共产党意识到她就要因癌症而死，她被驱逐出境。在她跨过边境进入香港后，她只活了够讲出她的故事的时间，一天左右。她是一名殉教者。】

两天时间，我们只是吃和睡。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写信给母亲。我摘录信中的话：“请告诉所有写信给处于红色中国的中国人的朋友们，停止写信和寄钱。对于美国朋友，这很难理解。但对于中国人，这可能意味着死亡。我必须说你寄给我们的所有信都很好，除了最后一封。我们的司库麦考伊审查所有【从香港】寄给我们的信，押下了那一封，那很明智。再一次，上帝指引着我们的脚步，保护我们脱离危险。我希望中国人因我们代表着我们的信仰和真理而记住我们。我们可以运用‘新思想’【共产主义哲学】，仅当它不和基督教冲突。”

现在是时候赶上两年的新闻。【自从“解放”，厄内斯特和希尔达没机会接触短波广播或西方报纸。】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直接回家。我们必须花时间思考一阵子，适应我们抵达的新世界。

因为我们抵达香港没有事先通知，没有预定的机票或船票让我们前往美国。【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所以没有客船在美国和香港之间往返。在香港停留几星期后，一家人乘英国航空飞往伦敦，然后南行穿过欧洲到意大利，赶上一艘船前往美国。在那时，国际间的飞机航行仍比船只航行贵非常多。】我们最后先远行至英格兰。然后途经瑞士时，厄内斯特有一次轻度心脏病发作。所以我们不得不休整一段时间，然后逐渐恢复行程，到达意大利，赶上一艘船。当我们抵达纽约时，厄内斯特的身体状况已很好。不过直到10月，他没有做任何医院工作。

## 中国之后 1951-1955

【一家人从1951到1955年生活在辛辛那提。】厄内斯特在隶属辛辛那提大学的综合医院和邓纳姆医院工作。邓纳姆医院以其胸外科和结核病工作而闻名。他在那里接受整形外科方面的进一步训练。与此同时，他准备他美国医学会考试的A部分和B部分。那些年很忙很不容易，他每隔一天在晚上值班。他不怎么回家。

我试着参加一个麻醉课程。因为我作为学生得每隔一天在晚上值班，我转而申请辛那提大学的一个化验室培训课程。我完成了那个实习课程。我还缺一些大学课时。1961年我在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巴特勒大学完成了那些课时，获得医疗技师证书（美国临床病理学会）。

【由于中国因为“铁幕”而封闭，厄内斯特和希尔达被传教会理事会重新指派到韩国。】厄内斯特计划于1953年早些时候【朝鲜战争刚一结束】前往韩国。可是他发生了一场摩托车事故，一侧膝盖严重受伤，在医院住了大约一个月。之后一段时间，他真的不可能想着做任何重活。他最后在1954年4月前往韩国。我和孩子1955年前往韩国。【我们的延迟是因为战争刚结束时韩国的困难状况。】

## 后记（致中国的老朋友，写于1988年）

韦斯医生1984年11月6日去世。他过去常常谈起他深爱的中国和那里的朋友、同事。他极其想见到你们。他对我说，如果他【先】去世，我应该试着回去探望你们，我实现了那个梦想，1985年访问南昌。真是太棒了，见到1939到1951年间的的朋友，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见到我自己的学生和厄内斯特培养的学生。这唤起了那么多回忆。当然，有些人没能见到，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1985年，中国有了如此多的变化。医疗上的进步非常显著。医院手术、病人护理和每个人的一般健康状况上的改变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应该向中国道贺。

我也很高兴教会能够在这个国家的发展中起到作用。我很感激能在中国的战争岁月和战后岁月中从一个小方面服务，为它的发展出了一份力。

【希尔达1985年在护士会议上受到的接待和对南昌的私人访问是极有意义的。老朋友们尤为感谢她带来一手提箱照片。他们自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的全部照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毁了。】

## 履历

### 厄内斯特·沃尔特·韦斯

- 1933 在俄亥俄州鲍德温-华莱士学院获得科学学士学位
- 1937 在辛辛那提大学获得医学学士学位
- 1938 在辛辛那提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 1938 获得美国医学检查理事会证书
- 1937-38 印地安纳州印地安纳波利斯市卫理会医院实习
- 1938-39 俄亥俄州市贝塞斯达医院住院医师
- 1939-43 在中国北京、南昌和上海做传教士医生
- 1943-44 辛辛那提综合医院
- 1944-46 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亨利·福特医院外科住院医师
- 1944-46 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科学硕士学位
- 1946 获选美国外科学院院士
- 1946-51 南昌医院外科主任，国立中正医学院外科教授
- 1951-54 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外科医生
- 1955-75 世福兰斯协和医学院外科教授，延世大学医学中心建筑委员会主席



## 希尔达·伊丽莎白·韦斯

- 1933-36 在俄亥俄州市贝塞斯达医院获得注册护士资格
- 1936-39 贝塞斯达医院护士
- 1939 在辛辛那提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 1939-43 在中国北京、南昌和上海做传教士护士
- 1946-51 在南昌做护士和护理教师
- 1952-55 在辛辛那提大学（荷尔梅斯医院）做学生兼职员，接受医疗技术和血库培训
- 1955-75 世福兰斯医院化验室和研究实验室职员
- 1960-61 印地安纳州印地安纳波利斯市巴特勒大学研究生课程
- 1961 获得医疗技师证书（美国临床病理学会）
- 1975-88 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莫宁塞德护理庄园志愿护士

## 致谢

如果没有我丈夫帕特和我儿子大卫的鼓励以及技术和编辑上的协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非常感谢！